

序

我是喜歡研究比較教育的，雖則比較教育的內容應該怎樣，到現在尚無定論。十年前我曾寫了一本各國教育比較論（民十六由中山大學出版部印行，民十八後由商務印行），是以英、美、德、法四國的各級教育排比敘述，而另以專章來講日、俄兩國教育的。當然，世界上有六十多國，一部完備的比較教育應以所有的國為對象，不過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承認英、美、德、法這四個國是世界上的先進，而日、俄急起直追離他們的程度不遠了，況且是中國的緊鄰，這六國的教育制度至少是中國研究比較教育者所不可不知。不過六國之中程度相當可加以比較的在十年前祇有英、美、德、法四國，所以我的寫法如此。最近美國的比較教育專家康特爾先生寫的比較教育，是以英、美、德、法、意、俄六國的各級教育排比敘述的，方法可說是與我初無二致，不過去日而加意，可惜高等與職業教育都未列入。

關於各國教育制度的基本事實已在此兩書和其他談各國教育制度的書中詳細敘述了，但除了基本事實以外，還有些新發展。這些新發展或在甲國通行而尚未行之於乙國，或連在甲國也在嘗試之中未曾通行，然而都已具有潛勢力而漸漸影響於其他各國了。這本小冊子裏所收文章除一二篇外大都是敘述這類趨勢的。新教育運動之趨向是我未赴歐考察前與教育研究所同人共同研究後自己所得的結論。本來新教育運動在各國是各自發生的，他們並不互認有共同之點，不過據我看來，便有文中所列的共同傾向，也僅僅是傾向而已。歐遊教育印象三篇是我一九三二年赴歐考察時一些不可磨滅的鴻

爪，這三種傾向雖則瀰漫全歐，但勢力的強弱却各國不一。葛龍維的學說及其影響是我遊歐後感到一位非科班出身的教育家，其學說雖尚不列於一般教育學說書中，但其影響却一天一天地普遍於全球。蘇俄公民訓練與政治教育，德國的生產教育與勞動服務，不景氣與美國教育三篇是去年暑假對浙江全省民教館長、中心小學校長四講之三，其他一講是法國的道德教育與師資訓練，內容大致與各國教育比較論中所述的相同，故未記出。英國最近教育概況是應教育部第二次教育年鑑而作，其中雖係以一般狀況為對象，但英國的特有辦法，如以補助經費方法管理教育設施，學校供膳，及失業青年與成人教育等，皆加以注意。二十年來關於師範教育言論之分析指出中國師範教育制度變更之原因，可與我的教育思想中八年來多人注意的教育問題一文對照。高等教育革命是我個人認為今後中國高等教育設施應走的一條路，而鄒平鄉村建設的近況及其動向即是最好的一個實例。鄒平的工作在國內各鄉建事業中含的教育意味最濃厚；這是凡知鄒平工作的人所公認的，所以我把他列入中國新教育趨勢與中國的教育研究與實驗中。這兩篇和其他兩篇是應英、美、德、法四國的期刊而作的（其中一篇得曾昭森先生，一篇得崔載陽先生合作），內容大都為國人所熟知，所以沒有譯出。最後一篇係最近應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一九三六年的教育年鑑寫的。各文不妥之處，盼方家指正。

二十五年一月澤宣識

誌 謝

以上各文多曾在東方、中華教育界等雜誌中發表，此次承各該雜誌出版者惠允彙印成冊，不勝感謝。

各國教育新趨勢

目 錄

序

新教育運動之趨向	1
歐遊教育印象	
1. 歐洲體育教育的發展	25
2. 歐洲教育的生活化	32
3. 歐洲教育的尊重專家	41
葛龍維的學說及其影響	49
蘇俄的公民訓練與政治教育	63
德國的生產教育與勞動服務	73
不景氣與美國教育	83
英國最近教育概況	87
二十年來關於師範教育言論之分析	109
高等教育革命	115
鄒平鄉村建設的近況及其動向	127
中國新教育趨勢 (第六次世界新教育會議英文講稿)	143
中國的教育研究與實驗 (英文)	155
中國初等教育的改革 (法文)	175
中國最近教育概況 (英文)	179

各國教育新趨勢

新教育運動之趨向

一 引 論

工廠式的學校制度雖自十九世紀以來，盛行於全世界，但早已爲有識者所詬病，到現在已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美國經杜威一派人的攻擊，已經二十多年。在德國所謂青年運動，勞作主義，混合教法等等，都有打倒這種制度的急先鋒。在英國素不願抓破面來幹的，亦先有貝登堡的提倡童子野外生活，後有山得孫校長的古典學校實用化的行爲，姑不講澈底改造的歐尼爾。在保守的法國，居然也有做國家官吏的視學古寺納先生大膽去實驗。在極左的蘇俄，更公然把一切科目廢除了。連東鄰的日本也東施效顰的開設了所謂‘自由學園’，這個運動可說是瀰漫於全世界了。倒底這個運動是怎麼樣的？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一個問題。

新教育運動在求教育與生活的接近，當然所取的形式在各國是很不同的。實施的大概，我們已在教育研究第二十二期中介紹過了。在此地我們想做一個總括的概說。不過這個運動是多方面的，而且還沒有成熟，以致有些地方未必合於我們所說的，甚而至於各人的辦法互相衝突，這本不足怪。何況我們介紹這種運動，並不希望國內任何學校整個的抄襲，同時或者可以更感到亦步亦趨的危險。

二 原 則

教育運動的原則，雖已經國際新教育運動者公定了三十點（教

育研究第二十二期一〇〇頁至一〇四頁），但是我們覺得太瑣碎了。

• 我們現在祇舉下面六條來申說一下：

- 一、兒童身體的發育更重於心智，
- 二、兒童本能的獲得必須先有具體的經驗，
- 三、豐富的經驗必須求之於豐富的環境，
- 四、兒童的進步與否須與自身比較，
- 五、學校教育兒童的成績，不在兒童知能方面的累積，而在於有求知的能力與習慣及正當的對人對己的態度與精神（如自信，自動，創造，發表，合作等能力），
- 六、不可以現代的理想成人為將來兒童的懸格。

從前的教育祇以為是知識技能的灌輸，至於要這些東西達到什麼標準也是預定的。為要勉強達到預定標準，一方面用先生講演或指導，學生靜聽或依照預定程序去工作的方法教學，使學生食而不化，一方面因為祇是被動的學，以致偏於用腦或身體的一部分而使全部身體的發育反受損害。

我們要矯正這個毛病，先要認識學生是一個人，學生可以不做，人不可不做。若因做學生而使他的身體的發育受了損害，以致他將來不能做一個完滿的人，這種教育還要得嗎？本來一個兒童若生長在一個佈置適宜設備週到的家庭，而父母對於他的衣食住都能科學化，絕對不必急急於進學校——尤其是現在這種害人的學校。有好些父母以為一個小孩子不進學校便會蠢的，其實一個人的智力並不因受教育而有改變。現在的學校教育——尤其是小學校裏的——聰明的小孩子如果身體強健在他心智成熟的時候祇要很短的期間便可獲得，至於愚蠢的小孩，受了這種教育，未必能變為聰明的，反

而身體上受了損害，這真是得不償失。不過因為一般的家庭未必能佈置適宜設備週到，一般的父母更未必對於衣食住有科學的研究，所以不得不用學校的方式，由專家來指導。這種的學校祇是一個大家庭，在教育上的第一注重點是育不是教。學校先要負起保育的責任，把學生的身體弄好了，纔能談到別的事情。

其次就是講到知能的獲得，也決不是靜聽或依照預定程序去工作所可辦到，即使辦到，所得的也必祇是表面，祇是皮毛。當然對於某種觀念要完全了解，某種技術要十分純熟，無論用什麼方法，決非短少時期所可辦到。所可惜的是一般教師以為教的時候必須要學生對於這種觀念十分了解，這種技術十分純熟，結果是表面上似乎是如此，實際上甚而至於完全沒有了解或習得。我記得有一個笑話，在美國求學的時候，遇到一位南非洲來的同學，他第一次在紐約看見下的雪，他很驚訝，他以為是大海邊的白沙被風吹上岸來。他是一個大學已經畢業而且當過中小學教師的人，在書本上和先生教他的關於雪這件東西的說明，不知遇到過多少次，但第一次看見下雪，還莫明其妙是怎麼一回事。真是古語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其實‘百見不如一做’，‘事非經過不知難’，一個觀念要完全了解，若是這個觀念是比較複雜的，恐怕有許多人一生一世也未必弄得明白。譬如紅色，在好些色盲的人固然完全莫明其妙，就是我們不色盲的人，倒底世界上有多少種紅，雖是第一等美術家也無從知道。至於太陽光七色以外的紫光，恐怕任何人也想像不出來究竟是什麼樣的顏色。

因此我們處於教育者的立場，先要明白教的東西學生固然無法完全領悟，我們也無法完全傳授。我們不要以為所知的所能的都在

學生之上，都有傳授給他們的價值，其實有許多東西他們知的能的比我們多，有許多東西我們所知所能雖則似乎比他們多得多，但按諸實際恐也很少，我們擺起老師的臭架子，一定要他們跟我們學，這是何等危險的事！我們所能做的至多不過把我們所知所能，片面的供給他們，同時設法給他們一個機會，叫他們自己去求知求能，這樣纔可以一代勝似一代，不致於因為我們知的能的少，使他們知的能的更少，或者可以減少我們一些過失。

所謂給他們一個機會，叫他們自己去求知求能，決不是指定一本書或一個題目或一件工作叫他去做就算了事，現在社會中學生依賴先生的空氣太濃厚了，學生以為我是來學啊，你怎麼不教我呢？其實先生的任務祇是盡力的把一切的實物都放在學生面前，使學生能極便利的看得到，拿得到，甚而至於佔得到，就算是盡了責任。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個學生所看得拿得佔得到的決不相同，如其要問先生如何可以多得一點，先生當然是竭誠以告，但學生或者辦不到，或者還以為太少，這是他自己的事。

把一切的寶物放在學生面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所能做得到的，祇是供給學生一個豐富的環境。所謂豐富，當然不過我們力所能及，而且這種環境多指天然的而非人為的。人為的環境必須有那些人為的因子纔能造成，如果這種環境是比較近便，當然我們可以帶學生去觀察，去參加。至於天然的環境，我們比較的有方法可以供給，在下面我們再來申說。

供給了一個豐富的環境，他們便會自己去發現去比較去研究，……從這些裏面，便會獲得知識技能。但是當然仍舊是各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人的智力興趣觀點種種不同，所得的自然是

不同的。一定要說某人得得多，某人得得少，這是再蠢不過的事體。然而某人自己卻常常要在那裏求進步，若說不同人比，便不必求進步，那就糟了。不但要求進步，而且要知道自己用了多少力量得了多少東西，是否用盡了力量，得盡了東西，嚴格的講起來決不會用盡了力量，得盡了東西，不過考查一下，至少用多些，得多些。

再進一步來講，知識技能是求不盡的。無論環境如何豐富，學生如何盡力，學期如何延長，所得的總有限。所以這種知能獲得，不過使他有利用他的身心的機會，發現他自己的才能，尤其要緊的是從求這些知能的過程裏，養成他求知能的能力與習慣及對人對己的態度與精神。從這些事情裏面，他可以發現：有些事非大家合作是不能成功的，有些事非獨自毅力去幹是不會貫徹的，有些事硬幹未必能做到的，事前要有準備，事中要有考慮，事後要有收拾，真是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而且如此纔可以‘使經驗增加意義及具指導後繼經驗的能力。’（杜威對於教育的定義，見拙著教育概論第五頁，中華版）

這些能力習慣態度精神決非口講耳聽所可得到，必須一點一滴足踏實地按步就班的去幹纔得得到，這便是一個極好的訓練。至於預定標準，更屬不可能。邱大年先生說得好：‘今日所謂新，明日又是舊的了，明日所謂適宜，後日又不適宜了。現在準備做一個最新式的飛機，你能擔保十年後準是適用的嗎？教師叫兒童準備做現在的最有效率的成人工作，他能擔保他們在十年後能做最有效率的工作嗎？……中國現在四十歲左右的人，在兒童時期，必定辛辛苦苦地準備做八股文，並且預計八股文準是有用的；但是光緒三十一年八月諭停科舉以後，全部準備工作又屬勞而無功了。我們在兒童

時期準備做的文言文，到民國八九年以後又屬前功盡棄了。足見使兒童專準備成人生活是多半無用的。’（師大教育叢刊第一卷三期）現在的科學進步之快，文化變遷之劇，我們任何人沒有法子料得到將來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子，所以我們至多祇能使學生常常適應新環境，使他將來處到一個新的社會中，不致手足無所措，就好了。

三 方 法

一、佈置豐富的環境：

- (甲)廣大的場地，
- (乙)植物的培養，
- (丙)動物的飼養，
- (丁)園林的佈置，
- (戊)工作器具的供給，

有甲戊則乙丙丁不難在有技能的教師之下辦到。

二、以自然及社會研究，工作及圖畫，音樂及遊戲為主，語言文字僅為輔助發表的工具。學習時：

- (甲)須有智商興趣相同的男女學生，
- (乙)須有獨力自做及團體合作的機會，
- (丙)須有內心的需求與滿足。

三、以兒童經驗為主場：

- (甲)從觀察，實驗，旅行，設計等方式，獲得直接經驗，
- (乙)從實際活動及工作，養成自動，創造，自信，合作等能力，

(丙)依兒童各時期身心發展程序及需要，供給適當的刺激與指導。

四、教師指導時應注意：

(甲)兒童所欲做的工作是否為個人或一組能力所及？

(乙)所需材料是否校中已備或附近所可得到？

(丙)此種活動是否能進展或旁及到別種活動？

(丁)結果是否令工作者及其他兒童滿意？

豐富的環境既是樹立新教育的基礎，我們談到方法不能不先把這種環境的佈置申說一下。

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們的環境有兩種：一種是人為的或社會的，一種是天然的。人為的環境是有了人為的因子經過歷史上的變遷纔可造成的。譬如上海之有今日，其中因子甚為複雜，如外國人的特殊勢力，工商業的發達，……等等，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成的，也非世界上任何都市所能模仿的。一個兒童在受教育的時候，當然應該有種種機會去觀察去經歷各種人為環境不同的社會生活，鄉村的人應該有機會到城市去住，城市的人應該有機會到鄉村去住，甲城的人應該有機會到乙城去旅行去作長期的觀察等等。我們要學生得到這種經驗，唯一的方法是常常舉行各種遠足旅行與長途旅行——有系統有組織的旅行，所以我們前面說德國的青年運動是新教育運動的一個象徵一種表現。（參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叢書德國青年運動民智書局發行）不過這種人為的環境不是我們負教師責任的所可造成的，我們所能供給給兒童的環境，乃是在使兒童能明瞭許多天然的現象和利用簡單的工具去創造去自動的合作的工作，所以最緊要的是要有廣大的場地和工作的器具。這種廣大的場地最好有小

山，有小池，具各種地形，若有天然的樹林和各種不傷人的野居動物那更好了。無論如何，場地必須十分廣大，使兒童不致於感到人多地少，纔可以儘量的獨力或合羣的去發現去創造。他們儘可利用各種工具在可能範圍內去改變這種環境，如培植花木，飼養禽獸，佈置園林等等。這樣不但可以改變環境以適應他們的需要，還可以藉此觀察動植物的生長順序和日光空氣土壤等等關係，動植物的種類和不同的需要……從這些觀察裏面所得的知識比從書本上得來的要實際得多可靠得多。在這種工作裏面更可以獲得許多實用的技能，也是書本上或呆板的在教師指導之下所不能得的。

豐富的环境既是新教育方法的出發點，當然所注重的是自然與社會研究而不是符號與書本知識，是工作圖畫音樂遊戲而不是國文數學等等勉強分立的科目。工作與圖畫是研究自然與社會環境第一步必需的手續，語言文字祇是輔助發表的工具按事實上的需要去學習，在心智到了相當發育的兒童是不難獲得的。音樂與遊戲乃是一方面在使兒童盡力享受天然界的樂趣，一方面在多與兒童身體發展的機會，其目的不在標準技能的獲得；而且在用任何方法學習的時候必須看事實上的需要使兒童有單獨的和團體的活動機會。常常單獨活動便會孤僻成性，除特有天才將來做學術專家外，不易在今後團體生活中立足。但如沒有單獨活動的機會，也會使兒童變成依賴的，失去獨力向前幹去的精神。我們相信在一個智商興趣大略相同的一羣男女中，是不怕沒有團體合作的機會，我們所怕的是他們的智商與興趣相差太遠，便會合作不起來。所以我們首先要注意到他們的智商與興趣是大致相同的，有了這樣的團體便要注意到單獨活動機會均等以調劑其生活。最後而且最要的在看他們的活動是否出

於他們內心的需求而終於內心的滿足。現在的世界中雖有一句成語是：‘失敗為成功之母，’但實際上常常失敗必定使一個人感到憂悶，於身心發展上有不少妨礙。做事的困難是應該感到的經歷的，但不能滿足內心的需求漸漸便會使內心的需求消失，這是民族衰亡的朕兆，負教育責任的不可不嚴加注意。

在此地所說的一切，當然必須以兒童經驗為立場，教師祇是處於輔導的地位，斷不能強制執行任何活動。兒童在研究自然與社會的過程中，從觀察，實驗，旅行，設計等等方式獲得直接的經驗。這種經驗決非從書本上或教師口中，或其他任何間接的經驗所可比擬。這種經驗必須由兒童一點一滴的去體會，做教師的萬不可心急口快，在表面上似乎可以促進這種過程，實際上恐怕是徒得其表，固然在兒童經驗深刻的經驗後如仍有不能貫通之處，則偶加指點亦無不可，但決不可性急犯了西人所謂‘把車放在馬的前面’的毛病。所以在兒童經過某種經驗以後，他們自己團體中應當有充分的討論，這樣便可互相補充，幫助貫通他們所經驗的，這時候教師不妨加入，但仍不可去領導或暗示。不過在某種經驗未經過以前，做教師的應當先看一看這種經驗是否適宜於這羣兒童。兒童的行為往往是衝動的是沒有思前顧後的，思前顧後固然是人生做事不可少(?)的過程，但在兒童或青年時代不宜把這種習慣養成得太早，或在意識上呈現的太早，不過前面說過常常失敗是有種種危險的，因此教師的責任是很重大，一方面要代他們思前顧後，一方面又不能妨礙他們的興趣，怎樣的因勢利導，適得其當，而且不減他們的興趣與需求，這非賴教師有經驗，處置得當不可。所以做新教育的教師比之現在一般的難得多。

因此我們在上面列了九條教師指導時應注意的問題。這都是在方法上很重要而不可忽的。兒童往往憑一時的衝動與高興，不顧所做的是否為個人或一組能力所及，就去着手，這樣自然易於失敗。其次便是材料的供給問題，往往兒童於事前不曾想到。有經驗的教師多能事前料到可以設法預先準備，但多數的時候，祇須校內或附近可以找到，應由兒童自己去找，不然便養成依賴習慣享現成福。至於校內或附近找不到，有時不妨由教師預為準備，但也要他們去想過，知道由那裏可以找到。在這些活動中尤應注意的是第三個問題即問題丙，一種活動是否可以進展或旁及到別種活動。生活是繼續不斷的，一種活動必須能進展或旁及到別種活動。所謂進展或旁及不祇是相連而且是相關能增加其意義與價值，即杜威所謂‘使經驗增加意義及具指導後繼經驗的能力。’生活不僅是一堆的經驗，必須有一串而有系統有價值的經驗。有許多人的生活是漫無系統的，除了大哲學家或文豪具有特殊天才的是例外，一般人若如此，便成了一個糊塗蟲，於人於己均無裨益。

所謂結果令工作者及其他兒童滿意與內心的需求與滿足是同一問題的兩方面看法。兒童自身應有內心的需求與滿足，做他的教師的和他的同伴的也應感到滿意。自身的內心需求與滿足的重要已在前面說過，在單獨工作的時候，僅如此也可以了，但在一般的團體工作中，必須大家滿意，因為這是合作上一個重要條件。至於教師應注意的不是自己感到滿意而是感到大家滿意。教師不應把成人的準備去評衡兒童的工作，也不能把甲兒的標準去評衡乙兒的工作，我們在‘原則’中已經提及。

四 課程

打破一切科目，另由生活中活動種類定課程單元。計知名的有下列各種實驗。

一、分活動爲三類：

(甲)比國德可樂里制

(一)觀察，(二)聯念，(三)發表。

(乙)美國文納特卡制

(一)羣及創造性的活動，(二)個人工作，(三)全班工作。

二、分活動爲四類：

(甲)美國密蘇利鄉村實驗學校

(一)故事，(二)旅行，(三)工作，(四)遊戲。

(乙)美國紐約實驗學校

(一)遊戲經驗，(二)實用經驗，(三)技術訓練，(四)知識組織。

(丙)瑞士國際學校

(一)標準的個人工作，(二)有組織的團體工作，(三)自由的個人工作，(四)自由的團體工作。

三、以季節宜教材：

(甲)蘇俄各小學（參看教育研究第七、八、九期）。

四、從鄉土到世界：

(甲)蘇俄各小學（同前），

(乙)德國小學的鄉土研究（參看教育雜誌二十一卷五號）

(丙)奧國各小學。

五、完全自由：

- (甲)德國漢堡實驗學校，
(乙)奧國齊策克 (Cizek) 教授的藝術教育，
(丙)英國歐尼爾的學校，
(丁)美國菲亞霍泊學校 (參看教育雜誌二十二卷四號)。

比國德可樂里制可是說開始於一九〇七年，到現在已聞名於全世界了。裏面的功課完全以生活中大單元活動來做單位，依年齡季節而不同，大要可分為個人方面與環境方面的。個人方面又分營養，住居，防衛，活動等類。環境方面又分家庭，學校，社會，動物界，植物界，礦物界，天象等類，但在學習時並不強分而以興趣定活動中心。不過任何方面總須經過三個步驟，即(一)觀察(二)聯念(三)發表。所謂觀察可分為偶然的與活動中心相關的及精密的。偶然的在使兒童隨時隨地注意到四周事物及自然現象。與活動中心相關的即在活動單元中以觀察為着手的第一步。精密的觀察則用各種器具來驗證所觀察的是否正確。所謂聯念亦有偶然的與活動中心相關的兩種，但以後者為多，與活動中心相關的聯念之第一步在發現與觀察所及的相關事物，如此不能直接觀察的事物可以推想得之。第二步則為比較，或將現在與過去的事物比，或將自製的與商共比，發現其同異優劣。所謂發表，可分為兩類，一以手工發表如塑造畫圖翦粘等，一以文字語言發表如各種報告及討論。

文納特卡制自創始人華虛朋東來演講後，知之者漸多。他的各方面已由兒童教育出一專號介紹，在這裏我們祇談他的課程組織。文納特卡制的課程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稱為普通的基本學科，一部分稱為團體的及創造的活動。普通的基本學科在養成兒童所應具的各種知能，工作時或各個研究，或全班合作，視需要

而定。因為兒童各個發展的不同，個別研究的時候較多，全班共同工作的時候很少。至於團體的及創造的活動則比之個別研究時間更多，其中包含討論，自治，戲劇，設計，會集，手工，藝術與音樂，體育，等等活動，以及歷史地理各種資料及背景的研究。

密蘇利鄉村實驗學校是哥林斯 (Collings) 教授根據設計教學原理於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在密蘇利州指定的鄉村小學的一個實驗。裏面的課程分爲四部分，即故事，旅行，工作，遊戲四類。所謂故事，包含閱讀，表演，唱歌，等等；所謂旅行在研究人生的環境及活動；所謂工作在用實物來表現一種觀念；所謂遊戲，包含運動，跳舞，戲劇，及各種社交集會。從性質來看，故事是比較靜的活動，工作是比較鬧的活動，遊戲則爲比較有團體性的活動而旅行則爲戶外的，或校外的活動，但都是有目的有組織而且是兒童所要做的。做完以後，每個兒童都應把經過與結果記載下來，再自由的互相批評及決定以後的做法。

紐約實驗學校是一九一四年成立的，初名遊戲學校，現稱城市鄉村學校。他們的課程組織以遊戲經驗和實用經驗爲基礎，這是兒童個人的與團體的活動。遊戲經驗在使兒童有機會改造他們的環境，實用經驗則在使兒童有機會創造物件。技術經驗與知識經驗是輔佐前兩項的。技術經驗在使兒童獲得特殊技能以達到某種目標。知識組織則在使兒童獲得新的材料以擴大他們的見聞。至於時間的分配，並不十分固定。

瑞士的國際學校是在一九二四年由國際聯盟，國際勞工局，國際兒童教護聯合會等在日內瓦創設的。內部課程可說是冶上面首三者於一爐。因為他的標準的個人工作是必須達到某種程度的，乃是

仿照文納德卡的個人工作辦法而且是由華虛朋的學生指導的。他的有組織的團體工作則依照德可樂里的方法，使學生與學生間，或學生與教員間作各種活動的交換與互助。個人的與團體的自由工作則大都根據於杜威的學說而後者尤其直接受了哥林斯教授實驗的影響，着重在旅行及其他團體活動。依時間的分配則上午大都是標準的個人工作及有組織的團體工作而下午則為各種個人的與團體的自由工作。

蘇俄的小學課程是一九二三年由蘇俄公共教育委員會公布的。這種課程是以三個中心的和根本的觀念做基礎：(甲)教材組織以人類工作為中心，(乙)教材內容以兒童興趣為依歸，(丙)教材順序以季節為根據，而範圍則由鄉土到世界。每個階級和每個年級都有(子)自然的能力和富源，(丑)人類的工作和富源的利用及(寅)社會的生活三方面，但第一年級，(八到九歲)乃以家庭與學校為中心點，第二年級，(九至十歲)則以兒童所居住的城市，或鄉村為中心點，第三年級，(十至十一歲)則以一省為中心點，而第四年級，(十一至十二歲)則以本國及世界為中心點。不過每年課程均以季節為緯，利用一季中自然的與社會的事物來引起兒童工作的興趣，做各種活動的出發點。

德奧小學的課程還沒有像蘇俄的那樣澈底的改革，但是在第一年級已完全取消科目制而採取混合制，乃以鄉土研究為教材中心。到第二三四年，則把鄉土研究溶化在國語科內，時間幾佔全部二分之一。據德國內務部教育司所頒布基礎學校目標及組織法對於鄉土研究的規定約略如下。最初二年研究的對象為家庭，院落，花園，校舍，校園，街道，市場，原野，牧場，森林等，家庭與學校的生

活，家庭，商店，工廠之一切的工作，第三年則為地理，歷史，自然之準備的工作，兒童因觀察日月星辰之運行而知天文學之普遍原則；因觀察山岳河流之形態而知地理上之基本原則；因在沙盤裏建築家鄉地面或在白紙上繪畫家鄉形勢而知查看地圖的方法；因觀察動植物而知其構造與生活及其交互的關係；因研究本地神話與傳說而漸知學習歷史的方法。

現在要談談完全沒有規定而聽兒童自由工作的實驗了。

德國漢堡的實驗學校可說是一個好例子。他們合教師學生和家長成一團體，互助合作去實驗。他們沒有固定形式的課程，祇按生活的需要由師生共同去工作，在星期和休假日，家長也來加入，共同的修理校舍，點綴園庭，或旅行各地。教師可以自由的教，學生也可以自由的學，沒有時間表，沒有學年學級的劃分，也沒有考試和一切規則。

齊策克教授提倡藝術教育的方法是任令兒童們到他的工作室來，看見他和他的學生的作品，兒童自己便會感到要工作，要創造，就去做去。等到需要專門技能指導的時候，他就從旁指點來幫助他們解決。他的成績已經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因為真有些驚人的藝術創作表現出來。

英國歐尼爾的試驗，最好把他自己對人問他們的課程時候所對答的來敘述。他說：“（課程）有的，有很多，不過我們不是死守着罷了。我們把他們定出來，但常加以修改。我們理由是：一件事物在某個時期覺得好的，在另一個時期未必仍好。如果我們想在這個星期完全做算學的工夫，我們便做算學的工夫，其他如讀寫之類概置之不理。下一個星期或許完全做文學的功課。……每個星期

有兩點半鐘，教師覺得有些東西是兒童們所要知道的，便對他們談談。教員給了他們一個引導之後，便即刻停止，而由兒童們自己繼續下去。……如果一個兒童對於教師所指示的工作厭倦了，他可以停止下來做別種工作，……要是教員發現大多數兒童對於他所指示的工作不感興趣，便再上一次堂，再來一個新鮮的起頭，或許是另一個學科。……讀書識字是我們不大留意的，我們所要留意的是他們‘做’的才能。如果他們已學到負責，能與他人有良好的共同生活，能參考書籍以求事理的明瞭，那末，不是比任何書本的學習為多嗎？”

菲亞霍泊學校的情形，在杜威明日之學校第二章裏曾有詳細的介紹。強迫的作業，指派的功課，以及照例的考試在他們的課程中都是沒有的。每個學生只要不妨礙別人，儘可隨時做他所喜歡的事體，雖然還有體操，自然研究，音樂，手工，郊野地理，故事，感覺訓練，數的觀念，表演，競技，地理等名目。

五 師 資

一、資格：

- (甲)不看重物質享樂，
- (乙)願做兒童的伴侶，
- (丙)忠實於偉大的責任，
- (丁)少說話多觀察，
- (戊)不要自負以為一切知能高過兒童，
- (己)勿求急效貪近功。

二、準備：

- (甲)兒童研究——生理，心理，行爲各方面各時期的發展，
- (乙)教育心理——學習原理及方法，
- (丙)文化背景——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
- (丁)教育哲學——擴大眼界，隨時接受新思潮，
- (戊)形藝工藝——至少須精於一種藝術，
- (己)自然科學——洞悉本地生物農產及工業狀態內容，能動手做實驗，
- (庚)參觀實習——在專家指導之下觀察及試行教學。

施行新教育最大的困難是沒有適當的教師。現在的教師，多沒有準備做這種工作的，他們祇是準備教授國文數學史地自然等等科目罷了。據新教育實行家的經驗，受傳統師範教育的教師往往不及受一般文藝教育的，因為新教育的教師是要富於同情心藝術性能與兒童共同生活而且能隨機應變的，不是依樣畫葫蘆做一個高等的技士就算了事。

新式學校最緊要的既是豐富的自然環境，教師也要能過很簡單的自然生活而且喜歡這種生活纔行。如果要享物質上的生活的去做這種學校的教師必定感到種種不便與痛苦。不但生活方面要簡單，而且要與兒童爲伍，兒童是幼稚的但是天真的。這種生活可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求名不求利，但求內心的自在精神的愉快。至於煙酒及各種奢侈習慣都是要不得，必須及早戒除，最好從來沒有。

兒童是新時代的推進者，做兒童的領導人，其責任是何等的偉大。教育事業直接是教導兒童，間接是創造歷史。世界上以往許多偉大的人物的成就，多半是靠自己的天才，受教育薰陶而成的很是

少數。至於更多的天才因沒有良師指導，或竟受了惡教育以致不能作偉大的貢獻，埋沒了他們的天才的，更是現行制度中教育者所不能推諉的罪孽。我們新教育的任務便在使人盡其才，至少勿使教育阻才能的發展。新教育的責任既如此重大，實施者豈可以不忠實的幹去。不過責任雖大，卻不可以自負。自然界的現象即專門學者尚多不知道的，社會中現象更是千變萬化，況且通行的制度有許多是因襲的傳統的，而不是完美的合於理想的。前面已經說過，我們不知道未來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們就不能也無從懸揣以求效。況且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其影響多非一生所能看到。一點一滴盡心竭力的做去，不問收穫，但求耕耘，所收穫的或者會出乎意料之外而青出於藍的。

有了這些資格，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方能在新教育事業中勝任兒童的導師。這種準備的最要點，當然是了解兒童。以今日兒童學的幼稚，這種研究可得之於書本的實在很少，必須時作實際的精密的觀察，方能明瞭兒童各方面各時期的發展。兒童的智能性格是各個不同的，常模的兒童祇是理想的湊合，可懸擬而不可看到的。其次學習的原理與方法也是假定的，個別應用，也要看題材的區別與學習的差異而不同。不過這些學習的原理與方法卻是不可少的出發點參照點。

兒童研究與教育心理的準備，還祇是片面的，其他方面更重要的便是文化背景與教育哲學。引導兒童去研究自然與社會環境都不能不了解現代文化的背景。要做新時代推進者的導師，更不能不站在時代面前，不能不看清自己與教育事業的地位。今後的教育哲學不是玄學的虛擬的乃是創造新兒童決定教育目標的根據，而且是日

新月異隨時進步的。有了這些準備，還要有實用的技能，可以因兒童工作的需要，應兒童隨時隨地的求助。以往的教師準備，最缺乏的便是藝術與科學。兩者性質雖不同而需要技能則一。這些技能並不需十分高深的，卻需嫺熟而能隨時的應用。在自然方面，必須對於本地的現象十分了解則兒童受其指導，必感內心滿足，而這些技能的表現在做不在說，如此兒童所得方法是實際的不是表面的。

最後，要作這種準備，非在良師指導之下，作長期有系統的觀察與試行教學不可。從做裏面學早已成了近代教育的重要原則，何況準備的大部分不是在書本上做功夫所可得到的。新教育既不能也不可標準化，實施的時候必須運用自己的智能去應付兒童的需求，準備的時候應多在已著成效的新學校中去觀察去體會，再把書本雜誌中所討論的來對照驗證。新教育尚在試驗時代，既沒有規例可循，也尚無一定不移的理論，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祇是大概的方向，一切都得共同工作者的努力！

六 結 論

上面所介紹的是我們研究所謂新教育運動所得的大概情形，自然有許多不正確甚至於錯誤的地方。這個運動在各國的起源，各有不同，形式亦異，而推其原因則都由於感到現在通行的制度缺點太多，非澈底改造不可，到今日連東鄰的日本也有類似的試驗（生活五卷三十三、四期及教育研究第三十三期），而新土耳其的小學課程（教育研究第二十四期）也充分表現了這種精神。我們中國自興學校以來即從事於抄襲，跟在別人背後走，總覺得跟不上，到現在已經有很多感到現行制度不良。可是我們介紹新教育運動決不想中

國再來抄襲，老實說這種教育更是不能抄襲所可成功的。不過我們看了他們勇於實驗和澈底改造的精神，至少應當激起我們根本去改革教育的勇氣。至於如何去改革，現在雖已有不少的方案，還須經過專家的研究和長期的實驗，決非閉門造車或一紙通令便可成功。關於這方面作者當另為文申說，在此地我們姑就在現行制度下所能努力的來討論一下。

- 一、注重童軍訓練，
- 二、提倡遠足和長途旅行，
- 三、增加自由節和自修，
- 四、厲行課外活動，
- 五、免除程度較好的學生上課或一部分功課，
- 六、在可能範圍內廢除講演式的授課，
- 七、教育行政機關極力鼓勵教育，凡達某標準的學校及各師範附屬學校准予自由實驗。

童子軍在中國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大約受過童軍訓練的有十餘萬人，可見在教育界中已有相當勢力。祇可惜多數童軍是有名無實的，教練祇受過短期訓練，對於教育哲學既無相當的認識，對於童子軍的真精神自難有深刻的了解，結果是形式上抄襲外國的童軍，課程內容也多係舶來品，我們看現在一般童軍的服裝用具等等便可知。在學校行政方面多也以童軍為裝飾品，點綴一下便算了事。要使童軍訓練發生效力，我們很希望國內各大學的教育學院先從培養領袖人才起，再把童軍教材與設備問題詳細研究，在未確定之前必須從事於實驗，看看是否適合於中國的現況，這樣纔可收獲良好的效果。

遠足與長途旅行也已漸漸通行於各級學校，但是往往僅僅把他當作一種身體上的發展而忽略了知能的獲得和整個態度與行為的養成。我們看德國的青年運動已經使德國任何中小學中沒有全體在校的時候，把旅行認為課程中很占緊要的部分，以致有所謂青年文化的發生，在國家社會的前途上影響未可限量（參看趙邦鏞譯德國青年運動民智書局發行）。中國近來到了春季舉行旅行的頗多，但多事前無準備，事中無計劃，事後無整理，雖則身體上或感興奮，環境上有所刺激，但在一生的教育上和社會的習俗制度上毫無影響。我們很希望教育行政和學校當局對於此類旅行能有整個的計劃，利用兒童與青年的旅行熱，來施行一種有目標的教育。

增加自由節及自修的意思即在與學生自由學習和自動做工作的機會。現在各地中小學的功課太機械了，太呆板了，太養成學生的依賴性了。但是如其即刻完全解放，或者會盲動起來，發生紊亂的現象。祇好在可能範圍之內在各種規章課程限度之下，抽出若干時間准予自由學習和自修。所謂自由學習是沒有限制的，任學生自選的，祇須有相當的設備和導師便可舉行。自修則所修的內容是比較的有限制的即仍係與功課有關的。我們希望高小和中學各級中每日至少有一節自由學習，有一節自修，學校應予以種種的便利，使學生得到這種機會。

課外活動如各種集會出版物及運動等等在前數年是很發達的，甚而至於有過度發達的趨勢，可惜各學校的當局多不很注意，不去努力指導，到現在，許多學校中的課外活動已完全不看見了，或徒有其名了。我們很希望各中小學甚而至於大學各教職員都留意這件事情，時時以相當的指導把他當作功課一樣，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活

動是可以養成學生的自動創造發表等能力而且在生活上很有應用的價值的。教育行政當局派員視察的時候也應與功課一樣的觀察課外活動。

現在教育行政和學校當局所定的規章課程多半是爲一般學生着想的，所以許多的標準不能不如此訂定。爲使高材生發展其才能起見，似不宜把這些東西來束縛他們，所以我們主張免除他們功課的全部或一部分。我們以爲成績在九十分以上或全班最高的十分之一的學生，學校儘可免除他全部上課，祇須按時交學習報告到教師那裏去便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或全班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學生，學校也可免除他部分上課時間，要他自行工作，交呈報告。

講演式的授課是中世紀的遺留物，而且最易養成依賴性，早爲教育家所詬病，不過在今日中國參考圖書缺乏的時候，有時確非教師講演不能得某種教材的精要的時候，或者可以偶一用之。在可以不用講演式授課的時候，我們以爲應由教育行政及學校當局禁用。

最後我們希望各大學教育學院及師範學校附設的中小學應在專家指導之下儘量的從事於教育上的實驗，不必遵照任何規章課程，不過必須將事前準備事中計畫事後結果做成詳細報告呈報上級機關並公布於社會，使大家知道他們不遵照規定的通行辦法不是任意的無理由的和他們的實驗的價值在那裏。其他的學校如達到某種標準，例如教師確曾受過相當的訓練，經費確有固定的來源，而計劃確有實驗的可能，經專家審查後，也可以從事於實驗。或由上級機關指定某某學校作這種實驗。不過不是附屬於教育學院或師範學校的學校，要作教育上的實驗，必須經過嚴密的審查，不可輕於允許。未經允許的，暫不能開始作實驗，既經允許後，行政當局必須竭力

贊助，與以種種的便利，且在實驗期內，不可更換內部主持人員或減少經費。這樣所實驗的纔會有結果。中國的教育確有根本改造的必要，而改造的途徑必須經過長期多種的實驗，然後纔可以歸納到一個合於中國全國的或某地的教育制度。萬不可再蹈以前的覆轍，憑少數人的空想，做東施效顰的勾當。教育界的同志們，看人家如此的勇於實驗，還不一致奮起的足踏實地的去幹嗎？

(附註)這篇文章因為分爲幾次寫成的緣故，有好些不很貫串的地方，就是所提到的各方面，也因為範圍廣大，而且這個運動是不很一致的，不免有掛一漏萬甚至於錯誤的地方，不過自信這篇東西把這個運動的大概，總算是作了一個鳥瞰，所以大膽的發表了。還望閱者指正。文中所謂‘兒童’是指十八歲以下的受教人，在此附筆聲明。(東方三十一卷一號)

歐 游 教 育 印 象

1. 歐洲體育教育的發展

一 引 言

一九三二年的夏天，我因赴歐出席世界第六次新教育會議，曾到意、法、德、英、瑞士、丹麥、捷克等國考察，為期雖短，但是得到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以前我曾經聽到或從書本上讀到歐洲自從大戰以後教育方面大加改革，不過到底印象是模糊的，不親切的。這次跑過以後，才發覺他們教育制度的改革的確要發生遠大的影響。可惜我回國以後，忙於雜務及其他稿件，始終沒有時間把所得的材料整理出來！我曾經在一兩處約略講過一點，有人替我記錄，但所講的既為片段的，所記的更不實不盡，因此始終沒有發表。許多朋友都希望我早點有所報告，但是若把所得材料像流水帳似的寫出來，恐怕徒耗閱者的精神與時間，因此我立下幾個中心題目，把他們組織一下，或者可以眉目清楚一點。這一篇裏先把我所見到的歐洲體育發展情形敘述一下。

到歐洲正當初夏的時候，立刻就感到戶外生活的熙攘。實在講起來，未到歐洲時，在船上已經感到了，船中除了有少數有風浪的天氣外，搭客——尤其是歐洲人——無不興奮的參加戶外運動。最有趣味的便是在甲板上搭起帆布的游泳池，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早晚晚都跳到池子裏去游水，游完了便躺在甲板上讓太陽把身體曬乾。海水浸曬到皮膚裏，顏色是由白而黑，甚而至於皮膚一層一層的脫下來，但是經過這種訓練以後，我相信傷風的事體是絕少發生

了。

二 意大利的體育次長與國立體育學院

我未到意大利以前，便聽見意大利有一種專門養成體育教師的機關。我到意大利後便拿了南京教育部的公函去找意大利的教育行政當局。經過公使館的介紹，教育總長居然親自接見了，但是問他體育師範的事，他竟回報說管不到！原來意大利的體育事業另有一位次長專管的。他對我說，如我決意要看體育師範，必須去找這位次長，我如要見他，可以代為介紹，不過這位次長事體是很忙的。我心裏想這個機會不可失去，我就請他介紹。他於是打電話過去，據說事很多，約我遲一刻再去。總長則似乎很清閒的，留我坐談，彼此言語雖不很通，他把意大利教育情形的大概對我講了，隨後又告訴我，他正在讀老子道德經的英譯本，對於老子的哲學他很欽佩，末了我又請他介紹去見墨索里尼內閣第一任教育總長香第爾教授。我過了半點多鐘才到次長那邊。體育次長辦事的一部分是在教育部新增的建築物裏，大廈雖相連，離總長辦事所在很遠，繞過了幾個長廊才找到。我到教育部的時候，一到便有人領我去見總長，雖則是由公使館事前約定的，但是應接室裏闕無一人，我見到總長時，還以為他不過是一個秘書之類，後來看見他穿了一件禮服，想來是秘書長，接談之下，才知道他就是總長。他的優閒，在我去找體育次長時更其顯然。我到了次長那邊，應接室裏已經有兩三個穿了黨軍制服的人在那裏等傳見，室外又不斷的有人出入。我在應接室裏枯坐了半點鐘，才有人來叫我到另一室裏去，見我的還是一個秘書——次長的親信秘書。他對我說，‘這幾天我們正籌備着全國夏

季大露營的事體，一共有十幾處，而且今年的規模比以前大得多，因此次長很忙，很抱歉沒有時間同你談話。’我知道同次長談話的機會是不容易找到，而且我在羅馬時日很短，就告訴他：‘我要看體育師範。’他似乎很奇怪的問我，怎麼我會曉得他們有這種學校——這實在是意大利的一個很重要的新發展，他們正在用全力經營的。但我既已知道，他又不便拒絕，祇好答應派一個懂英文的人明天帶我去，——因為這間學校離城還很遠呢！第二天早上我又到體育次長那邊，便有一位曾經到過美國的意大利朋友帶我去參觀。原來這位朋友是體育學院畢業生，再經政府派赴美國考察過體育的。我們一路有說有笑的換了幾次電車才到體育學院。

體育學院的舊地似乎是一間營房，但緊接着已在建築新校舍。建築的外表內形完全採取立體式，極為壯麗而實用。尤使人印象深刻的是院前的墨索里尼華表，高度超過羅馬古今一切華表，亦屬立體式，因此我以為體育學院實在是象徵墨索里尼在教育上主張的結晶！體育學院的後方有一個小運動場一個大運動場。小運動場完全用大理石建築，場的四周及院廈的各處都樹有大於真人的大理石像。每一意大利城送列一個，各式不同，有打球的，有擊劍的，有揮拳的，……據說各代表該城體育精神！大運動場就地形開闢，規模甚大，可作下屆世界大運動會之用。大運動場後為一大森林，可舉行五萬人的大露營。全部校址背山面河，風景絕佳。入院學生不獨須中學畢業，且須曾在青年團服務已任隊長多年極有成績者，選擇極嚴。院內課程，理論與實習並重，理論功課有教育學、心理學、哲學、英文、法文、解剖學、人類學等，實習功課除各種體育及球類外，且有劍術及軍事訓練，對於打靶特別注意，有廣大的打靶場

• 在校經四年嚴格訓練後，依照成績分發各地服務，且可按年遞升，自第七級至第一級，相距二年至四年不等。此項服務等級及年俸載在院章內，俾學生對於出路毋須掛慮。這間學校實在是訓練全國青年團教官及視學的最高機關，而青年團(詳下)又是法西斯蒂黨化教育實施的中心，所以這間學校亦即是黨化教育的中心，宜乎為意大利及墨索里尼所極為重視！

三 意大利的青年露營

我在意大利教育部體育次長的應接室裏，便看見牆上掛了許多青年露營的照片，看見他們這種對於大自然環境日光空氣的利用，真是欽羨。意大利本是一個伸入地中海的一個長半島，島的中部有山，所以處處有背山面海的地帶。教育部便選擇了全國自然環境最優美的十幾處地方(體育學院後面的大森林便是一處)於每年夏季建立大露營，每個大露營總有幾萬人。這些人都是從各地青年團挑選出來的，至於體弱青年在露營時期更為延長，使身體進步更快更大。其注意露營的目的除在大自然中生活養成種種衛生上習慣外，可以行日光浴及種種健康活動，對於飲食方面的營養尤為注意。可惜我到的時候還未放暑假，各處大露營正在籌備期中，未能躬逢其盛，但與體育次長室的秘書及領導參觀體育學院的朋友詳談，知道他們這種大露營是有目的有計劃而極有成績的。據說去年曾有中國的一個青年加入露營，可惜姓名不詳。這種大規模的露營雖未親見，但我旅行到弗羅倫司的時候，曾經看見一個小規模的露營，已覺得不錯。這個小露營便在弗羅倫司的一個大公園裏。所來的青年與兒童是市立各校的體弱學生。或於星期六晚或於星期日早由青年團

教官領導到公園裏指定的區域中去。早上上早操後自由遊戲，到了中午有富於滋養的熱餐，我們去的時候，正將用餐，全體兒童先唱歌後就餐，所吃的極簡單但極合於兒童營養，旁有對於食物學有研究的看護指導。吃完以後，各人拿一條小氈子到草地上去睡午覺，睡不着的也不許出聲，靜靜地休息一點鐘，再起來遊戲。飯堂是四面沒窗的板室，下有地板，天如下雨，可在內休息及遊戲。到了傍晚快回家去的時候，便把他們的身體，狀況及體重簡單的記下來，同時管理人便把一日經過做一個簡單報告。這種每週的記載中便可表明各個兒童的身體進步狀況。我看了這個小露營以後，已經覺得他們的體育訓練是如何從根本着手，其收效之大可以想見，至於大露營的成績更更可觀。照我看來，我們與其每兩年化十幾萬元開一次全國大運動會，每年各地各化幾萬元開省或縣的運動會，單叫少數的選手出鋒頭，多數青年作壁上觀，何如把這筆錢拿來做點根本改造體格的事業！

四 歐洲體弱兒童學校

露營到底是短期的，最長的不過兩三個月。有些體弱兒童實在需要終年的體育上的注意。因此在意大利及歐洲其他各國都有專為體弱兒童設立的學校。我在意大利及法國都有機會參觀到這種學校。大約這種學校也是他們教育當局近年來所極力提出而自豪的，因此我一到他們便帶我去看。我所參觀的一間意大利一間法國體弱兒童學校相同之點頗多。他們都是設在山林間空氣日光充足的地方，而且都是寄宿的，這樣他們才可以控制兒童全部的生活。他們人數都不多，教員也皆寄宿，全校很像一個大家庭。對於身體的發展自

然是特別注意，飲食起居都經過專家的規定，極合於營養及衛生。除非天氣極寒冷或大風雨，戶外生活已成為常規，而且在天氣溫暖的時候，大都祇穿一條短褲，上面有一條吊帶，實行其裸體運動。至於午覺更是不足奇！他們對於身體上的注意，遠過於功課上的注意，雖則也有一定的功課，但是需要休息或運動的時候，一定是犧牲了功課去幹的。我在意大利參觀的時候，正遇着他們要去附近廣場上去遊戲，一個個赤着膊雄糾糾氣昂昂的前進，真是快樂真是可羨！我在瑞士日內瓦也去看了一所專為體弱兒童而設的小學。這是不寄宿的，整個學校在市外近郊，校舍祇是幾間板屋，也是戶外生活多於戶內，常常不穿衣服的。德國的林間學校（亦稱露天學校，參看拙著教育概論，中華版），是全世界有名的。我到柏林的第三天，特去參觀。該校本僅為體弱的小學生而設，校址在森林中，天氣和暖時即在露天上課，冬天嚴寒及下雨時始入板屋中工作。自一九二三年起加設中學，現有男女生四百人，雖不寄宿，但均全日在校。除一般功課外，對於身體活動及團體工作特加注意。

五 捷克丹麥的民衆體育會

捷克是歐戰後新興的國家，但是對於體育的提倡也不遺餘力。捷克以前是別人的屬國，（大部分屬奧國，關於建國的略史請參看生活七卷五十期，一個新建立的國家一文，）因此他們的體育便由幾個熱心家自動的提倡，直到最近才得到政府的贊助。他們的民衆體育運動可說是創始於一八六二年 Tyes 博士所發起的 Sokol 運動。Sokol 是他們古代神話裏英雄的名稱，而這個運動便是紀念這些英雄的一種普及體育運動。這位博士本是捷都大學及高工的藝術史

教授，對於民衆體育極爲熱心。他的格言是以體育與人格並進。一八六二年這個組織初成立時，祇有七十五個會員。他一方面作實際運動，一方面編輯體育教材，自一八七一年還開始發行體育雜誌。他的朋友幫助他建立了一個民衆體育館。經過二十年的奮鬥，到了一八八一年，會員人數得千六百人，於是在捷都舉行了第一次會操，參加者約七百人。自後人數激增，有如下表：

年 次	分 會 數	會 員 數
1862	9	265
1865	20	1,943
1871	106	10,448
1887	171	19,817
1894	352	36,042
1898	508	45,208
1905	671	58,968
1910	916	95,078
1913	1,080	128,017
1920	2,629	327,873
1930	3,144	663,702

他們的組織是十分平民化的。每一分會每年有全體大會一次，決定一年進行事業及經費，推舉執行委員，計有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或多人，男組長一人，女組長一人，教育長一人，其他委員若干人。若干分會（二十至一百）因地域關係，得組區會，區亦有分會代表會及執行委員。各區會合組全國協會。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同時舉行大會操，近年大會操到者常在數萬人，影響於全國體育進展上甚大。入會新會員必須經該會審查合格，對於個人

人格方面特加注意，且入會最初半年為候補時期，無選舉及被選舉權，而須受相當訓練，凡二十六歲以下必須從事之定期的體育活動，其他的亦至少須聽講該會歷史與宗旨若干次。半年以後證明確有入會的資格，始宣誓入會。捷克除此大規模的體育協會外，尚有運動協會，會員約二十萬人；捷克籍德人體育會，會員亦二十萬人；新會共和黨工人體育會，會員十萬人；天主教體育會，會員十一萬人；無產階級體育會，會員四萬人；其他體育會三十餘，會員各數萬。捷克民衆體育組織可稱普及。

丹麥人的身體素稱高大，民衆體育方面除民衆高等學校極力提倡外，民衆自動的組織也不少。最著名的有丹麥運動協會，已有近四十年的歷史，分會凡八百五十，會員約八萬五千人，丹皇也是會員之一。成立稍後的有體育協會，會員多為市民，會員有一萬七千五百人。此外尚有其他體育會多種。丹麥各體育會於一九二八年亦曾舉行聯合大會操，參加者在七千人以上。近年以來丹麥對於民衆體育領袖人才的訓練，頗為注意，有九所民衆高等學校設有體育師資班，更有兩所專為訓練此種人才的民衆高等學校，均男女兼收，男子於冬季上課，女子則於夏季上課(這是民衆高等學校的通例)。

我們看了上面所講的，可以說南歐諸國的體育是由政府提倡，而北歐諸國則多由人民自動組織的，其目標則皆在於體育的普及，一致認身體的訓練是強國強種的基礎。這種根本的設施，我們看了能不驚心動魄而自覺慚愧嗎？

2. 歐洲教育的生活化

一 青年運動

我未出國以前，已久聞青年運動瀰漫於全歐。廣州的德國總領事曾經送過我一本關於德國青年運動的書（已由趙邦鏞先生譯出，民智版），我看了以後非常感動。在赴歐的船上，過了埃及以後，便來了一班意大利的青年團。他們是剛從埃及旅行回到意大利去。這班青年大都年齡在十二三歲之間，非常活潑可愛，雖經過長途的旅行，精神仍然很好。我們坐的是意大利船，他們雖買的是大艙半價票，船上人却不叫他們到深入下層的大艙裏住而請他住在頭等艙上面的甲板頂上，——那上面簡直就是一個大露營，在初夏的天氣裏日光空氣都非常充足。他們在船上的生活也是很有規律的，而這次旅行在學識上所得更未可限量。據說意大利素以地中海主人自命，因此他們特別獎勵青年到地中海沿岸去旅行，輪船火車都予以種種優待與便利。所以意大利的青年運動，其志真不在小！

意大利的青年團稱巴里拉（Balilla），是紀念一個愛國童子而命名的。這個童子因歐戰後奧兵駐意大利的熱那亞（Genoa）城不退，憤而用石子趕他們，激起城中大眾的勇氣，一致決心的把奧國軍隊逐去。因此全國青年都以他為模範。十年前墨索里尼當政，便以黨的訓練來組織青年團。凡八歲至十二歲的兒童一律受初級訓練，稱為預備隊，十二歲至十六歲的青年則受中級訓練，稱為前進隊，十六歲以上的青年則選其有組織才能者組成幹部，更受高級訓練。本來法西斯黨是極端的國家主義派，對於青年的黨的訓練，便以認識意大利為中心，因此國內旅行便成了青年團活動的中心，到現在已逐漸擴張其旅行地帶到國外去了。他們在旅行以前，先研究路程

及目的地，有了充分的準備才踏上征程。青年團在國內的旅費往往不過普通旅客所費的十分之一，而每到一處即有黨部爲之招待接洽介紹說明等。回來以後再詳細的討論研究報告。在此地要附帶聲明的，青年團並不以學生爲限，不過小學教育是義務性質，因此受初級訓練的幾全在學校裏。至於十二歲以後離學的青年，因爲已受基本訓練，很容易繼續下去，而且各地有社會青年團的組織，由國家派人按時訓練，也時以旅行爲重要活動。

我到德國去參觀學校，每間學校的當局都說他們有一班或更多的學生在外面旅行。德國青年運動的特色是他們的自動精神。國家並沒有正式的組織，只是讓他們自己去做，不去干涉而去鼓勵，至於私人及團體從旁贊助的更是不少。所以最初在二三十年前，這個運動只是少數青年反抗學校桎梏的一種行爲，在我們的道學先生看來，簡直是逃學，到現在已爲全國公認的一種良好教育方法，其進步在歐戰後尤爲顯著。在這個運動開始的十年中，他們常感到困難的是住宿問題。德國的土地面積本不算小，而他們又是很喜歡步行的，因此每次旅行常常來回需要十天八天，在路上住宿要找價廉而合於衛生的寓所真非易事。幸而有一位伴他們旅行的青年教師，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就是把原有的官舍住宅寺院學校工廠農舍現在無人佔住的，改成青年旅舍，聘請曾經服務有經驗的退職教職員來管理，到現在這種青年旅舍全國已達二三千所，每年全國青年在裏面過夜的在三百萬以上。取費既微，且有極好的嚮導，到了晚上同他們講談本地史蹟名勝風土人情。而飲食起居又極簡單而合於衛生，真是德國青年的幸福！德國自從青年運動盛行以來，全國青年對於立國背景與現勢不獨頓改舊觀，不再亂發空論而從事於實際問題探

討，且更感自身責任的重大，於是有所謂‘青年文化’出現，對於今後德國復興的貢獻真是不少。

我在法國出席新教育會議的時候，正遇到一班奧國來旅行的青年。他們的年齡大概在十四五六歲之間，男女皆有，共約十餘人，有一教師同行。他們的紀律是自己公約而很嚴明的。無論何時何地不得有個人行動，一切不正當行為固不許發生，即吃烟吃酒亦在禁止之列。至於旅費則隨地籌集，但並不是向人強捐，而是到一處即表演一次或多次，如音樂，戲劇等，尤其是他們本鄉的民歌民舞，極受人的歡迎，大家看完以後，隨意樂助，他們生活既簡單，復多步行，因此用費極少，大概所得很足敷支出之用。大約青年旅行在學生上課時多不出本國，到了假期則多出國外，但都有極濃厚的教育意味在裏面，實在是一種最好的生活訓練！德奧北歐諸國的青年運動是自動的，行之較久，南歐如意大利等國看見他們成效顯著，便以政府的力量去推行，更含有黨的意義

二 實 驗 小 學

新教育運動也是起源於十九世紀末年而瀰漫於現代的歐美的。這個運動一方面採取寄宿式中學的舊精神，一方面滲入心理學教育學上的新理想，我們已在別處討論過了（參看教育研究第廿二期及東方三十卷十號）。大抵中學方面受舊精神的影響大，小學方面受新理想的影響多。我在國內久聞漢堡實驗小學之名，在丹麥捷克瑞士意大利也參觀了幾個實驗小學，都使我十分欽佩，可惜我到英國法國的時候，各學校已放假，沒有機會去看他們的實驗小學。

漢堡的實驗小學的確是最澈底的，他們自歐戰以後便把一切的

束縛打破了，一切從創造着手。因此他們最初既無功課表也不分班級，一切都由兒童自動，雖則他們的教師是都具慧眼能隨時隨地因勢去利導兒童的。十餘年來經過長時間的實驗，到現在總算有了比較固定的時間表與班級了，但是這張時間表與這些班級的劃分還是可以隨時取消的，而且每天每班必有一節自由時間，在這節裏，兒童可任意的活動，讀書好，畫圖好，做手工好，做算術也好，一個人獨做好，若干人合做也好。在這個自由節裏，兒童們往往發現了新興趣新才能與新需求，常常便決定下一週裏所想做的活動。我去參觀的時候，便看見有一班兒童正在上自由節，他們那種快樂而專心的態度真是任何班上所看不見的！有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正在用紙糊一個運貨汽車，糊好了我便向她要來做紀念，經教師說明我的意思，總算允許了，但她對於這個產物到我手的時候，她很有點不捨得。漢堡實驗小學最大的貢獻不僅在新方法的發現與實驗，而且在新教材與組織。他們語言課上用的教材，我曾得一位教師爲我詳細指示。他們有幾櫃子的教材都是從雜誌報張中搜集剪粘下來的。每個兒童都任搜集之責，經過幾班兒童的搜集，真是無美不備，而且大都有圖畫的，詩歌也不少。這固然是由德國現代期刊內容之豐富，但把這些材料組成系統，也費了不少教員與兒童的心血，不過所得的都是活的材料而且分量很多很有興味，比之抱幾本課本讀讀，其裨益真有天壤之別。此外還有幾櫥的課外讀物，也是大家從家裏帶來互相借讀的。漢堡實驗小學校舍很舊，設備很差，經濟情形在戰後很壞，然而勇於進取的精神真可佩服，他們實驗的結果已影響德國其他各地了。

捷克丹麥的實驗小學設備均很充足，而捷克的校舍又多新建，

對於走廊的建造特別加闊，不但於休息時可免擁擠而供遊息之用，且有掛衣鐵絲箱，清潔利便。捷克實驗小學在首都凡二十餘所，概由捷都大學教育學系監督指導，以期理論與實際的合作。所編教材亦多新穎，對於自由畫提倡頗力。丹麥實驗小學對於課外活動特加提倡，故有廣大的大會堂與體育場。兩處政府，對於實驗小學的經營，都可說不遺金錢與人才。

我所參觀的瑞士的實驗小學是附設於盧梭學院的。關於盧梭學院將於他處再談。這所小學人數不多且年齡皆在十歲以下。對於手的訓練特別注意，有許多新奇的教具。兒童的手工作品極富於藝術性。藝術本是發揮創造性最好的過程，由此可見他們教育的着重點，他們的校舍是一間住宅改的，頗有家庭環境，於幼年兒童的訓練極為相宜。他們另有一間為高年級兒童及青年而設的實驗學校，可惜我沒有時間去看。

在意大利我所看見的實驗小學便是意大利政府新為蒙台梭利女士費去二百萬建造的學校。這間學校的校舍設備可稱最新穎最完備。蒙台梭利對於幼稚教育的貢獻早為國人所熟知，她的教具‘恩物’是很有名的。現在年年還有增加，而且不但為幼年兒童用的種類繁多，為中年級高年級兒童用的也有許多比較性質複雜變化繁多的各套。我對於這間校舍的幼稚園造法更覺有趣。幼稚園所佔的地位是樓下一層，大約可容一二百人，但中間用高不過成人的小櫥隔開，每組不過一二十人，各有其恩物一套，這些小櫥便是藏小朋友的用具衣帽玩物的。在個別作業時各組兒童各不相擾，在團體活動時則一齊到中間較大的一廳中。而教師則不須每組一人，因為他擡起頭來便可各組一目了然。幾個教師可以互見而各指導數組。

三 民衆教育

歐洲的民衆教育也是興起於十九世紀末年而盛行於歐戰以後的一種教育生活化的運動。這種運動在北歐諸國尤稱發達，因為北歐諸國的初等教育已在前世紀普及，所以他們的民衆教育是超於初等教育的，至於南歐諸國的民衆教育僅是一種掃除文盲的工作，其程度不過與初等教育相等。我此次所看的，有丹麥與捷克的民衆教育事業，茲分述於下。

丹麥的民衆教育機關固以民衆高等學校爲最著名，但是除此以外，尚有工人教育會，圖書館，大學推廣工作，民衆組織等。工人教育會已成立十年，每年所做工作有鄉村講演（計一九三〇年有一四一種，每種六次，聽者兩萬五千人），城市講演（一九三〇年凡四四六次，聽者六萬人），讀書會（約四百個，四千會員），勞工學校（十所八百人），鐵路郵電工人學校（八所三百人），讀書會領袖訓練班（十三次四百五十人）等。丹麥全國有城市圖書館約百所，鄉村圖書館七百餘所。大學推廣工作以有系統的講演爲中心，講演前先印發大綱，講演後且舉行討論，計二十五年來曾舉行一千三百餘種講演，其中以科學講演爲最多，約占半數，次爲歷史，文藝，社會科學等。民衆組織中以通俗教育促進委員會爲歷史最久勢力最大。各地的鄉土民俗研究會亦頗活動。合作社的發達與普及亦已名滿全球。

丹麥的民衆高等學校普通性質的現有六十所，約六千五百學生，農業性質的二十二所三千學生。此類學校幾爲個個農民所想進的，實際上已入學的已占全數之半，他們既無所謂農業，也無所謂學

分，更無輝煌的校舍。他們的教師與校長都是一刻苦耐勞具有熱烈的心臟，願意下鄉去與民衆共同生活的，在冬季農閒的時候一羣一羣的農民便收拾一些簡單的行李，到這些學校去，共同生活三四個月。這些農民知道普通的民衆高等學校並不是給予高深學識的所在，他們進去的時候本不存有自居於知識階級的心念，但是他們知道跑去幾個月是可以得到許多同情的導師與同伴，共同研究大家的問題，尤其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敬愛，在他們今後生活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丹麥近年以來農業經營因合作的收效，許多農民的景況很過得去，進這種學校所費也不多，因此大家都願意至少去受一次這種教育，而這種學校也非與社會生活十分接近不能立足！這幾十間的民衆高等學校中尤以 Askov 的程度為高，裏面的學生多已入其他民衆高等學校而想更深造的，他們往往繼續的來學兩三個冬季，有些便出去擔任其他民衆高等學校的教師。

捷克的民衆教育事業近年以來亦頗發達，單以講演而論，照前數年（一九二七）的統計每年舉行次數在五萬以上，聽者達三百八十餘萬人。捷克的公立圖書館自一九一九年通過提倡法令後，進步也一日千里，計全國在一九二九年已有一萬六千餘所，藏書五百餘萬卷，利用者達一千五百萬人。全國養成圖書館員的專門學校有兩所，而各師範學校均有圖書館學及民衆教育學程。此外專為養成民衆教育領袖人才的專門學校全國凡十七所。捷克在民衆教育的實施，對於幻燈放影及活動電影特加提倡，全國設有幻燈片收集中心所，所藏幻燈片二萬餘張，各類題目均有，活動影片數百卷，凡講演及其他民衆教育機關均可借用。捷克國父現總統馬賽立克對於民衆教育素極注意。捷克首都本有一文化協會，成立於一九〇六年，內

分演講、圖書、藝術、組織、書目、電影、及青年等部，常受總統的贊助。在他七十歲的時候，信仰他的人捐集了一筆巨大的‘國父基金，’到了他七十五歲時，便在這筆基金裏提了四百萬圓出來給民個文化協會，而這個協會也改稱為‘馬賽立克民衆教育院，’在這衆教育的促進上力量甚大。

四 歐洲教育生活化的動向

從上面所講的看來，歐洲的教育制度可說是正在醞釀着一種改革，不過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一種制度的推行必須經過長期的研究與實驗，不是一紙公令所可奏效的。在兒童方面的實驗，注重於新教材的搜集新工具的創製，再經幾十年的努力，必可形成一種真正以兒童爲本位的教育。在青年方面的運動，注重於青年自身的解放與本國及世界文化的認識。本來現代的世界，是青年人的世界，這種運動推而廣之，幾十年後的青年必可肩起繼往開來的責任，爲全世界創建新文化在成人教育方面的推進，積極使教育與民衆發生密切的關係，使大衆時時感到教育的需要，一面做一面學，做學相長，這種教育可以使社會不斷的在改造程序中。這三方面的努力，都是打破以書本爲本位以傳遞過去文化爲唯一職責的狹義教育而代以以宇宙爲範圍以整個人生爲學習期的廣義教育。這種改革當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有賴於多方面專家的心血去創造的。過去的教育在社會改造的工作上所發生的影響未免太小了，在國內因此對於教育力量懷疑的人日見加多。但是假如到混亂的歐洲一看他們在教育上的奮鬥，我敢信許多人不能不改變態度，而更深切的認識現代教育力量的偉大！

從這一點看來，歐洲人的活動似乎超過美國人的。在美國，教育的實驗似乎還只限於兒童方面，青年方面的活動也多以學校為範圍，許多青年還沉醉於拜金主義的空氣中。這固由於美國處境與歐洲各國的不同，然而教育家的眼光狹小似乎也不能不負相當責任。我們的處境不獨不能與美國比，且不能與歐洲任何一國比，擔負教育責任的同志們應當如何的去努力創造？一般的民衆與青年們又應當如何的猛省？

3. 歐洲教育的尊重專家

一 歐洲不信任教育專家嗎？

現代的世界是分工的世界，任何事業皆須專門的學識技能，何況責任重大決定民族命運的教育事業？然而國內近來的風氣漸漸有以為教育事業毋須專家去擔負的，尤其可笑的是迷信西洋什麼事都比我們好的人們往往以為歐洲教育事業向不在專家之手可以藉為口實。這種迷信本不值我們去批評，不過這樣的引證是靠得住嗎？我這次去考察特別留意這個問題，據我發現所得完全不是這麼一會事。我在歐洲到處看見教育事業是在專家指導之下。上面已經提到捷克首都的實驗小學，經費雖出於地方政府，教育上指導的責任是由大學教育學系負之，所以成績昭著。至於其他各國的教育事業亦莫不聽命於專家，最著名的是英國教育部的諮詢委員會，法國的最高教育會議等，在教育界都是有無上權威的。我這次親眼看見的，在意大利有國立高等師範，在德國有中央教育研究所與漢堡大學的教育研究所，在瑞士更有具有國際勢力的盧梭學院今分述之。

二 意大利的國立高等師範

法國的高等師範制度是全世界聞名的。意大利的高等師範便是仿法國的辦法，計全國凡三所。我所參觀的是弗羅侖司的一所。弗羅侖司高師校長科的諾拉 (Codignola) 博士是國際聞名的一位教育專家，我早已託人寫了介紹信去。我到弗城的當天，便接到文化協會來信說他已派定一位畢業生（現任中學教員）招待我，第二天這位先生便帶我到高等師範去。高等師範的校舍並不大，但頗為莊嚴靜肅，一進去便感到一種學術的空氣。教室除一兩個以外都是很小的，可見他們對於個別及小組訓練的注意。圖書館却很大，藏書頗為豐富。課程分兩種：一種是為準備中等教師的，四年畢業；一種是為準備小學校長及視學的，三年畢業。學程有以一年計的，但多數以兩年為單位，可見極重質而不重量，內容有意大利語文，拉丁語文，法國或英國語文，德國語文，史，地，教育學，哲學及哲學史等。學生入學考試極嚴，有筆試及口試，所取人數不多，故教授指導上便利而親切。

科的諾拉校長同時任文化協會會長，文化協會會址即與高師校址毗連，有門可通。文化協會除發行各種書報外，且費大部分精力提倡鄉村教育。弗城附近兩省鄉村小學受文化協會輔助的凡九百餘所。招待我的這位先生會同我專乘汽車去參觀好幾間鄉村小學，有的已經放假了，聽見我去參觀，事前召集學生重行上課，厚意非常可感。文化協會對於鄉村小學的校舍設備等均定有經過研究的標準，這些工作當然高師的學生參加的不少，由此可見文化協會實高師的一個推廣機關，他們的理想便可在各小學裏去試驗。

三 德國的教育研究所

我所看見的德國教育研究所計有兩處：在柏林的稱中央教育研究所，在漢堡的屬於大學稱漢堡大學教育研究所，前者推廣重於研究，後者研究重於推廣，本來這兩件事是有密切相互的關係的。柏林的中央教育研究所性質很有點像美京的中央教育局，以傳布國內外教育事業的消息，尤其是新實施，鼓勵各方面的教育研究與實驗為宗旨，係半官性質，凡國外教育界同人赴德考察，可由此機關招待指導，同時設有完備的圖書館與陳列所，並隨時舉行短期講習，供國內外教育家的參考。關於德國教育新設施，該所出有專書多種，每年復出年刊一種，報告德國教育上一年中的進步，月刊一種載各種關於教育的論文。漢堡大學的教育研究所與心理研究所合設一處，有圖書室實驗室研究室多間，設備頗好，在內研究者或為得該校學位，或純為學術研究，漢堡本為新教育實驗的中心，各實驗學校與教育研究所有密切的聯絡，研究所常召集各教師舉行討論會，所以他們的研究不僅是學理的，而且是有實際影響的。

四 日內瓦盧梭學院

日內瓦的盧梭學院本是少數對於教育有研究興趣的私人於盧梭誕生後二百年（一九一二）紀念時創立的。歐戰以後日內瓦成了國際聯盟地址所在，地位驟增重要，至一九二九年日內瓦大學鑒於該院成績昭著學生發達乃認為大學各學院之一。我到日內瓦的時候，適值該院舉行二十週紀念，慶祝情形異常熱鬧。院內工作種類繁多，所研究的問題多與心理研究有關係，因為裏面的重要人物多同時

是心理學家，他們對於兒童教育實驗（有實驗小學詳上文），遲鈍兒童研究，職業指導工作，教育病態問題，教育心理測驗等尤有貢獻。設備則除實驗學校外有圖書室實驗室等，圖書室對於兒童讀物教育法令搜集甚富，各國的都有（中國的兒童讀物書目，係由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代開後選購的）。國際教育局是該院專業的一種（詳下文）。該院除教授研究外，亦收研究生，研究年期不等。滿足日內瓦大學所規定之學程，可得博士學位。該院出版書籍亦多，除院內各教授研究報告外，曾介紹他國教育學說與實驗，翻譯各國教育名著等。對於國際教育集會，該院重要份子亦時有加入。該院學生來自四十餘國，其研究的影響已達於全歐洲了。

4. 歐洲的國際教育組織

一 日內瓦的國際教育局

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到日內瓦的盧梭學院內附設有國際教育局。該局於一九二五年由該院發起成立，一九二九年後已改組成為獨立機關，但仍設在一處。該局希望成為教育上的國際聯盟，惜截至現在加入的國家尚不多，計有：瑞士波蘭西班牙埃及捷克比利時及南美的哥倫比亞厄塊妥等。凡加入的國家有參加大會決定局務的權利及供給經費的義務。局中每季發行季報，除報告局務外對於國際教育消息及重要書報盡力介紹。各國人士來歐考察的可由該局介紹至各地教育機關，暑期且與盧梭學院合辦講習會，討論各國教育新設施。近年以來與盧梭學院合作廣為搜集各國兒童讀物及教育法令，出版有兒童書目，讀物研究，及五十三國教育制度等書。惜該局因參加的國少，故經費也不充裕，發展尚需時日。

二 日內瓦的國際學生互助社

日內瓦的國際學生互助社成立於歐戰後。歐洲的大學本來祇是經濟力量較為充裕的才可入學，但自歐戰後許多大學生無力繼續，因此熱心救濟的人，一方面設法捐集款項幫助他們，一方面鼓勵他們仿效美國半工半讀制度去繼續求學。歐戰以後，歐洲教育制度漸趨於單軌性質，經濟力量不足而欲升學的人驟增，因此這個組織便更擴大，成為扶助各國大學學生的總機關。該社有立法機關稱 Assembly，會員凡十五至二十四人，每年自行改選三分之一，現計有英美德法各三人，荷蘭二人，瑞士奧國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印度各一人。下設二分委員會：一為文化合作，一為社會服務。總辦事處設在日內瓦，內有總幹事一人，幹事五人，其他職員六七人。各國設有委員會的計有美國加拿大南非洲保加利亞幼哥斯拉夫新西蘭英國德國法國荷蘭捷克蘇格蘭等。此外則在澳洲比利時中國丹麥芬蘭希臘匈牙利波蘭瑞典瑞士土耳其等國設有通信員。現在社中工作約可分三方面：(一)提倡學生自助，如組織合作社，廉價餐館，學生貸款，醫藥中心等；(二)協助入學，職業指導，及介紹服務等；(三)舉行集會研究各國文化及政治經濟現狀等。每年舉行全世界學生大會一次，分區學生會二三次。出版物除年報季刊外有轉變中之大學教育一書，編輯中的有大學職業指導一書。

三 丹麥的國際民衆學院

丹麥的民衆教育既蜚聲宇內，各國來考察的絡繹不絕，但是識丹麥文的不多，國外學生跑到民衆高等學校裏去莫明其妙。國際民

衆學院因此應時而生，於一九二一年成立。該院設董事部，董事二十三人都是丹麥教育界重要人物，此委員會指定常務委員五人，管理校務及聘請校長。在德英美三國且有合作委員會協助選擇學生及募集經費與獎學金。每年上課分兩學期：一自四月二十至七月十號，一自十一月三號至三月底。所授功課有國際關係，比較勞工運動，農民運動，比較民衆文化，社會問題等。方法一如其他民衆高等學校，以討論共同問題交換意見爲主旨，除上課外注重小組討論。學生在校研究若干時間後，可由該院介紹至丹麥各民衆高等學校參觀。該院最初成立時不過二十四人，現每年學生總在百人以上，除外國學生外，丹麥學生也不少。這不但是外國人考察丹麥民衆教育的一個好門徑，也是丹麥民衆教育事業向外推廣的一個有力機關，而且是各國學生共同生活互相做朋友的絕妙場所。該院院長馬烈克氏曾於本年一月間來華講演，希望中國多派些學生去留學，該院收費極低而所得却多！

四 倫敦的世界成人教育協會

世界成人教育協會也是歐戰後成立的，總機關設在倫敦，歐美各國都設有分會，他們的目的是聯合全世界成人教育運動者，互通消息及研究共同問題。會員分個人及團體兩種。他們的倫敦總會除有常駐職員及設立圖書室與招待處外每年派人至歐洲各國考察聯絡，并籌集經費交換成人教育講座及使各國辦理成人教育實際人才交換參觀。自一九一八年成立至現在已出有五十種小冊子，報告各國成人教育近況，近且出有季刊一種討論成人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前年曾召集世界成人教育會議一次出席者有各國成人教育者，會序中

有討論有講演有報告，并合編有世界成人教育概要一書。我在國內已與該會通信多次，在歐游歷，得該會介紹，參觀成人教育機關多種，所以一到倫敦，便去奉訪。會所在倫敦文化中心區 Russell Square 左近。據該會中人云，會中經費因受世界不景氣影響，近極感困難，幸有熱心會務者不斷的盡力捐助，尚不致停頓，但現在祇能維持，不能擴充，第二次世界成人教育會議，雖感有急待召集之必要，尚不能預定期日云。

五 第六次世界新教育會議

新教育國際聯會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總會也設在倫敦，分會有二十多個。世界新教育會議本定兩年開一次，最近則改爲三年一次。第六次世界新教育會議於一九三二年在法國尼斯開會，會期凡十二日，與會者凡五十八國一千八百人。會序大致可分演講會、討論會、研究會、交誼會、活動電影等。演講會有分組與全體兩種：分組的由各人選定題目去講，任人去聽，全體的則由會中先期約定，題目以‘教育與社會變遷’爲中心。討論會以題目分組，計有：文化教育與職業教育，家庭與學校，師資訓練，國際了解，兩重語言問題，幼稚教育，鄉村教育，心理與學校等組。研究組以某國或某種新教育分組，計有法國新教育，美國新教育德國新教育，兒童心理，個別工作，德可樂利制，蒙台梭利法，自我表現（藝術），教育與科學，文納特卡制等組。研究組由專家指導，幾等於上課。大抵每早有演講一小時，討論一小時，研究一小時，各組同時舉行，下午有活動電影，表現各國新學校生活；晚間有全體講演。星期日及開幕閉幕日有交誼會及旅行。

六 結 論

這次赴歐爲期甚短，幸賴事前接洽及舟車銜接，尙能充分利用時間，於出席新教育會議前後至意、法、瑞士、德、英、丹麥、捷克各地參觀，并利用會議與各國教育領袖會談討論，對於歐洲教育大勢所趨，略得梗概。本擬延長考察期間並赴蘇俄一看，奈爲職務所羈，經費所限，未能如願以償，殊爲憾事。不過歐洲自大戰結束後，對於體育的注重，學校的生活化，專家的訓練與信任，國際的聯絡，確實在增加的努力。雖到現在，歐洲的經濟狀況不但未能恢復，而且日陷於窘境，然而他們從沒有對教育失望而祇有更爲加功求進，這種奮鬥的精神真可佩服。就是他們的國際集會，參加的踴躍，會序的豐富，佈置的週到，也令我們五體投地。返觀我們的國家，面積之大不亞於全歐，教育的新建設有多少？開會的成績又如何？但是我們不要灰心，不怕困苦艱難的做去，總有勝過歐洲的一天！

(中華教育界二十一卷十期，十一期)

葛龍維的學說及其影響

一 楔子

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往往在他自己的時代不爲人所注意，甚或爲大衆所輕視所譏笑，至少他的理想他的見解不爲一般人所了解所贊同。這種人的主張，有時在他死後才爲人所頌揚才被人去實施，有時直到他死後一百年二百年方感他的偉大。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很多很多，因爲這班人真是所謂‘站在時代的前面，’他所見到的感到的遠在一般人之前，在當時很難爲人所了解的。我們現在看盧梭在政治方面社會方面以及教育方面的貢獻是何等的偉大，但在當時幾乎受盡了人家的笑罵，甚而至於被人目爲瘋子！

葛龍維的遭遇雖比之盧梭的是好得多了，因爲他還總算有一個‘正當’的職業，至少在他未死之前，有一小部分人了解他，崇拜他，而在他死了不久，他的祖國對他已有了相當的表示，但是他的人格他的貢獻的偉大到現在還沒有令到全世界的人感到。我相信將來他的地位必定比之現在的還要高得多，他的名譽不僅限於他祖國，而且要普遍到全世界！

二 身世

因爲他在全世界的思想家中，還沒有占到相當的地位，所以我恐怕我們敵國的同人中曉得他的還不多，要先把他的生平來介紹一下，雖則我的朋友雷賓南先生已在教育雜誌二十卷九號中有過一篇很好的傳記。

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 (雷譯格龍維，我給他按上一個中國姓以便於國人的認識與記憶)於一七八三年九月八日生於北歐丹麥的西蘭(Sjaelland)南方的一個沃遷村莊(Udby)裏。他的父親是當地的一位牧師，對於路得宗的基督教義很能謹守而傳施。他的母親出自名家，也以慈祥善誘聞。他小的時候就從他母親那裏聽見許多關於新舊約的故事和他祖先的功業。他家裏還有一個老女僕，也告訴他許多故事和歌謠，引起他以後研究歷史和民俗學的興趣。

稍長，他的母親便教他識字，不久他就能自己在他父親的書房裏找書讀，他在八歲的時候曾讀了一本路得傳。他在九歲時就離家去從一位教士讀書。後來他進了一間拉丁學校，在那裏住了兩年，學問大進。在一八〇〇那一年，他到丹麥的首都入了首都的大學。雖則他因為想討好他的父母而進了神道科，但他對於正宗教義已起了懷疑。那時他對於歷史及神話已有相當的興趣，但是他的思想還沒有成熟，他還在終日徬徨之中。又因為他是一個鄉下人，家非富有，衣衫不免襤褸，不能邀一般同學的青盼，但他感覺到藉此不理人倒也是一個好方法。

然而他不久便遇到一個好機會。他的中表弟兄史第文司(Steffens)剛從德法留學回來，在大學任教，大講其自然，歷史，個人人格，與詩詞等浪漫色彩的題目，所講的很合葛龍維的口味，他不免興高彩烈起來。他的性格本來受了兩方面的薰陶，一方面是歷史與詩歌，一方面是宗教，此時兩方面可以攜手而找到一條出路了。繼而他讀了丹麥詩人奧連施拉格(Oehlerschlager)的作品，大為感動，他大膽的嘗試自己在神話方面的創作。

他在大學肄業四年期滿取得神學學位後，跑到朗格蘭（Langeland）的地方去做家庭教師，做了四年，不幸對他的女主人發生愛情，經過幾許奮鬥，才脫離苦海，因此對於人生的意義大為覺悟。那時他一方面鑒於國勢的凌危，一方面對宗教上發生了新信仰，決意獻身祖國，從祖國歷史中去發現優點賞諸國人。他一方面從事著作，一方面在首都一間中學裏任教歷史。在一八〇八年他的第一部大著 *Maskeradeballetti*，同年他又發表 *Danmark* 出版他的北歐神話。這兩部書充滿了愛國熱誠，挽回人心不少，因為那時丹麥方面受拿破崙的指揮，一方面有英國的壓迫，拿破崙以封鎖大陸辦法對付英國，不幸的英國先攻北海，在一八〇七年攻入丹麥，幾有亡國之慘。這種情勢直到一八一四年拿翁失敗後才告緩和，但是丹麥已經吃虧不少。

他的‘神話’一書不但為丹麥學者所推重，且引起德人注意，不久便譯成了德文。他的學問頗為當代學者所賞識，他被邀入學會常與詩人奧連施拉格晤談。不幸，他的父親身體漸入衰老之境，於一八一〇年叫他回鄉繼任牧師，但是他試說教理的時候，主教竟認他非正宗教義的信仰者，不准他做，於是他對於教會的保守大施攻擊。不過他雖不以這些宗派為然，却深信基督教可以恢復丹麥民族地位。經過心理上的強烈奮鬥，他終於成功了一個宗教改革家。

一八一四年丹麥經過戰事後經濟既頻於破產，挪威又脫離而獨立，但他對於丹麥復興的信仰矢志不移。他再努力用他的筆來鼓舞人心，同時任雜誌主筆及以丹麥今文翻譯古史的工作，使大家感到丹麥文化的悠久貢獻的偉大，一致起來，作復興運動。從這個時候起，他感到專精的研究罩上學者的架子，與一般民衆是格格不入的

• 因此他的文筆力求通俗。他翻譯古史的工作，費了八年（1815—23）。他兩度主筆政，第一次三年（1816—19）第二次又三年（1848—51），都是用深入淺出的文字。

自一八一三年他父親逝世以後，他在首都八年沒有找到收入可靠的職業。他的翻譯工作還是靠了國家一千二百元的補助費方告完成。直到一八二一年他才找到一個鄉村牧師的位置。次年居然遷調回到首都來講道。一八一八年他和勃立舍（Lise Blicher）結婚。他們已訂婚七年。在許多困難中，他們共同奮鬥。不幸在一八二五年他和一位神學教授起了筆墨官司，他受了敗訴處分，他的著作也禁止發賣，到一八三七年才開禁。因此他在一八二六年不得不辭去牧師之職，以後六年又無可靠收入。幸於一八二九年得到了到英國博物院去研究史料的機會，得到一筆國家的補助費。他接連三個夏天都到英國去研究，得到材料及印象不少。一八三二年他才又被派為牧師，一八三九年以後他在首都一教堂中任牧師直到一八七二年九月二日死時為止。

我們看看葛龍維的生平事蹟，實在是平淡無奇。在他的少年時代他是感到煩悶，在他的中年時代，他的思想是成熟了，但是他的見解太與世人不合，因此他的境遇常在窘鄉之中，到了他的晚年，他的鋒芒似乎不像中年時代那樣露骨，在他的左右也有了一班人敬仰他，常去向他領教，然而人數不多，世上一般的人或者已經忘記了他，社會上也不過讓他安安穩穩做一點小事而不去理會他。不料到他的主張他的見解一點一點的為人了解起來。在他未死以前，祇有一小部分跟住他求教，他的理想居然部分的實現（詳下），到他死後，他的影響不但及於丹麥全國，而且及於其他世界各國。從他死

到現在不過五十年，他已得到‘北歐的先覺’的稱號！

三 學 說

他對於文化上的貢獻可說是多方面的：從繼往方面來說，上面已經提到他在歷史和神話方面有不朽的著作；從開來方面來說，他在宗教和教育上有至今未能完全了解的重大意義。可惜他自中年以後他主張‘活的語言’效用大於書籍，他自己的著作流傳下來的不多，而我的文字學識又太淺對於丹麥文是一竅不通，所以對於他的學說未必能知道得詳細。

他在歷史和神話的貢獻，除了上面所述及的以外，他還引起了英國學者的興味，他對於英國古籍的保存古詩的研究，使英國人自己慚愧。但是他的研究目的與方法完全和前人不同。他要把古代文化的精華，尤其是能激起民族意識的，選出來，用簡顯的文字寫出來，使全民族能了解接受，這樣他以爲才可以把固有文化發揚光大。所以他的‘世界史’他的神話釋義，都帶有詩歌意味，真是盡雅俗共賞之能事，因此他的著作生動活潑，令人手不釋卷的要讀下去。

他的哲學從沒有成一系統，但據哲學學者的意見，將來也許會成一派。在此地，他的地位很像歌德，他從沒有把他的學說用一般術語來寫成。他注意直覺而不贊成勉强的分析。他的方法是根據於歷史的和經驗的，他反對用論理的方法來研究哲學，因為要是這樣，就會和生活分離。

他的宗教主張當時引起大學教授的激烈反對，已如上述。他雖因歷史上的關係仍然贊成以路得宗爲國教，但對於教會內外的信仰

概主解放。他不以那時一般教士那種狹小的見解爲然。那時的宗教太過形式化了，一切都表示不顧實際，教士幾乎成了官成了特殊階級，對於經典也不許信仰的人自由解釋。他因此主張講教的人應本着他良心上的見解去講，信教的人應本着他良心上的感悟去信，雖則他感到丹麥的文化與宗教已結合多年不可分離。

他關於上述各方面的學說，可惜我的學識淺薄不能領略，祇能作一個簡括的敘述。下面要談到他對於教育上的主張，姑就我所見得到的來敘述一下。

他在學生時代對於當時的教育就不滿意，曾經編了一齣戲劇去譏笑這種制度。他以爲這種教育太形式化機械化，離實際生活太遠了。後來他自己有了幾度教學的經驗，更感到那時教育的不良。但他直到丹麥受外侮以後，他雖用極簡顯的文字，尙不能激起大眾的民族意識，他寫的關於丹麥文化的書也不能使大眾了解，他才積極提出他的教育主張。

上面說過，他曾三度留學英國，他除因丹英文化上關係致力於研究史料外，很用心觀察英國之所以強，丹麥之所以弱的緣故。他的結論以爲丹麥人的教育太善了，太形式化了。但他對於英國工業化的傾向却頗不贊同，他以爲丹麥固有農村立國的優點是應當發揚的。要發揚農村文化，當時學校商業化都市化的趨勢是要挽回的。

以前甚而至於現在世界各國辦教育與整個社會的進展是幾乎沒有什麼關係的，就是有關係，也是偶然的硬做的而不是經過一番深切研究的。葛龍維的教育理想和以後受他的影響所生的制度則不然。他一方面從歷史上來看，一方面從丹麥國勢上來看，丹麥國運的挽回是要靠丹麥文化的復興，但是這個復興運動他不久就感到不是

少數人關起門來死做所可成功的，也不是文字宣傳所可奏效，教育的責任實很重大，可惜當時的教育機關不能勝此重任，因此他毅然主張另行建立一個制度。他的主張與其他教育學者的主張有幾個根本不同之點。

他當時深深感到西洋文明工業化的危險，所以他要提倡農村文化，他要把學校設在鄉間，以為文化復興的堡壘。

他以為一個十八歲以下的人太幼稚了，身體智力都未成熟，對他們施教是沒有什麼效果的，施教的有效期間是在十八歲以後。

單就這兩種主張來說，他已經站在別的教育學者的前面不知多遠，到現在大家才開始了解這兩種主張意義的重大。這還不算。

他以為真正的教育在人格的感化，這當然以前的人也有說過，不過沒有具體的方案，而他則有之。

他以為考試記分講演讀書以至於一切固定科目都是使師生間接觸隔開的。強迫入學更不是好辦法。一間學校分許多班收上五六百甚而至於一千以上的學生，早上到校下午回家，這都是使師生隔閡的。因此他主張師生要少，要都在校內食宿，見面的時候和家人一般，用‘活的語言’來交換各人所感到的見到的。一切形式概行破除。所謂‘活的語言’是白話土話，發自肺腑，親切有味的。

他所提議教的科目是以歷史、國語、唱歌為主體。但歷史不是乾枯的事實敘述而是擇其要點說明文化的精粹，尤其注重本國文化的來龍去脈及貢獻的偉大。所謂國語不是推敲字句，講求文法，而是民間文學的欣賞，尤其注重文學上的歷史性與藝術性及貢獻的偉大。唱歌也不是一般流行的獨唱或合唱，而是自然的出於情感的呼聲。他採取許多民間的歌謠，他還自己編了許多通俗的歌，尤其是

與歷史宗教或文學有關的。這些科目一方面使大家感到丹麥文化的偉大，一方面使師生感到相互關係的親密，把學校的刻板生活變成活潑有生機的。此外，他還提議有一門功課叫做 Faedre andets Statistik，直譯是‘本國統計’，意譯可稱為‘本國現狀研究。’這門功課的內容是要把丹麥的人民生活和經濟狀況生動的敘述出來。不過詳細情形他自認他是外行，還待其他專家的研究，這種地方可見他的虛心。不過他以爲任這一門功課的教師最好曾經到過國內各地實地考察，教起來可以親切有味，如其沒有這樣的教師，與其照書本來講，不如要各處來的學生就自己的經驗發表出來互相交換。如果能叫學生自己實地去考察那更好了。因爲丹麥是個農國，所以他以爲他所要開的學校裏一定要有農場以及手工場，這並不是希望學生獲得真正的農工技術，而是要使學生了解丹麥文化的根原與人民生活的實況。

其他科目他主張教的有丹麥憲法，丹麥民法，地方政治，及關於語言數學自然史的功課，但他以爲不是人人要學一切的科目。

他雖感到這種學校是丹麥文化起死回生的機關，但並不主張強迫人人入學。他以爲強迫入學太機械了，結果徒令人討厭。他更反對政府去干涉校長的行政，他以爲校長要有獨立自由權，雖則關於學校重大的事，他應取決於評議會，而這個會裏面的會員應當大部分由學生推選。

對於入學權利的享受，他是不分畛域的。不但任何職業界的人都歡迎，而且男女一視同仁。這在當時是很革命的，因爲不獨階級觀念很重而且女子教育也沒有人重視。但他以爲入學後或離校後的學生不要妄自尊大，而應仍舊回到原有的職業界去工作，在工作的

時候應當對於人生和社會有更明確的見解，更高興的去供給去享受屬於民族大眾的文化。換一句話說，他希望受了他這種教育的人，不要自以為高於其他的人，而更能表現他是一個良好的公民。

他這種理想的學校，是希望普遍於全國的。這個理想在他死後是實現了，但在生前他祇親眼看見一個小小的起頭，我們在下面再說。除了這些學校以外，他還主張設立一間‘北歐大學’(Videnskabelig Højskole Fælles For Hele Norden)。

這間大學不是研究羅馬法典或其他類似的古典科目，而是把人生意義與發展加以廣闊精深的研究。這種研究須以實際生活為出發點，而以‘世界史’為終鵠。所謂世界史不僅敘述人類一切的活動而且包括科學上的發展。在方法方面，他也是主張用‘活的語言’來師生間與同學間互相切磋。至於考試學位等等，他主張一概廢除。可惜這樣的大學到現在世界上還沒有設立過。

我們看上面這種見解，即在現在已經是很新穎的，大概還有許多人是不敢拿來施行的，何況在一百年前他發表的時候，可見他站在時代前面至少是一百年。

我們再看看他對於文化全體的意見是怎麼樣的？上面已經說過，他雖羨慕物質文明，然而不主張極端的工業化。當時他看見丹麥受強鄰的侮辱，他是主張奮鬪的，但是他所主張的奮鬪以求民族的獨立為限。他不贊成侵略，但他對於讓人侵略是很憤慨的。所以他既不是軍國主義者也不是和平主義者。他不但不贊成去國外侵略，對於國內的弱小民族，他也是主張提攜而予以自由的，丹麥國境內有德國人，他以為他們的學校是應當用德語教授的。民族自存的奮鬪，他是極端主張的，但他感到人類全體必須合作，他的世界史便

是表明世界文化是一貫的。他是提倡民治的，但他不過於相信議會政治。

總之，他的見解不是趨於極端的而確有獨到之處。我們看看西洋文化今日所處的危境，而他在近乎一百年以前就料到了，不得不佩服他的高見遠識。

四 影 響

在葛龍維的晚年，相信他的主張的人已經漸多。前面已經說過，他的‘神話’被德國人譯成德文，他在英國研究史料感動了英國學者繼起研究。他對於宗教上的改革意見也部分的實現了。

一八三八年六月二十日，丹麥人舉行農奴解放五十週年大典，請葛龍維主講。他就用盡平生智力，傾吐三十年的積愫。他不但分析丹麥農夫所以有今日的由來，而且分析歐洲在過去五十年間農夫所佔的位置。他不但綜合觀察他們怎樣生活，而且綜合觀察他們的成功和失敗所在。他站在聽眾的前方，不但提示他們的長處短處，而且反復申明他所主張的‘民衆高等學校’的理想。

所謂‘民衆高等學校’便是他理想的教育機關。一八三九年克立斯登八世 (Christian VIII) 即 丹麥王位，居然對於他的提議深表贊同，不幸在位不久便逝世，他的計劃終成泡影。

他的‘民衆高等學校’直到一八四四年才有第一所成立於丹麥與德國的邊境。這個地方大多數的民衆是丹麥人，但是統治階級却是德人，因此民族意識很強，大家捐出錢來自動的照葛龍維所提示的辦法建立了一所民衆高等學校，在開幕的時候，葛龍維很高興的被邀去演說。不幸成立了沒有多久，丹德戰爭開始，這第一所民衆

高等學校不得不短命而於一八四八年關門。

那時有一位小學畢業生曾經略受過師範訓練的科爾特（Christian Kold 1816—1870）。他是從小生長於農村的，出了師範學校，曾教過小學，但對於當時的教育制度極感束縛。他於是漫遊歐洲，曾至首都聽葛龍維演說，後來跑到小亞細亞，但他的經濟很窘，曾替別人服役及訂書。一八四八年他剛回國便遇到丹德戰爭，他就投軍從戎。

一八五〇年他在鄉下做私人教師，聽見有一所破房子出賣，他想買來設立一所民衆高等學校，可惜他身上祇有五百塊錢。於是他跑到葛龍維那裏去，居然又籌到六百塊錢。他的民衆高等學校在一八五一年乃宣告成立。這一所學校很值得紀念的，因為物質環境和設備是很壞，然而精神却是很好。葛龍維的主張幾乎完全實現出來，後來所有的民衆高等學校也幾乎完全採取他的辦法。

這種教育制度經過五十年的奮鬥，成了丹麥文化復興的中心。在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民衆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已佔到中央及地方政府和議會中的重要地位。葛龍維所主張的‘田夫平民政治’居然實現了。丹麥在當時雖被德國打敗了，然而丹麥在國際上的地位却一天一天高起來。

一八九二年國會通過關於民衆高等學校的條例，正式的成了一個制度，與以定額的補助，然而對於內部行政及課程毫不干涉。到現在這種學校全國有六十多所，完全是私人創立的，學生數約七千人，男女各半。國家的補助費達五十五萬元。我們要記得丹麥人口總共祇有三百多萬，面積祇有一萬七千多方哩，比之中國任何一省要小得多，而民衆高等學校是如此之發達。

講到民衆高等學校間接的影響那是更大了。所用的方法已經瀰漫於整個教育制度，而生活訓練的效果已經普及於全國人民。我們一到丹麥，我們便感到丹麥人是何等刻苦耐勞而同時是何等的文質彬彬。個個人是腳踏實地不事虛浮的做事，個個人是忠於職務而沒有爭權奪利倣倖成功的傾向。所以我曾經說過丹麥文化是有西洋文化的一切好處而沒有他的一切壞處。這不能不歸功於葛龍維的高見遠識。同時葛龍維生前所提倡的‘丹麥協會’也已布滿全國。講演會有一千多個。

這種民衆高等學校的制度已由丹麥先傳到瑞典挪威芬蘭，後傳到德國英國美國，被大家認為一種很重要的教育制度。

我國人以為葛龍維的貢獻不僅限於民衆高等學校的創立，更不僅限於教育方面，而在於他能利用教育使文化復興，更在於他對於文化動向予以明確方針。丹麥的文化已為世界各國所注意，連東瀛的日本每年派去考察的總有百人以上。世界各國在今日局面中已到了生死關頭，如其再不及早放下屠刀回頭是岸，世界的前途不堪設想。在大家想求轉機的時候，對於丹麥一定會加緊研究，到那時葛龍維的學說一定影響更大而成爲‘世界的先覺者。’

他死後五十年，丹麥人已在首都建了一所大廟紀念他。他死後一百年，也許全世界的人都要替他建大廟，至少祇是我們的希望。

參 考 資 料

Statistisk Aarbog, Kobenhavn; 1929

Begtrup, Lund, and Minniche, The Folk High Schools of Denmar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Farming Community, London and Kobenhavn (New ed. 1929)

Davies, Education for Life, A Danish Pioneer, London, 1931

Boje, Borup, Rutzebeck, Education in Denmark, London and Kopenhagen,

Hart, Light From the North, New York, 1926

丹麥民衆學校與農村 孟憲承譯 商務

教育雜誌 二十卷七號十號

教育與民衆 一卷六號九號

村治 二卷六號

教育與民衆 四卷四期

民國廿一年游丹後三月作於廣州

蘇俄的公民訓練與政治教育

一 蘇俄公民的意義

一般公民的意義，是指凡受國家保護而對國家忠實的人民而言。凡成年男子及女子，在法律上並未犯罪，精神上亦無病態者，均有公民的資格。但在蘇俄，‘公民’兩字的涵義，便稍有不同。蘇俄人口總額，約一萬五千萬，但並非一切人民均能享有公民的權利。即同為公民，也常有等級的差別。蘇俄公民得分下列三種等級：

(一)特等公民

1. 黨員 蘇俄以黨治國黨員為特等公民。其權利與義務，與普通公民不同。（見黨員的公民責任節）

2. 勞工 蘇俄所謂勞工，是指獲有生產工具，直接從事生產工作的人民而言。蘇俄對勞工階級，最為優待。勞工階級，勢力甚大。

3. 勞農 蘇俄勞農階級，地位很高，和勞工階級的關係很密切，在五年計劃未施行之前，勞工和勞農並不能顯明地區別。因為普通勞農，常兼做勞工；農民有勞動工作的時候是勞工，但在閒暇的時期，便常返歸故鄉從事農作，所以也是勞農。但自五年計劃實行之後，勞工人數激增，因此蘇俄便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階級——勞工階級和勞農階級。不過蘇俄工業化的程度，還沒有歐洲各國那樣深刻，因此便沒有固定的勞工階級。而勞工因有許多親屬故友，留居鄉村，所以勞工和勞農，仍保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蘇俄的農人，因耕地的不同，經濟地位的互異，更可細分為貧農，中農和富農三階

級。除富農詳下外，分述如左：

(甲)貧農 政府對貧農，最為優待，其地位與待遇，和勞工相等。普通貧農，常無耕地，而受僱於人。

(乙)中農 政府對中農，亦加優待，惟不若貧農之甚。中農耕地亦少，有時僱短工幫助耕作。

蘇俄自五年計劃實行後，即進行消滅富農階級。現國家設有集體農場，凡大規模農作事業，均由國家經營之。

4. 工作同志

(甲)國營機關管理人員 蘇俄大規模生產事業，均由國營，如工廠，交通事業，集體農場和一切生產機關。蘇俄規定，凡實際從事生產工作的人員，始得稱為工人，而一切管理人員，不得稱為工人。但國營機關管理人員，稱工作同志，亦受優待。

(乙)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除政府機關服務人員外，兼指一切合作社、工會、職員而言。

(丙)黨務人員 黨務人員，除黨員外，指實際從事黨務工作和活動的人員而言。

5. 知識階級為國服務者 知識階級為國服務者，如科學實驗家，國立學校教授等。

(二) 次等公民

1. 富農 富農耕地廣大，常僱勞農耕作。但與坐收地租的地主不同。

2. 手工業製造者 蘇俄政府規定，手工業製造者，僱工限於家庭，即以不僱家庭分子以外之工人為原則。現蘇俄手工業製造者，人數已大為減少。

3. 知識階級 不反抗政府，亦不為政府服務者。

(三)非公民

1. 地主 地主擁有廣大土地，不事耕作，常租佃於人，或僱工耕耘。蘇俄規定地主為非公民，不能享受一切公民權利。

2. 小廠主 經營小規模工廠者，稱小廠主。蘇俄規定，小廠主得僱工四十人至六十人，從事工廠工作，但小廠主不能享有一切公民權利。

3.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之小商人 蘇俄革命時，曾廢除商人階級，規定一切商業，全由國營，但實施後，頗感困難，故頒行新經濟政策，以資救濟。規定大規模商業，由國家經營；至於小規模商業，則聽由私人自由經營。

4. 貴族教士，官吏 凡在帝俄時代曾任貴族，教士，官吏者，均不得享有公民權利。

蘇俄規定，非公民不得享有公民權利。所謂公民權利，最重要者為獲有選舉蘇維埃的資格和權利（蘇維埃是一種政治的集團，並非黨的集團）。所以蘇俄的農法，是完全根據經濟的地位，來決定選舉權的有無。

二 少年團與先鋒隊

蘇俄的少年團與先鋒隊，是一種黨的集團，也是一種政治性質的青年團體。有着嚴密整肅的紀律，積極宣傳政治的信條。以培養某種道德觀念和優美清純的生活為訓練目標。

(一)團員與現況

1. 十月團 (Octobrists) 凡六歲至十四歲的兒童，均得加入為團

員。現有團員三十萬人。

2. 先鋒隊 (Pioneers) 凡十歲至十六歲的兒童，均得加入為隊員

• 現有隊員二百萬人。

3. 少年團 (Komsomol) 凡十四歲至二十三歲的青年，均得加入為團員，現有團員三百萬人。

4. 黨員 凡十八歲以上的公民，均得加入為黨員。現有正式黨員一百萬人，預備黨員五十萬人。

少年團和先鋒隊，或先鋒隊和十月團，都是互相連續的團體。各團團員年齡上的複疊，正可使他們互相聯鎖和銜接。凡是政治上的重要問題，可以為年齡不同的青年所共同瞭解，更是一種預備或訓練的時期，使他們從低級的青年團體，逐漸升入較高級的青年團體。

(二) 組織與活動

1. 十月團 十月團的團員，年齡比較幼小。他們並不希望這般幼童接受政治或黨的知識，祇企求在潛意識中使幼童獲得一種效忠於黨的信念。十月團的口號是：‘列寧沒有兒子，我們都是列寧的兒子’。意思是說，凡為十月團的團員，必須敬仰列寧，以列寧為模範。普通十月團團員，應遵守下列四要點：

- 甲、扶助先鋒隊，少年團，黨員，及勞工勞農階級；
- 乙、準備加入先鋒隊為隊員；
- 丙、保持身體及衣服之整潔；
- 丁、愛好工作。

2. 先鋒隊 先鋒隊的隊員，是十餘歲的青年。蘇俄對於這般青年的訓練，最為注意。先鋒隊主要工作，在領導十月團。凡擬加入

先鋒隊為隊員者，須經二月以上的準備。先鋒隊的組織，每隊約有五十人，更分為五、六小組，每組約自八人至十人，凡為先鋒隊隊員者，應恪守下列各要件：

甲、六要點：

(A) 什麼是先鋒隊？ (B) 先鋒隊敬禮、徽章、和領結的意義何在？ (C) 誰是列寧 (D) 工人為什麼要慶祝十一月七日？ (E) 什麼是黨員和少年團？它們的目標和意義何在？ (F) 誰是蘇俄的敵人和友人(包括國內和國外)？

乙、五規律

(A) 忠於列寧和勞動階級； (B) 自認是黨員和少年團的助手； (C) 自認是全世界農工兒童之友； (D) 扶助鄰近的兒童； (E) 努力求知識技能，以扶助勞工階級奮鬥。

丙、五習慣：

(A) 保持身體的健康，養成衛生的習慣； (B) 養成工作力求敏捷正確不浪費時間的習慣； (C) 養成勤勞，堅持，與人合作，不畏艱苦的習慣； (D) 養成愛護公物和用具的習慣； (E) 養成不吸煙，不飲酒，不與人爭吵的習慣。

3. 少年團 少年團的主要工作，在領導先鋒隊。凡擬加入少年團為團員者，須經六個月的預備時期。在加入少年團時，必經嚴格的考核，認為已具有充任少年團團員的資格和能力及真能瞭解黨義時，始得入團。少年團的紀律，甚為嚴格，組織全採黨的方式。故此種訓練是一種最好的政治教育，也是一種最好的黨的訓練。據最近統計，新黨員中，有三分之一係由少年團團員升上來的。少年團在蘇俄社會上，頗受重視。少年團的主要社會活動，有下列各種：

甲、反宗教運動 蘇俄人民，在以前宗教熱忱甚深，普通信仰希臘教，但自革命後，政府即極力提倡消滅人民一切神祕和宗教的思想。現在少年團即積極從事反宗教運動。

乙、節制烟酒運動 蘇俄政府，努力鼓勵人民養成健全的生活。五年計劃中，即建議國產酒量，在一九三三年內減少三分之一。現少年團團員，厲行節制烟酒運動。

丙、民衆教育活動 少年團團員，常從事各種民衆教育活動。例如，舉行衛生宣傳，通俗講演，或提倡識字運動。

丁、創立各種新式學校 如工廠學校，專爲勞工在工作餘暇受補習教育的機關；青年農夫學校，爲授與一般勞農新式科學耕作方法的教育機關。各新式學校教師，亦由少年團團員充任之。

以上各種青年團體的組織，都仿黨的成規，凡滿三人就應該有組織。這種組織，是最基本的集合，稱爲細胞(Cell)。在此種基本的組織下，一切工作，都依照了預定的計劃進行。每星期常聚會一次，討論政治和社會問題。此外更有戶外活動，野外旅行，以及音樂與藝術等活動。

三 黨員的公民責任

一、黨的組織 蘇俄約有黨員一百五十萬人（正式黨員一百萬人，預備黨員五十萬人），其中工人佔百分之五十，農人佔百分之二十，工作同志及知識階級佔百分之三十（但少年團團員以勞農加入者爲最多。據統計，少年團團員二分之一爲勞農，可見黨對於勞農分子之吸收的注意）。黨內組織以黨細胞爲基本單位。凡黨員三人以上即能組織細胞。現全國共有黨細胞三萬。黨細胞之上級機關

，爲黨區分部等。

二、**黨組織原則** 蘇俄黨組織的原則，有下列各條：

1. 單純的組織；

2. 民主的集權；

3. 鐵的紀律：

甲、黨員奉命工作時，不論何時何地，均須奮勇前往。

乙、黨員不得從事剝削他人利益或勞動的工作。換言之，即黨員不得有資本主義的行爲。

丙、黨員對於任何工作，均須注意領導他人。工作時須較非黨員爲努力，更須多做工作。

丁、黨員除從事正式工作外，更應從事一切社會服務。

戊、黨員報酬，除特殊技能工人外每月至多不得超過二百二十五盧布。

己、黨員生活，不得過奢，應保持一般工人的生活狀況。

蘇俄黨員所負的責任，比較非黨員爲重大；但其所得報酬，則甚少。

四 政治教育機關

政治教育機關，係指普通一般教育機關以外的機關而言。在蘇俄，政治教育機關和黨員訓練機關，合併成一系統。但兩機關的性質，則稍有不同。政治教育機關，係爲非黨員及預備黨員而設，由人民教育委員會政治教育科與中央黨部宣傳科聯合舉辦。至於黨員訓練機關，則爲黨員所特設，由中央黨部舉辦。蘇俄政治教育機關，約有下列各類：

一、鄉村圖書室及紅角 鄉村圖書室及紅角，為鄉村政治教育實施機關。現全國共有四萬所。鄉村圖書室設備甚為簡單，常舉行講演，展覽等活動。至於紅角，則大都附設於各機關如工廠農場中。

二、政治文法學校 政治文法學校，即初級政治學校。分：(1)簡易科，為預備黨員的訓練機關。訓練時期，自二個月至四個月畢業。(2)正科，為正式黨員的訓練機關，訓練時期，規定自六個月至八個月畢業。(3)鄉村政治班，利用農民冬季三個月閒暇時間，予以相當訓練。有固定的及巡迴的兩種方式。

三、民衆學校 民衆學校分初級、中級、高級三種。各地設建校數甚多。

四、勞工學院 蘇俄革命後，勞工階級要求升入大學受高等教育。但實際上，工人程度甚低，故政府特設勞工學院。規定勞工擬受高等教育者，必先入勞工學院，受準備訓練若干時，始得升入大學。現蘇俄共有勞工學院七十所。

五 黨員訓練機關

黨員訓練機關，係為黨員所特設。黨員訓練機關，約有下列各類：

一、高級政治學校 高級政治學校，設各種專科班，如合作班等。訓練時期，約自一年至二年。

二、黨務學校 黨務學校，分初級、高級兩種。前者訓練時期，約自一年至二年；後者約自二年至三年。黨務學校高級學生，入學資格，規定甚嚴，凡在黨內服務或少年團服役兩年以上者，可由

黨部直接保送入學。學生一切家庭用費，亦由黨內津貼。黨務學校亦常設有簡易夜班。現蘇俄共有黨務學校三百所。

三、共產大學 蘇俄共產大學，種類甚多，莫斯科共產大學，專為蘇俄人民而設。西方弱小民族共產大學，專為蘇俄國外人民而設。中山大學，招收東方各國學生。東俄共產大學，招收西伯利亞，中央亞細亞各地學生入學。共產大學，第一學年專重學生學業方面的進修；但自第二學年後，則兼重社會服務等活動。

四、共產主義研究所 研究共產主義之最高機關，為共產主義研究所，如列寧學說研究所及馬克斯恩格爾學說研究所等。

五、紅軍 蘇俄現有紅軍五十萬人，黨員佔十分之一。凡充紅軍者，須受政治訓練兩年，退伍後更須從事社會服務工作。

(中華教育界二十三卷三期)

德國的生產教育與勞動服務

一 德國的補習教育

(1)德國補習教育的涵義——雖說歐洲有幾個蕞爾的小國，教育素稱普及，但較之德國，仍是望塵莫及。在德國，尤其是補習教育，辦理很是完善。德國的補習教育，不僅是普遍的，並且也是生產教育的中心(最近日本的補習教育，即效德國)。德國補習教育，更有其特殊的涵義：(一)凡小學畢業生，不升學者，必須在工作時間內，受相當的補習教育。因為歐美法律上，規定工作八小時(不景氣以來略有改變)，假如在工作的餘暇，施行補習教育，則工人身體疲勞，讀書和進修的效能，必因之大減。(二)德文Fortbildung有深造的意義，和英美所稱“Continuation Education”意義，稍有不同，更非中文‘補習’二字所可表達。(三)德國普通小學教育，定為八年完足，因此小學畢業學生，都具有普通知識和技能，程度已是很高，所以德國的補習教育，程度也是很好。同時德國政府，規定凡十四歲至十八歲的青年，每週至少應受六小時以上的補習教育，實施亦甚嚴格。

(2)德國補習教育之史的演進——德國補習教育，起源於十六世紀，一七五六年，德國某小邦，即通過普及強迫教育法令，但宗教色彩甚濃厚。迨一八〇三年時，復通過強迫教育律。最初規定補習時間，限於星期日，補習課程，亦帶職業性。及後始逐漸將普通性的課程加入，即補習時間，亦不限於星期日。

十九世紀的初期，德國聯邦政府的組織，毫不嚴密，各邦的地

位和勢力，也不相上下，惟普魯士較強。普、法戰後，普魯士崛起，便領導着各邦組織基礎鞏固的聯邦政府。當時因為各邦早已通過了強迫教育法令，所以聯邦政府，實施補習教育，也比較容易。

在一八四八年，聯邦規定補習教育，由工商部管理。補習教育的職業性，便因之加強，但是普通性質的職業學校，當時仍依然保存。一八九一年，更通過勞工法，規定僱主不遵法令將徒弟（十四歲至十八歲的男子）送入補習學校讀書者，政府即加處罰。一九一一年，更規定十八歲以下的女子，亦須受強迫補習教育。迨一九一七年，通過新憲法時，更嚴格規定凡十四歲至十八歲的男女，均應受強迫補習教育。補習教育每年上課，約四十週，每週自四小時至八小時不等。修業年限規定自兩年至四年，上課在工作時間內行之（參看拙著職業教育通論商務版）。

(3) 德國補習教育現況——

甲、學生數 據最近統計，現有職業補習生一百七十餘萬，普通補習生四十餘萬。在普魯士，佔十四歲至十八歲青年總數之百分之五五，其中男子佔百分之八六，女子佔百分之二四。在全德佔男青年總數之百分之五〇，女青年總數之百分之四〇。

補習學校學生數，佔全體職業學校學生數之百分之九六。現有補習學校兩萬所。

乙、辦法 補習學校之設立在城市者，分科甚細，如有縫工，製革等科。有時並為某種職工，特設補習學校，如為縫工特設縫工學校。普通職工所補習之科目，常與工作發生密切的關係。此類分科甚細的補習學校，稱為職工學校。至於鄉村補習學校，則分科較粗而範圍較廣，如設工科、農科等。德國城市及鄉村，除專科式的

補習學校外，更兼設普通職業學校。

丙：課程 課程中，三分之一為普通科目，三分之二為職業科目。普通科目為數學、簿記、作文、公民等。鄉村補習學校，則更有農業及農人生活科目。職業科目則隨各種職業而不同。

丁、經費 補習學校經常費，大都由地方擔任，教師薪金之一部分由邦補助。

二 國社黨的教育方針與實施

(1)國社黨當政之由來——德國國社黨是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由希特勒創立的。他們一向主張大德國主義。一九二三年，德國的巴伐利亞邦和聯邦政府發生衝突，國社黨曾一度起來反對，但為該邦領袖所敗，希氏被囚，判五年徒刑，但是只經過了幾個月，他就被釋放，不過當時國社黨在德國政治上的勢力，還很渺小。

德國自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八年，因為賠款問題得到了解決，同時美國又允許大量的借款，因此德國的社會，從表面看來，生活安定，經濟也日趨繁榮，國社黨的勢力，當然無由伸展。不幸到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的狂潮來臨，美國更停付了借款，因此德國對外貿易大減，經濟枯竭，德國政府便厲行裁員減薪，極力挽救國家的危局。國社黨看見時機到了，便一方面利用小資本家和農民不信任政府的心理，一方面用種種方法，激起愛國的情感，宣稱德國人民的痛苦，都因受了凡爾賽條約束縛而產生。結果，國社黨很獲得德國人民的信仰，勢力也逐漸的高漲起來。一九三二年德政府改組，乃請希氏入閣，但希氏聲稱，非有全權，不願充任。一九三二年一月，德國情勢緊張，興登堡乃以全權付託希特勒組織內閣。希

氏執政後，四月間即藉國會大廈縱火事件，首先將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及郵電秘密等自由權撤廢，囚禁共產黨及反對黨人，更委派黨員充任高級委員，監視各邦及自由市一切設施。對不屬於德國民族而掌握金融權的猶太人，大加排斥。更對反對黨人，加以虐殺。一九三四年一月，改革聯邦法，減少各邦自治權，全權集於希氏一人之手。各邦市官吏之任免及特赦權，均操於黨員。六月下令清黨，國社黨勢力益形擴大。一九三四年八月，興登堡總統逝世後，希特勒即兼攝總統職務，最近更改稱元首，為終身職。

(2)國社黨的政綱——國社黨的政綱，可以從黨的名稱上窺見一二。國社黨本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的簡稱。它們主要的政綱是：(一)在國家主義方面，要求廢除凡爾賽條約與軍備平等。(二)在社會主義方面，運用國家力量，來改造國民經濟(勞動服務即係一種手段)。(三)在民族主義方面，注重純粹血統與過去民族光榮(真正德國人，始承認其為德人，有公民資格)。(四)在勞動主義方面，設法減少失業工人，保障有業工人。

為達到上列目標起見，必須實行獨裁制。全國人民應認識及服從國社黨，尤應一致服從及擁護領袖，雖國會亦僅處於諮詢地位。

(3)國社黨的教育方針——國社黨的教育方針：在(1)養成服務紀律——服從領袖；(2)養成民族自信力——自信德國民族為全世界最優秀民族；(3)養成社會責任心。

(4)國社黨的教育實施——國社黨實施的教育，以體育為主，德育次之，知育最後。因此課程減至最少，餘多時間，均從事體育的活動。

知育功課中，特別注重歷史——民族光榮史；更重視生物學。

一民族遺傳學。此外對於本國的語言、文字、土地或邊疆人民的生活，也極力注意研究。

教學的方法，甚重激起青年的感情。同時對於國社黨的現狀，也極力宣揚，以便鞏固國社黨和希特勒的地位。

訓育方面，以前德國學校中甚為注重，常採取嚴格訓練方法。直到最近的十餘年，才稍重學生的自治，個性的發展。但自國社黨執政後，仍恢復嚴格的訓育，抑制個性的發展。

教師方面，凡願任教師者，須宣誓效忠國社黨。最近政府更特重鄉村教師的訓練，將全國師範學校移設鄉村及邊疆，使彼等身感國家的恥辱，親歷鄉村艱苦的生活。更注重民族學、軍事地理、邊疆及海外殖民等課程。對於普通師範生入學資格，規定甚嚴，除須呈繳證明文件外，更須證明其本人身為德人（祖先亦為德人），且有勞動服務證書者。入學時，對於學生之人格、品行，亦甚重視。

國社黨執政後，對於教師團體，亦加改組，一切工作或活動，均須受黨的控制。

教育行政方面，在前，德國學校校長權力甚大；自革命後，德國學校中設有校務會議及教師會議，管理學校行政事務，校長權力因之大減。自國社黨當政後，現已恢復校長權限，廢止教師會議。

學術研究方面，在前，德國素以‘學術自由’聞名世界，舉凡大學校長及大學正教授，均由教授互選。但自國社黨當政後，則逐漸取消學術自由，校長及院長，亦由教授推舉候選人三人，由政府擇一任命之。

教育組織系統方面，改革甚大。在前，德國教育權，分隸各邦，現在中央設教育部，採取聯絡辦法，將各部教育權逐漸集中中

央。

女子教育方面，亦有重大變更。國社黨對‘賢母良妻’教育，最爲重視，主張女子回至家庭服務。故對家事等課程，極力提倡，此種辦法，更能減少國內失業工人。

三 烟幕下的勞動服務

德國勞動服務一名詞，兼含着下列各種意義：

(1)德國的勞動服務是一種軍事訓練——德國因受凡爾賽條約的束縛，不得增加一切軍備，所以德國以前所厲行的強迫軍役辦法，也不能明目張膽地施行。最近實施的青年勞動服務辦法，規定凡十七歲至二十五歲的男子，必須受勞動服務訓練若干時期，實行軍隊生活，注重軍事訓練。所以這種勞動服務，不啻是一種強迫軍役的替代方法。

(2)德國的勞動服務是減少失業問題嚴重性的一種辦法——由於世界的經濟恐慌，德國一九三二年失業工人，已達六百萬人，爲救濟失業起見，故施行勞動服務。

(3)德國勞動服務，是消磨青年知識分子餘力的一種方法——德國執政者，企望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服從領袖，遵守紀律，所以用勞動服務來消磨青年的餘力，使他們無暇干涉政治，或從事反政府的活動。其辦法，中學畢業生勸令勞動服務，至少半年，師範生亦一律從事勞動服務。

(4)德國的勞動服務，是一種良好的政治教育設施——青年從事勞動服務時，灌輸青年以國社黨政綱，更訓練青年服從領袖的習慣。

(5) 德國的勞動服務是一種提倡人民深入鄉村的辦法——德國所施行的勞動服務，提倡人民到鄉村去，養成愛好鄉村的興趣，使一般青年知識階級，多與鄉民接觸，養成勤勞刻苦的習慣。

四 中學及大學學生的青年營

青年營的主旨，在利用勞苦而尊貴的勞動，為祖國之公共利益而服務，以團結德國的青年。青年營不限於中學、大學學生始能加入，凡年在十七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身體健康的男女青年，皆得入營。凡中學畢業生，勸其勞動服務半年。若欲升入大學者，亦最好獲有勞動服務證書。凡入營者，皆須簽約，承認至少以六個月為期，不得間斷。營內生活，極其簡單，工作與競技運動互相調換。六月中，以四個半月任每日六小時的開墾、修路、開河等工作；以一個半月作郊外及戰爭式遊戲。最近女生亦加入勞動服務團體，實習家事、園藝及看護工作。

除中學生外，師範生亦常加入青年營。即大學中講師（德制大學中講師為教授候補人，與中國所謂講師不同），若能獲有勞動服務證書，遞升教授時，亦得儘先任用。

最近因中學生加入青年營工作，故大學生逐漸減少。一方面因中學生對勞動服務工作，發生濃厚興趣；一方面亦由於大學入學資格嚴格之故。現在大學入學資格規定：(1) 限制猶太人入學；(2) 德制公立中學畢業可不受任何試驗入學，現制凡中學畢業列入甲等者，始能免試升入大學；(3) 具有勞動服務證書。

據最近統計，四萬中學畢業生中，僅許一萬五千人升入大學，其中女子祇佔十分之一。去年夏季，一萬五千人中，有八千男生，

一千女生，任勞動服務後，其中僅四千男生，七百女生，得升入大學。

普通青年營中，除勞動服務外，特重品格訓練及身體鍛鍊，培養服從領袖的習慣及民族爭鬪意識。勞動服務後，不入大學者，較易入職業界任事。

五 小學生鄉村年

小學生八年修畢後，必須至鄉村中居住九個月。其目的在減少失業人數及引起小學生愛好鄉村的興趣。德國小學生人數甚多，因經費關係，故先從二萬五千人口以上的城市入手，並規定工業化大城市及邊疆區域有優先權。

小學生鄉村年，實施目的，在灌輸政治教育，激起愛國思想，實施體育訓練，愛好鄉土，團結民族意識。小學生每組七十人至一百人，輪流居住鄉村。

小學生居住鄉村後，普通功課有民族學初步、歷史及環境研究等。並無固定時間表，每週約上課十五小時。普通男學生參加農夫工作及家庭手工業，女生則注重家政。

六 統一青年運動

德國青年運動開始於十九世紀之末，係由青年自動發起，歐戰前已普遍全國。自希特勒當政後，即從事於改組與統一。以前青年團體甚多，或以宗教教派分，或以地域分，……均少政治意味。希特勒先令人組織希特勒青年團，為各青年團體之一，逐漸吸收其他團體，終因若干團體不就範，乃強制統一。現在廣義的希特勒青年

團包含全國十歲至十八歲青年分子，分爲四組如左：

希特勒青年團	{	少男團（十歲至十四歲男童）
		青年團（十四歲至十八歲男青年即狹義的希特勒青年團）
		少女團（十歲至十四歲女童）
		女青年團（十四歲至十八歲女青年）

又在柏林附近，設青年團領袖學校，以國社黨黨義訓練青年團領袖人才。

現在的希特勒青年團，與以前的青年運動之重要區別爲：由民主的變爲獨裁的，由反戰的變爲軍事性的，由個性發展的變爲服從領袖的。

青年旅舍的建立爲以前青年運動的一部分。旅行本爲青年運動中的重要工作，藉以認識鄉土，愛好祖國。最初由一小學教師發起，就廢棄之工廠、堡壘或教堂設價廉而清潔的旅舍。大戰前亦已普遍全國，戰後更爲風行。此種青年旅舍，現在共有二千所，去年一年間過夜的有六百萬青年，當然都爲希特勒青年團團員所利用。

（中華教育界二十三卷四期）

不景氣與美國教育

一 世界恐慌與不景氣

世界恐慌原因甚多，幾乎無人能完全明瞭。就其重要的來講，約有下列數因：(1)戰後元氣大傷，死亡者既衆，用去金錢，亦不知凡幾。各國負債累累，而壯丁減少，生產不振。始因德國賠款數額未定，嗣得美國大量接濟，暫時緩和。但美國貨物推銷時，各國購買力大降，加以先進國工業化程度加高，人工過剩，後進國工業化也急起直追，爭奪市場，於是生產過剩，物價低落，一發不可收拾。(2)戰時紛紛保留現金，取消金本位，戰後雖暫時恢復金本位，但不久因爭奪市場，又紛紛管理匯兌，將貨幣貶值，並互築關稅壁壘以防外貨侵入，而對外則施行傾銷(探併)政策，以致金融紊亂，經濟恐慌益加蔓延。

結果除生產力減少，失業人數增加外，財政上赤字上升(所謂赤字係因西式簿記上負債例用紅色字表明)，入不敷出，不得不藉債度日。最近鬧不清的白銀問題，多少也受經濟恐慌的影響。

二 美國的拜金主義

美國拜金主義的發生，其原因約有下列數種：(1)美向無貴族，受人崇拜的只有富翁；(2)地廣人稀，若能勤勞，即能致富。(3)美工業化後，大量富藏開發，煤、鐵、石油等產量均佔世界第一，金、銀、銅等亦不少，麥、棉亦稱雄全球，故國家財富大增，而私人發財的很多。(4)世界上各種大王，除少數外(如爪哇的糖大王，瑞

典的火柴大王)，全是美人。(5)美國人成功標準，幾乎全以財富多寡爲衡，除少數民族英雄外，非富翁不足以顯親揚名。(6)一切事業操於資本家之手，政治的後台是資本家，即地方教育行政與大學的董事也有一部分是資本家，勢力浩大，故上自大學教授，下至小學教師，均不敢撻資本家之怒。(7)教育投資之鉅，亦爲各國所不及，中小學的財產達六十萬萬元，經常費年達二十五萬萬元，大學尚不在內，教育經費占國家一切用費達幾百分之二十（其他各國中僅德國有百分之十七，餘均在百分之十左右），故相對的與絕對的均以美國對教育投資爲最多。

三 不景氣與教師薪俸

甲、平均年俸，城市小學的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三年中，自一、七七〇減到一、四一六元；鄉村小學的，自九六六減到七五〇元。合併計算，自一、四二〇減到一、〇五〇元。有減少到每月僅三、四十元的。以美國生活程度之高，我輩留學時尙月得八十元不敢亂用，其生活之苦，可以想見。

乙、一年中至少減十分之一，多的有十分之四，但欠薪額仍達一萬二千五百萬以上，而裁減員額又有六萬以上。

丙、具有教師正式資格而無業的達二十萬人。

丁、以致學校停閉的，三年中達二萬間，減少上課時數的更多。一年中小學生受教四個至五個月的八十萬，六個至七個月的一百四十萬（不滿六個月的總計一百五十萬），八個月的五百萬，九個或九個月以上的一千五百萬。但還有二百萬無學可就。

戊、減少的功課多爲音樂、美術、工藝、家事等。課本及課業

用品本多免費供給，現課本多陳舊霉爛，課業用品供給更不充足。己、許多鄉村小學本一律不收費的，竟徵收起學費來了！

四 失業與工作營

甲、一九三二年失業人數凡一千一百萬（幾占人口總數十分之一）。

乙、大學畢業生失業的估計不下十萬，其中以教育科的為最多，工科次之，商科又次之。

丙、因此設立了一千五百個工作營，但仍祇能收容三十萬人，乃選失業青年，予以最低工資，使從事於開墾、造林、修路等工作，餘暇上課。

丁、另有六十萬人受成人教育，其中三分之一受職業訓練。

戊、大學生無力繳費的甚多，中央已撥基金五百萬補助七萬五千大學生。

五 全國教育經費問題

甲、三年來教育經常費減少三萬六千八百萬元。

乙、建築及設備費幾乎完全無着。

丙、一九三〇年，中小學每生用費六角二分八，內一角二分六用於建築及設備；一九三三年，減至每生用費四角八分七，中僅四分用於建築及設備。

丁、去年由三十位教育行政與經濟專家，以兩星期時間，開會詳細研究全國教育經費情形，作有扼要的報告凡七十八頁，對於今後教育財政的合理化有極大貢獻，但對於根本救濟仍無善策。

六 中央與州政府的援助

甲、美國聯邦政府對於教育，除特殊設施外，向不過問，也不出錢，現已改變態度。過去一年中，曾以一千七百萬救濟教師薪金，以七千五百萬借貸各地方作必不可緩的建築及設備費，以八百萬設立各地方所忽視的成人及幼稚教育機關，以七千四百萬費於失業者的工作與教育，以一千六百萬救濟鄉村學校，以五百萬充基金補助大學生……等，總計不下一萬九千五百萬元。

乙、州政府向來對於教育負擔亦輕，各州平均不過占教育經費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下，現對於地方教育經費的補助亦增加不少，因各州情形不同，不及細述。

(註)參閱人人讀第十一冊(將由商務出版)

(中華教育界二十三卷四期)

英國最近教育概況

一 緒 論

英國的教育在組織方面看來與其他各國最不同的有下列三點：

- (一) 教育管理與行政責任上的地方分權，
- (二) 私人團體在教育上地位的重要，
- (三) 教師在課程與教法方面的不受規章束縛。

英國中央政府雖設教育部，然其權限甚小。各地行政責任在各地當局，教育部對於各地教育設施僅處於商討合作地位。各地當局除直接與教育部商討外，教育部所派督學，其辦事地點即在所擔任視察之區域內，常為教育部與地方當局商討教育設施之中間人。教育行政最後權亦可云屬於國會，因中央與地方教育行政均須依照國會所通過之教育法案，其中尤以一九二一年所通過者為主。教育部對各地當局及其他團體雖有發布規程及其他文件之權，但各地對於教育設施實多自主之權。

私人團體在教育上地位之所以重要，則由於歷史上許多教育設施實由若干宗教團體，私人團體或其他熱心教育者所創立。此等團體及私人至今對於教育各方面十分努力，不獨中等以上學校私立者甚多，即初等教育與成人教育得彼等助力之處亦頗不少。

英國各級學校教師既非受聘於國家，亦不受中央之俸給，故非公務人員。彼等皆由地方政府或私人團體聘任。校長對於校內設施有極大的自由權，教師更不受任何規章課程教本或教法上的限制。

因此教育部對於全國教育的影響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教育部

所派之督學視察後雖有報告，但報告後對於某校之設施應如何改革多無正式公文，而例於視察時由督學與校長或教師直接商討，但即在此時督學對於校長或教師從無以上司對下屬之態度。教育部對於教育上各種設施及課程可有規定，但係建議性質，並不強制執行。不過教育部之督學多係有經驗之教師，所定規程更多經專家審訂，而其所發布對於教育問題之報告，又皆出於專門委員之研究，其間接之影響實比之強制執行之公令為大。

二 行政

英國中央教育部不稱 Ministry，而稱為 Board，因照組織法上講係採委員制，除教育部長外，財政部長，參議會議長，及其他數部長均為委員，教育部長稱委員長 (President)，但實際上此委員會從未召集。部長下設政務常務二次長 (稱秘書 Secretary 實等於次長)。英國係國會內閣制，部長及政務次長隨政潮而變動，故自一八九九年教育部成立至一九二六年止部長換了十二個，政務次長換了十個，而常務次長祇換過一次。英國教育部之權祇涉及英格蘭本部及威爾士，而蘇格蘭愛爾蘭不在內，即威爾士之教育自一九〇七年亦另設一次長專管。

常任次長下分四處三司，另有祕書長 (Deputy Secretary) 一人直轄二司。

一、會計處，設會計長一人，副長一人，對國會會計委員會負責。

二、學校衛生處，設衛生長官一人，醫生及體育視察員若干人，一面對衛生部負檢查體格醫治疾病等事，一面監督教育部管轄的

嬰兒學校，殘廢及心理缺陷兒童學校，供給膳食等事。

三、法律處，設法律顧問一人及律師若干人，起草條例，解釋法令，及處理國會通過關於慈善事業與私立學校等案的執行。

四、人員處，設處長一人，決定人員進退與組織工作的分配等事。

五、初等教育司，設一等秘書一人，二等秘書一人，掌全國初等教育事宜。

六、中等教育司，設一等秘書一人，二等秘書一人，掌中學補助費，不受補助中學的認為有效，免費及獎學金的核給等事。

七、職業及補習教育司，設一等秘書一人，二等秘書一人，掌職業教育，美術教育，夜學，成人教育，職業指導，航海學校等事。

八、師資訓練司，設二等秘書一人，掌師範教育事宜。

九、教師恤金司，設二等秘書一人，掌教師養老金，撫恤金等事。

另設政務員(Principals 舊稱 Examiners)七人，佐員(Assistant Principals)若干人。全國分七區，區內一切教育行政由一政務員監督。

視察方面之督學在一九三三年凡三三五人，內總督學四人，三人分掌初等，中等及職業學校的視察，其中一人為督學長，另一女總督學，掌女學及幼兒學校的視察，下設區督學九人，分區視察，又專科督學男十二人女十人，分科視察。威爾士部分的督學二十六人，衛生處醫官七人，督學十人，專視察醫學衛生事宜，餘為督學及視學員。

輔佐教育部規劃一切者有諮詢委員會，計會員二十一人，由部長聘任，每二年可更七人，委員中至少須三分之二能代表大學及其他從事教育事業團體之意見。教育部及各地當局對所發布之報告雖無聽從之必要，但全國教育政策及重要設施每受其影響。

英國地方教育行政權在地方議會手裏。英格蘭及威爾士有權管理初等教育的，計有下列議會：

六十三郡(County)的議會。

八十三郡邑(County-borough)的議會。

一三五個一萬人口以上的邑(Borough)及三十五個二萬人口以上的鎮區(Urban District)的議會。

至初等教育以上各學校(大學除外)的管理權則屬於一四五個郡及郡邑的議會。以上各議會均設有教育委員會，由該委員會選派一教育行政長官，權限及名稱不一，權限大的稱 Director of Education 或 Chief Education Officer，小的稱 Secretary to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或 Clerk to the School Board。內部組織也看職權的大小、事務的繁簡而不同，茲舉一較大的郡邑為例。

教育行政長官之下，設副長二人，分掌初等教育及初等教育以上事務，另設衛生官、建築師、會計師各一人，勸學長官，特殊教育長官，職業介紹管理員，工程師等。

各地方教育計劃則由地方議會的教育委員會籌議，委員必須包含大多數議員及由議會推選的教育專家，并須有女委員。此種委員會以地方大小而分組多少。如某大郡邑分十組，即初等教育組，初等以上教育組，職業教育及夜學組，美術組，特殊教育組，校舍組，衛生組，青年職業及幸福組，就學經費及總務組，人員及薪俸組

，每組復分若干分組。

各地方境域較大的也設視學，較小的則或由教育委員會委員視察，或由部視學代為視察。各地視學共約一百五十人。

教育部直轄的教育機關，祇有皇家美術學校及三個博物院。

三 經 費

英國中央經費用於教育者多為間接而非直接的。所謂間接的即補助性質。若大學受中央補助費甚多。計占全部大學經費三分之一，但此項補助費極大部分由財政部內特設之大學補助費委員會直接撥付，不經教育部。教育部僅補助大學推廣教育費用少許，其他各部（主要者為農漁部）亦補助各大學若干費用。計1932—3年由財政部補助各大學約百五十萬鎊，教育部補助約一萬二千鎊，其他各部補助約二十二萬鎊。各大學收入除中央補助費占百分之三四

三外以學費為最多約占總收入百分之二四·三，次為基金收入約百分之十三，次為各地方政府補助，約百分之十一，餘為其他收入。

教育部對於大學以外各級教育均有補助，計占教育部一切用費百分之八十四，餘百分之十六為行政及視察費，教師養老金，及四直轄機關經費，此項補助費共約三千九百六十萬鎊（一九三三—四）。所補助者可分為（甲）各地方公立學校補助費凡三千八百鎊其中極大部分用於小學教育方面，（乙）不受地方政府管轄之學校補助費，約一百五十萬鎊，大部分用於補助私立師範學院及大學師資科，私立中學、職業及成人教育機關，但用於補助私立特殊小學，嬰兒學校，兒童遊戲場者亦占六萬五千元。（丙）補助優良學生費，約二十

二萬鎊，其中最大部分爲三百個獎金額津貼中學第二試成績優良者入大學之用，次爲各師範生津貼。

各地方對於教育經費之負擔共約四千萬鎊，其中三千一百七十鎊用於小學教育，餘用於小學以上大學以下之教育。後者約四分之一用於補助優良學生，計約二百四十萬鎊。中央及地方合計用於大學以外之教育經費共約八千四百餘萬鎊，計占教育全部經費百分之九十一，餘百分之九即七百七十萬鎊以學費收入爲最大宗，計地方政府設立之學校(大都小學以上者)學費收入約二百十餘萬鎊，非地方政府設立者學費收入約二百二十六萬鎊，而教師對於養老金的負擔亦約二百五十五萬餘鎊。(教師養老金之來源係以薪金百分之十計，其中半數在教師薪金中扣除，半數由學校負擔，此半數如爲公立學校由中央及地方分擔，即中央補助四分之一)。

以上除大學外係各級教育經費來源。至經費支出分配，則公立小學方面約用五千五百四十萬鎊，師資訓練方面約用一百萬鎊，中學方面約用一千一百三十萬鎊，職業教育方面約用五百萬鎊，餘用於其他教育設施。私立學校教育經費無全國統計。

四 大 學

英國的大學，約可分爲三類：一爲歷史悠久之大學即牛津與劍橋，二爲新設大學，大都成立於十九世紀後葉；三爲英格蘭以外的，即蘇格蘭與愛爾蘭的大學。

牛津劍橋學院林立，各院皆爲大學分子而各有獨立精神，不獨每院學生食宿在一處，且教師除教授外有導師，日夜在院，互相切磋。近來院與院間聯絡漸多，如試驗室之公用，教授講演之公開，

研究工作之合作等。

新設大學兼收通學生，且均分科，惟設科不一。倫敦大學且有校外考試，非肄業生經承認的也可考學位。英格蘭以外之大學多無宿舍，普通學位較前者為難，但學生讀普通學位的較多。

所謂普通學位，入學較易，選科範圍較廣。除普通學位外，尚有優異學位，程度較高。至二、三年級多專一門，考試成績優良的可不上課，專做研究。據1929—30年調查，英國各大學正式生讀優異學位者約百分之五四·八，但單以蘇格蘭大學而論，則讀優異學位者僅四分之一，若將蘇格蘭大學除外，則各大學讀優異學位者達百分之六五·三。

英國大學各科大都三年畢業，畢業後繼續研究者甚少，計1929—30年讀學士學位者凡三萬六千人，而研究生僅約二千人。此二千人中半數在倫敦，劍橋，牛津三大學。研究生大抵研究一，二年後得碩士，再一、二年得博士。

各大學女生數大都占三分之一，僅 Reading 大學女生多於男生，計占百分之六二；劍橋最少，女生不過百分之八·三；牛津次之，占百分之一七·六。

大學生所修學程，若以文理分類，則1929—30年度文法商科者占百分之五三·三，理科一六·五，醫科一九·二，工科九·一，農科一·八。與1926—27比文法商科增百分之一·六，理科減千分之五，醫科減千分之六，工科減千分之二，農科減千分之一。

茲將英格蘭及威爾士各大學1930—33年學生統計列表如左：

		1930—1	1931—2	1932—3
全時間上課學生	男	27,015	28,077	29,578
	女	9,422	9,361	9,602
	共	36,437	37,438	39,180
部分時間上課學生	男	8,130	7,818	7,701
	女	3,091	2,752	2,814
	共	11,221	10,570	10,515
讀非大學程度功課學生		13,577	12,305	12,769
推廣班		19,612	22,775	22,419
總計		80,847	83,088	84,883

五 中 學

英國的大學受補助而不受視察，中學則受補助者受視察，不受補助者，除請求視察外，教育部亦無權視察。受補助及視察之中學，各項統計均須報部，由部編列成表。不受補助及視察者，詳細統計無人知之。此種學校可分兩大類：一為資金雄厚極有名望不願受補助以免視察之私立中學，一為內容分歧無資格受補助之中等學校，其中大部分為收年齡較低之中學預備學校。

受補助之中學中，公私立者各約半數。公立者即郡或郡邑所設者，私立者性質不一。除一部分為私立公學與下述不受補助之公學辦法相同外，大致與公立者辦法相同，即大都收十一歲至十六歲之男女青年，為男子設者，為女子設者及男女兼收者約各占三分之一，多為通學式。凡受補助之中學學額中至少四分之一免費，收受小學畢業生，一九三三年免費生實占全數百分之四九·四。

不受補助之中學均係私立，除資金雄厚之公學外，分為受視察

認為優良及不受視察之各種中等程度之學校。所謂公學大都歷史悠久校風特殊專收男生均為寄宿式而收費極大者。所收學生大都自十三歲始十八歲止，來源大都為預備學校畢業生。此項預備學校全國凡五百餘所，僅半數部認優良，專收九歲至十三歲男生，學費亦大，且多為寄宿式。專收女生之私立中學有少數仿公學辦法者，多數與公立中學辦法相同，部認優良者約二三百所。

至不受視察之中等學校之詳細內容無人知之，其中約半數為天主教設立之中等學校。

受補助及受視察之中學生約百分之七十四，年齡在十一至十六歲之間，平均在學約四年零八個月，離校年齡平均為十六歲零七個月。

中學生大都在十六歲時受學校證書考試，通常稱為第一試，有志深造者於第一試及格後回校入高級班修業兩年再受高級證書考試，通常稱為第二試。此兩項考試由經部承認之八個大學團體舉行之。各大學對於第一試及格者免除大學入學考試，若干職業界亦以第一試及格為入門階梯，第二試及格者則可免除大學中級考試（相當於大學一年或二年終了程度之一部或全部。第一試及格者在一九三三年約四萬人占應試男生百分之七二·五，女生百分之七四·一。第二試及格者僅七千六百餘人，占應試男生百分之六九·九，女生百分之六五·七。第一試及格重入中學高級班準備應第二試者，所學功課，文理約各占半數。

茲將一九二九——三四年中學重要統計列左：

	1929—30	1930—31	1931—32	1932—33	1933—34
男	496	500	501	499	498

受補助中學數	女	480	485	488	487	488
	混	378	382	390	392	395
	共	1,354	1,367	1,379	1,378	1,381
學生總數	男	207,462	217,110	229,045	234,860	238,062
	女	186,643	194,199	203,016	207,023	210,359
	共	394,105	411,309	432,061	441,883	448,421
(有統計者) 不受補助中學 數	男	653	626	628	630	
	女	250	437	422	278	
	混	30	35	37	37	
	共	933	1,098	1,089	945	
學生數	男	70,950	69,751	67,440	71,266	
	女	35,050	52,353	48,738	36,465	
	共	116,000	122,104	116,223	107,731	
(統計不詳者) 不受補助中學生數	校數	968	780	819	900	
	生數	70,082	52,500	35,000+	40,000+	
總計	校數	3,255	3,245	3,285	3,283	
	生數	570,187	585,913	578,284+	589,614+	

六 小 學

英國小學收受五歲至十四歲之男女兒童。凡此學齡之兒童有受讀寫算初步教育之義務，但非必須入公立小學，有入私立預備學校者，有入私立中學之預科者，有入特殊小學者，甚至有在家延師受教者。據一九三三年調查十四歲以下兒童在各類學校肄業者有如下表：

年 齡	總數估計	公立小學	貧兒學校	特殊小學	其他小學	受補助中學
3—4	591,000	34,833	150	311		
4—5	593,000	128,419	272	443		

5—6	595,000	489,412	397	1,083		
6—7	609,000	567,463	447	1,927		3,310
7—8	626,000	585,126	465	2,532	51	2,815
8—9	639,000	585,680	478	4,318	185(8—10)	4,644
9—10	655,000	609,578	561	5,712		7,611
10—11	679,000	618,236	582	6,553	712(10—12)	13,136
11—12	724,000	648,109	608	6,920		39,923
12—13	768,000	648,783	652	7,812	1747(12—14)	82,690
13—14	742,000	581,704	703	7,563		84,334
14—15	540,000	121,540	306	3,840	1,104	65,578
15—16	544,000	14,170	145	2,880	1,093	57,587
16+	3329,000	2,284	265	553	1,443	80,255

而在其他學校肄業者有如下數：夜班十四歲以下者二四，三六五人，補習學校及補習班十五歲以下者六，六九二人，職業學校十五歲以下者一四，一九一人。

所謂公立小學不收學費且供給課本用品等，其經常及設備費用均由各地方政府擔任。但其中過半數之校舍及其修理費係由私人團體支付。此種學校以英國教會設立者為最多，次為天主教會設立者，教師得由設立者之校董聘任，但須經地方政府認可，關於宗教功課，地方政府不得干涉。地方政府設立之小學亦授宗教，但不得涉及代表教派之教義。惟家長不願兒童上宗教課者無論在地方或私團所設小學肄業可免上宗教。

公立小學均大致分為三階段：(不分年級)(一)幼兒部，自五歲至七、八歲；(二)初級部，七、八歲至十一歲；(三)高級部，十一至十四歲。幼兒部多自成一部約如中國之幼稚園，初級及高級二部

以前多不分。自一九二六年諮詢委員會發表報告，主張高級部應獨立後，各地小學高級部漸有自成高級小學趨勢，但截至今日仍以在二級不分之小學肄業之兒童為多。獨立之高小有設理科及外國語功課者，但設農工或家事功課者較多。

茲將一九二九—一三四年英格蘭及威爾士小學統計列左：

		1929—30	1930—31	1931—32	1932—33	1933—34
地方設	校數	9,548	9,698	9,821	9,932	10,014
	生數	3,674,132	3,696,360	3,745,577	3,822,225	3,859,710
英國教會設	校數	9,677	9,598	9,501	9,384	9,268
	生數	1,434,559	1,403,765	1,381,823	1,358,875	1,332,717
天主教會設	校數	1,177	1,188	1,200	1,207	1,215
	生數	370,861	376,782	388,352	397,019	401,952
新教會設	校數	118	113	111	124	123
	生數	21,569	20,866	20,018	21,503	20,424
猶太教會設	校數	12	13	13	12	13
	生數	5,360	5,291	5,404	5,684	5,539
其他私團設	校數	271	257	252	214	209
	生數	39,421	35,708	35,215	29,910	29,012
公立小學總計	校數	20,803	20,867	20,898	20,874	20,842
	生數	5,546,002	5,538,772	5,576,416	5,635,216	5,649,354
非公立小學	校數	687	710	733	738	731
	生數	55,805	57,972	62,303	63,167	63,069

七 師 資

中央對於受補助中學之教師資格並無明顯規定，但云須合宜而已。對於公立小學教師，有‘已檢定’，‘未檢定’，‘專科’，‘署理’

及‘見習生’等。往者已受檢定之教師頗少，近年以來增加甚速，現已達全數四分之三，因此其他各種已漸減少。現在被檢定之教師大都為師範學院畢業者。‘未檢定之教師’大都未受師範訓練但曾經考試准予充任者，其中一部分為已修業期滿之見習生（在城市僅百分之十二，鄉村則達百分之四十五）。專科教師大都曾受專科檢定。見習生實為一種徒弟式之師範預備教育，近年以來數目大減，且在可能時均受教於集練所，而此項集練所又多附設於中學。據一九三〇年調查，全國僅餘三十八所（一九二五年尚有二四九所）而其中二十五所附設於中學中。但鄉村中仍有七六一見習生，在小學中見習，其中六二一係女生。凡已檢定及未檢定之小學教師年俸有定額及等級，計已檢定者男教師由一六八鎊，女教師由一五〇鎊起。未檢定者男由一〇二鎊女由九三鎊起。但最近因不景氣在1931—34減百分之十，一九三四後改為減百分之五。

訓練小學師資之師範學院大都為二年制，或由地方政府設立，或由私人團體設立。各大學有設師資科者為四年制，大都前三年學生上課與其他大學生同，三年修畢得一學位，最後一年，始受專業訓練。大學師資科畢業生多任中學教師，亦有任高小教師者。凡受此兩種訓練之學生均為官費，計男生年得二十六鎊，女生年得二十鎊。師範學院畢業考試向由教育部舉行，一九二八年後由各大學及師範學院合組分區考試委員會舉行之。至大學師資科之畢業考試仍由各大學舉行。

茲將關於師資之統計數種列左：

一九三三年公立小學教師資格表

已檢定	未檢定	專科	署課	合理
-----	-----	----	----	----

男	41,917	1,912	2,652	24	45,537
女	87,413	27,201	3,315	6,713	124,642
其他	總計	內大學畢業生	男	女	
八,三四六	一七八,九二五		四,七三五	四,一二〇	

一九三三受補助中學教師資格表

	大學畢業	其中受師範訓練者	非大學畢業	講 師	總 計
男	九,八三三	五,三四五	一,七三七		二,四三九
女	七,五三九	四,六五一	三,六〇八		二四,七八六

一九三三一三四師資訓練機關表

	地方政府設	私立受補助者	不受補助者	總 計
大學師資科		二二		二二
獨立師資學院等於前者		一		三
二年制師範院	二三	五〇	二	七五
家事師資學院	七	四	二	一一
共 計	二九	七七	四	二一

一九三三一三四師範生表

	四年制	二年制	其 他	總 計
男	三,一二八	二,八七九	九	六,〇一六
女	二,四四〇	七,六一九	一,一六六	一一,二二五
共	五,五六八	一〇,四九八	一,一七五	一七,二四一

八 職業及補習教育

根據一九二六年英國教育部頒布的‘繼續教育條例’，關於職業及補習教育機關有下列各種：

(1)部分時間上課的

一、補習日校 普通或職業性質，家事或藝術教學，部分時間上課但在早八時晚六時之間，年齡自義務教育終了至十八歲。

二、夜學 同上，但在晚五時後上課分(甲)初級者年齡自義務教育終了及入學時在十五歲，離學時在十七歲以下的，(乙)高級者年齡較長的。

(2)全日上課的

三、初級實業學校 為工業，商業或家事工作的準備，全日上課兩年或三年，入學年齡十三或十四歲(有低至十一歲的)。

四、初級家事學校 家事及普通教育，全日上課，入學年齡同上。

(3)全日或部分時間上課的

五、實業日班 以職業或家事為主科的，部分時間制或短期全日制，年齡在義務教育終了後。

六、(甲)藝術學校 圖畫、藝術手工、及圖案(在特種狀況下文學及教育科目)為已受初級圖畫訓練而設的部分時間或全日上課制，年齡在義務教育終了後。

(乙)藝術學校內的初級藝術班 圖畫、藝術手工、及普通科目，全日上課制，年齡在十六歲以下。

七、學院 為已達初級考試程度而設的，全日上課制，年限至少一年，或為專門職業之準備或為已經大學入學考試及格作大學中級或學位考試之準備，及(或)職業，家事，藝術或普通的夜學，收十六歲以上的學生，曾受夜學至十六歲止或曾在小學或他處受高級教育至十五歲止的。

以上係工商家事及普通性質之補習教育。至關於農業者由農部

管理，約分高低二級。低級的有農事講習學校，大都以一年為期，且在冬令上課，分為二學期，上學期在耶蘇誕前，下學期在耶蘇誕後。入學年齡為十六歲，大都男女兼收，間有專為女子設夏季班者。高級的有農科大學及農業學院，單獨設置的有五所，在各大學中設置的凡七所。此外尚有各種推廣性質之農業教育設施。

一九三三年英國工商家事及普通補習教育統計如左：

初級實業及家事學校		初級藝術班		藝術學校			
校數	生數	校數	生數	校數	全日上課	部分時間上課	合計
191	男15,422	35	男1,158	227	男2,213	男26,482	
	女 6,023		女 769		女3,356	女23,796	
	共21,445		共1,927		共5,569	共50,278	55,847

實業日班			補習日班		航海學校	
校數	全日上課 生數	部分時間 上課	校數	生數	校數	生數
177	男 1,010	男19,357	53	男 8,034	?	男生926
	女 1,594	女 5,350		女 7,942		
	共 2,604	共24,707		共15,976		

合計27,311

學院內高班級				夜學		總計		
校數	全日上課	部分時間 上課	合計	校數	生數	全日上課	部分時間 上課	合計
141	男5,054	男1,166		4,611	男419,055	男25,783	男474,094	
	女2,084	女 468			女395,110	女13,826	女432,666	
	共7,138	共1,634	8,772		共814,165	共39,609	共806,760	946,369

總觀上表可知部分時間上課者遠較全日上課者為多，而部分時間者以夜學為最多。夜學中修習普通科目的學生約占二分之一，計學英文的約占全數三分之一，其他語言，社會科學，數學，理科，體育，藝術，音樂等，約六分之一。

一九三三年英國農業教育統計則如下列：

	講習會	日班	夜班	函授班	農業手工班	表演講演等
班數	174	424	479	13	297	10,465項
生數	2,056	5,596	12,307	286	2,422	

農科大學及農業學院學生一，六一四人，附設講習班學生五二七人。一，六一四人中學普通農科者八〇六人，園藝科二〇一人，牛乳科八四人，禽畜科八二人，獸醫科四一六人，農事管理科一五人，鄉村家事經濟科一〇人。

九 成人教育

上列各種補習教育機關中受教之成人不在少數，尤以夜學中為多。據1929—30年調查，四千八百個夜學中有學生六六一，四七四人，其中廿一歲以上者占二二五，〇〇〇。且廿一歲以下者男多於女，廿一歲以上者女子數幾倍於男子。

此外成人教育機關種類繁多，約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專以成人教育為對象者，一則教育不過占各種事業之一者。前者以大學與勞工教育會設立之各種班級為最著，次為各種勞工學院及公社，成人學校，與各地方政府設立之成人教育班。後者以一九二五年成立之婦女協會及全國社會服務社所組織之鄉村改進會勢力為廣遍，餘如合作社，聯合會，男女青年會，及其他團體盡力於成人教育者難以一一枚舉。而各基金團補助成人教育事業者亦有數個。

勞工教育會成立於一九〇三年，自一九〇七年始，即與各大學合設導師班委員會，管理及指導各導師班。一九〇八年後又聯合各委員會成立導師班中央聯合顧問委員會。此項導師班受補助者有下

列各種：(甲)高級班——較三年班程度為高，學生至少有三分之二已修畢三年班者。(乙)三年班——程度約與大學相等。(丙)預備班——為程度不足入三年班之準備。以上各班由委員會監督，導師由大學聘請，每週上課二小時以上，每年上課二十四週。(丁)大學推廣班——每次上課自一小時半至二小時，每學期至少十八小時。(戊)一年班——程度約與預備班等，但不準備升入三年班。(己)學期班——每週至少上課一小時半，凡十二週以上。(庚)短期班——每週至少上課一小時半，凡六週以上。勞工教育會所設不受補助之班級尚有(辛)速成班——時期更短。(壬)研究會——更不一律。據該會一九三三年報告，1932—33年各種班級數及學生數如下：

	高級班	三年班	預備班	大學推廣班	一年班	學期班
班數	8	650	48	127	702	983
生數	94	11,539	1,631	2,425	17,017	19,415
	短期班	受補助者合計	速成班	研究會	總計	
	53	2,612	205	62	2,879	
	1,090	53,215	4,319	1,011	58,545	

勞工學院學科程度約與大學相等，且須全期上課，但大部分學生僅在學一年，各學院且可設如上列之部分時間制之班次。在一九二七年約共設有一千二百班，學生三萬餘人。惜近年來無全國統計。公社近似我國的民衆教育館，活動種類殊多，以教育為中心者約二十三個，所辦各種班級在一九二九年祇計由公社直接請領津貼的，共有六千餘學生。成人學校在一九二九年約一千四百所。以上各種成人教育機關大都注重於文學、歷史、哲學、經濟、理科等類功課，各地方政府設立之成人班則側重於手工、家事、音樂、戲劇、

體育等，最近估計約有一萬六千班，人數不詳。

婦女協會全國約有分會五千個，會員總計二九六，八〇〇人，所設班次有文學、歷史、音樂、戲劇、手工、衛生食物研究等科。全國社會服務社組織之鄉村改進會在二十個以上，以鄉村建設為主旨，兼及鄉村領袖或先鋒之訓練。合作社設立之高級班約一千二百個，學生四萬五千人。青年會施教所及的約七萬五千人。

基金團中以加納奇基金對於成人教育提倡最力。其所設之中央圖書館除自身藏書供成人班借用外，且與全國百餘所圖書館聯絡，互相借閱。對於鄉村改進事業亦予以補助。此外尚有數基金或補助大學導師班或給此類學生以獎金，或以專款開設講演會等。

十 其 他

除上述各種教育事業外，英國教育最近發展中尚有二事足供吾人注意者：一為學校衛生，一為失業青年與成人之教育。

學校衛生初亦起自私人團體之注意，繼則各地方當局開始努力。其影響於全國者為一九〇六年國會通過之供膳案，規定各地方政府得以公費供給家境貧寒而營養不足之兒童的膳食，及一九〇七年通過之行政供應案，規定各地方政府對於小學生體格必須檢查。一九一八年通過之教育法案且規定各地方政府得檢查嬰兒學校與中等學校學生之體格，各級學生體格檢查後如發現病患，家長僅出最低費用為之療治，家境貧寒者完全免費。

全國學校衛生事宜，由教育部之衛生長官主持，彼同時為衛生部中之衛生長官，故兩部對於兒童衛生設施藉以取得嚴密之聯絡。據一九三三年統計，為全國學校之醫生其數相加等於全時服務者凡

六五九人，又專家九九二人，牙醫五六六人，看護二、二七九人。普通療養所一、八八〇處，電光療養所八一處，受普通檢查者一、八五五、四九九人，特殊檢查者一、二三九、四二七人，牙患經治療者一、三八二、八一九人，疾病經治療者一、四二〇、九四一人，兒童受供膳權利者三九九、三七七人，共供膳六二、三〇四、六七一次

同年爲體弱兒童特設之學校有如下列：

盲童學校	76所	4,760人
聾啞學校	48所	4,560人
低能兒學校	166所	16,537人
殘廢學校	131所	12,840人
露天學校	147所	14,701人
心病學校	5所	276人
肺病學校	37所	2,386人
癩病學校	6所	609人
其他	3所	968人

自歐戰後，英國各地即有爲失業青年專設之臨時班級，一九二六年煤礦工人大罷工後漸占重要，一九二九年來受不景氣之影響已漸成爲固定機關。且據人口統計，青年人數至一九三七年將達最高點，一九三七年後青年人數將漸減低，至一九四八年後因一九三一年後生育率之下降，青年人數將大減少。故此數年中青年失業問題最爲嚴重。在一九二九年前失業問題尙不顯著，各地設立之失業青年教育機關不多，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各地設立者漸增，一九三三已有七十九個，地方政府設立所謂青年組織委員會，且聯合設立一中央委員會。至一九三四年國會遂通過一議案，規定負中等教

育責任之各地方政府應設青年教育機關。截至此案通過時（一九三四）專為失業青年設立之教育機關已達一四六所，受教者一八、一四七人，內男子約占三分之二。此項機關可分為兩種：（一）凡一地有五十個以上之十四至十八歲青年失業在十二日以上者得專設一所；（二）凡二十至五十人者附設一班於職業或補習學校內。不及二十人者大都入原有學校附設之夜班，人數在一九三三年為二、八八一人分佈於五百餘所學校內。

此項機關由勞工部予以補助，通常補助經費百分之七十五，但在經濟恐慌區域有至全部補助者，在指導方面因亦屬於勞工部而不屬於教育部。補助費總額年約十五萬鎊，其中百分之四十二出自失業救濟金。所授功課以工藝，家事等實用者為主，可能時男女分組，十六歲以上與十六歲以下者亦分組，此種設施之最大困難為較有能力之青年每易得業，而在學期短，平均在學不過三週，至在學較久者每為能力較低之青年。各人在學期既短，全年中收容之人數自多，計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在專設之所或班受教者凡一三七，〇六〇人，在各校附讀者九，九一一人。

救濟失業成人之機關發展較遲，在1933—34年中全國約有五百所，其中教育設施如何，尚無詳細報告。勞工部為教育失業成人起見，於一九三三年冬設立八個訓練所，十一個教練所。前者為期較長計在學期為六個月，後者僅三個月，人數不詳。

參 考 資 料

1. Adult Edu. Cation and the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 1933
2. Adult Edu. Cation in Practice, by Robert Peers, 1934

-
3. An Outlin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England and Wales, 1933.
 4. Educational Facilities for the Unemployed, 1933
 5. Education in 1934, 1935
 6. The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Thirtieth Annual Report, 1933
 7. The Year Books of Education, 1932, 1933, 1934, 1935.

(以上原文資料多承唐惜分董渭川兩先生代為搜集，特此誌謝。)

二十年來關於師範教育言論之分析

師範教育的重要，人盡知之。那末二十年大家對於這個問題注意的程度如何？有什麼高見？我們不可不總檢討一下。

我們曾經把二十年來關於師範教育的文章九十幾篇及專書五本拿來做了一個分析，列成下表：

年 度 問 題	民元	民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共 計		
	以前	至民十											廿二	廿三			
政策與方針			一					六	一	一			一	五	一五		
鄉村化問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一六		
獨立與合併		一	三		一		四		一		一	二	四	一七			
學制課程		三	四	二	六		三	二	三		一	三	三	三一			
參觀實習	一	二	一		四	一	二		二		一	三	三	二〇			
待遇服務		一	一		一		一					三	七	一四			
訓練與迅修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三	一〇			
共 計	一	一	一	三	二	一	三	一	二	二	五	七	〇	五	一四	二九	一二三

（說明）：上表在每一問題下之數字是表示各年度來討論該問題之人數。其各種意見所屬之年度，均從其發表所在書報的出版年限，某書或某文中常有討論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問題的，所以總數有一百二十三。

這個表雖不能說是把二十年來所有關於師範教育的言論都包括在內，但是總可以代表一般的趨向。

從上表看來我們便知道民國元年以前關於師範教育的言論，祇有一篇是討論參觀實習的，可見那時幾乎完全不感到有什麼問題。民元至民十，平均每年也不過是討論一個問題。其中鄉村化的問題

，學制課程各見三次。本來鄉村化問題或可歸於政策與方針，或可歸於學制，不過我們覺得這個問題十分重要且注意討論者頗多，故另立一欄。由此觀之，此十年中所討論者集中於學制方面，且感到的問題尚不算多。民國十一年為整個學制改革時期，因此，關於師範教育的討論驟增，而獨立與合併問題已佔有重要地位。民十年新學制既定，討論漸息，祇有兩次對於師範學制討論的餘音猶繞梁耳。但是新學制的不能使人滿意，在民十三的討論已可看出，十三次討論中，學制及課程的討論幾乎佔了一半！這個反響到了次年又漸平息。

民國十五年革命軍誓師北伐，師範教育下鄉運動也同時發始，因此師範教育問題的討論次數也打破以前的紀錄，而政策與方針，鄉村化，及獨立與合併問題均依次列前茅。十六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問題的討論倒又漸息，大約都在那裏靜待大學院及大學區的設施。十七年初，大學院召集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便有幾條關於師範教育的議案，尤其是幼稚師範與鄉村師範方面的。這一年師範教育的討論，對於學制課程及參觀實習都有相當的注意。到了民十八年，竟是師範教育毫無收獲的年頭，這不知是受了中山先生‘行易知難’學說的影響，還是覺得空口說句話的無用。但是這一年也是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的前夜，全國教育方案正在着手編製，對於各種師資的訓練，擬有整個計劃。這個會議於十九年開會將方案修正通過，大家又靜待他的實現，因此，討論師範教育的文章也少了。民國二十年師範教育的討論又驟增，待遇及服務問題漸漸抬頭，是年與參觀實習及學制課程兩問題佔有同等地位，到了二十一至二十二年竟一躍而居首位。在二十一至二十二年這一期中，除待遇及服

務問題外，政策與方針問題，則居其次，鄉村化及獨立與合併並居第三位，其他問題也都有相當的地位。這一期雖比一年略多，但次數總和比任何一年高。比前一年幾加一倍，可見師範教育問題的嚴重了。

至於詳細的分析，我們不願佔去‘校育欄’寶貴的篇幅，將另為文發表。在此地，我們祇把意見最分歧的獨立與合併問題，各人對於主張合併與反對合併的理由列成一表，或者讀者願以先觀為快。

——合併與反合併之討論表——

合併之理由

- 一、不應再襲日本學制。(一)
- 二、合併可節省經費，獨立不經濟。(一)
- 三、合併可期完善設備。(一)
- 四、師範太專門，與普通文化不能接近，合併可以廣大文化陶冶。(一)
- 五、合併可以調劑學風。(四)
- 六、有志上進青年多不願入師範，改為普通性質可多收人才。(一)

而照事實統計，投考者之分佈區域與學校大小成正比，設師範科於高中，學生來源可廣。(二)
- 七、師範生程度，不足研究高深學問，畢業成績與普通學生無異，獨立便成駢枝而且前期師範與初中並峙，學科無異，亦無須獨立。(二)
- 八、現在師資缺乏，應付中學以養成師範人才之責，(一)合併并可輸中學生以教育智識，使有預備任教小學，可補缺乏。(四)
- 八、中師合併，教育革命打破因襲。(四)

反合併之各家意見

- 一、只要制度本身有價值，不管來自何國。(一)
- 二、此是不問制度價值、及適合當地情況與否。(二)
 - 一、若有存在必要而辦理有效，並非不經濟。(一)
 - 二、校舍隔離，職員不能少，教員按時支薪，鐘點未減。(三)

三、合併須另設主任，至設備之因人數而定者不能減；重要儀器，已可通借。(四)

一、經費上中學不容負責設完全小學或幼稚園以供實習。(五)

二、如獨立必要用全力設備，並非不能，而且用師範與普通教育不同性質，不能利用普通學校設備以利用研究。(一)

一、自來教師實嫌太普通，未能專業，而師範生立足於教育者之見地從事科學研究，其對智識之態度與普通學生不同。(一)

二、師範生宜有教育化之純一訓練，其普通學程儘可與中學相同，但取材及教學重點不一致。(六)

三、求得廣大文化陶冶，何不仿英德之附於大學，而遷就併為高中。(七)

四、辦師範是辦教育的教育，師範教育者需有特殊學識及性格，附於中學，易失特性。(五)

五、設科於高中，規模太小，難得長於教育學識之人才，混合教授不能顯師範特殊精神。(八)

一、合併因校風不同，揉同混雜，將有糾紛。(四)

二、在合併之廣大組織，只有機械之應酬。(六)

三、規模愈大，分子愈渙散，交涉流於形式而乏感情。(二)

四、中學生與師範生待遇不同，常起無味爭持。(八)

五、學生過多，師生接觸少，乏人心相感之效。(四)

一、此全與改為普通性質無關，若教員位置不改善，無論獨立與否，總無人願學師範。(一)

二、推廣教師，與其採集中方法，無寧採分佈辦法，增設師校，擴充學額，增辦農村分校。(二)

一、教育宗旨不專在傳授智識，乃在發展完人教師職業非僅有滿腹學問者所能勝任。(一)

二、其畢業成績不異於普通學生者，乃因未能注重“從教育者地位來從事研究”，取消未免因噎廢食。(一)

三、程度相埒未必即可代庖，因師範教育與中學教育之目的作用均不相侔。(二)

一、此乃本一時救急辦法，並無完全理由根據。(一)

- 二、是權宜之計，敝屣教師本來之面目。(四)
- 三、中學是可施行小學師資之補充訓練，但既係補充，如何將原來師範取消？(七)
- 四、中學生從事教育，及中學本身問題，其所造就者，非社會之所需，不能因時之救濟，而動搖為建國大本之教師。(三)
- 一、師範漸趨獨立，是社會分工進化之現象，革命不要達進化原則，合併是開倒車。(四)

註：括弧內之數字代表下列各文。

- (一)常乃惠：師範教育改造問題（教育雜誌十四卷號外）
- (二)羅廷光：師中合併之利弊及個人對於本題之意見（中華教育界十七卷二期）
- (三)范迪基：師範教育之過去現在與將來（中央大學教育季刊一卷二期）
- (四)水寒著：中師合併之疑問（中華教育界十七卷二期）
- (五)余家菊：論中國附設師範科（師大教育叢刊二卷一集）
- (六)汪祖懋：師範教育三大問題（師大教育叢刊二卷一期及教育與人生三十八期）
- (七)孟憲承：師範教育之展望（師範教育學術講座第一輯）
- (八)吳自強：師範教育之根本問題（江西教育行政旬刊一卷六期）

（本文材料來源多由盧邦瑾君搜集，特此致謝）

（東方三十卷二十號）

高等教育革命

——中國教育改造的出發點——

中國教育的應當澈底改造，已爲國內有識者所共見，惟所改造的對象多指中等及初等教育機關，至於大學及專門學校雖亦有人指摘，但不過就其局部方面而言，如教授不應兼課，學生太趨於摩登，設備不充足，經費不能按期頒發等等缺點，未嘗以爲須整個的澈底革命，也少有人主張以高等教育的革命爲全部教育改造的張本。記者爲研究中國教育問題之一人，同時在各高等教育機關服務有年，深深感到此問題的連鎖關係，因不揣固陋將關於此問題的意見提出與關心中國教育前途的同志，一爲商榷，幸讀者不吝教正。

高等教育在中國全部教育中位置的所以重要，其原因有二：

一、高等教育爲一切教育的領袖，其設施往往無形或有形的爲下級教育設施的規範。在中國，此方面的重要，較之在外國更甚。因爲中國小學畢業生幾無不想升中學，中學畢業生幾無不想升大學，不升學的人不獨自身即一般人也以爲大不幸，因此大學的一切，無時無地不影響到全國受教育的人。

二、高等教育機關是養成領袖人物的場所，他的設施甚而至於風尚間接的影響到社會的各方面至大且廣。在中國，這一方面的重要，也較之在外國爲更甚，因爲中國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與全國人口的比例是小，因此每個畢業生每個高等教育機關的影響是更大。

至於今日中國高等教育機關的缺點很多，但歸納起來，重要的也有兩點：

一、精神方面的科舉化——中國自科舉制度盛行以來，教育的

目標不在學問而在科舉，入學者的目的也不在學問而在科舉。所以初辦學校的時候，爲獎勵高等教育發達起見，把舉人進士的銜頭加在他們的畢業生的身上，得着的人至少可以榮歸鄉里光宗耀祖。到現在，舉人進士等等雖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而這種風氣深入人心，學問可以不求，大學專門學校畢業生或學位的銜頭卻須設盡方法拿到手，而社會中除極少數的機關對於這類頭銜也極重視。

二、形式方面的商業化——這一方面的來源比較複雜，推究其故當然是時代的產物。大概一部分是受了外國來華鄙陋商人的影響，一部分是因國內經濟狀況社會制度受了強烈變動的原故。姑不論其原因爲何，這種現象在高等教育機關中處處顯露出來。不但是費用薪金及經濟的一切關係是如此，連師生感情學問傳授種種關係都是如此。這方面的怪現象，讀者請看第一年的社會與教育便可得其大概。（近新生命書局集此類文字成單行本稱大學雜景。）

所以今日中國高等教育機關的靈魂是科舉思想，而其驅殼則周身無一不具商業色彩，這兩方面相互爲因所造成的結果，便深深種入今日中國文化破產的社會裏。使社會更惡化更腐化，幾至於不可救藥。根本救中國的方策雖多，澈底改造高等教育實爲其中最重要方策之一，而且是作者認爲刻不容緩的。作者以爲商業化的毛病在表面上看來雖大至不可侮，究竟還祇表面的，其害處還不及精神方面的科舉化之甚。因此我們先從精神方面的改革談起。

作者以爲精神方面的改革，最重要的在改變入學者對於求學的態度，使入學者了解高等教育機關的設置不是爲了替社會製造若干具好聽的銜頭的人，而是爲了替社會養成真正有實際學術技能的專門人才。假如中國的中小學辦得認真，一個人到了中學畢業的時候

應該有獨力做學問的能力，那末關於高等教育的機關祇須有圖書館研究所實驗室等等便可，不過裏面須請定各種專家供求學者的諮詢（參着拙著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民智出版）。但在中國今日中小學現狀之下，高等教育機關恐仍不能不具學校的形式。茲姑就學校式的高等教育來論，高等教育機關大抵有兩種目標：一在養成學術專家，一在養成實用人才，訓練的方法雖有不同而原則則一。

這兩種的高等教育機關，作者都以爲應具下列各條件：

一、入學轉學易，升學畢業難；

二、修業的後半期應分組；

三、成績最優的在後半期可得獎學金，畢業後願繼續深造的應予以薪金；

四、應以實習或專題研究爲畢業的重要成績。

現在高等教育機關的招收學生，每以校舍容量來定，在今日中學畢業生增加之速與高等教育機關經費之窘的狀態下，入學頗感一年一年的困難。要解決這個困難，除校舍問題容下面再討論外，作者以爲中學及高等教育機關均須採取入學易畢業難的政策。這個方法並不是我們創始的。歐洲各國的中學及高等教育機關，連香港的，都早已如此辦法。以大學四年修業期滿而論，大概每年升級時減少四分之一，到畢業時學生數祇有入學時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假如中學畢業試是極嚴格，畢業生祇占入學生的六分之一或更少，凡是中學畢業的都應免試入高等教育機關（職業及師範學校畢業生自當別論）。不過入學以後，每年升級標準均須極嚴而畢業標準更須嚴格。爲防除預知教師出題心理及教師徇袒情感起見，最好畢業考試由校外專家主持。

至於提議轉學容易的理由，是作者感到今日中國學者與專門人才的缺乏，使各高等教育機關一方面設盡方法互競的拉教授，一方面無論如何不能把一切科系發展到完備（當然還有經費上的原因），所以學生應可以自由轉學，庶各大學不必力求科系完備及強拉教授。關於這一點，我們下面再會談到。

我們主張修業的後半期分組的理由，是因為感到今日高等教育太不切實。本來中國今日的高等教育制度是採自西洋的，而即在西洋，此種制度因受了傳說的影響也不甚適用於現在情形，何況中國的情形又與西洋的大不相同。最好的辦法是就中國今日及最近將來的社會需要重分科系，不過一則此種工作極為繁複，不是短時間所可做的，二則最近將來的需要也不易預料，為救急起見，不妨就所見得到的儘量分組。因為前半期所學的功課大都是基本的，所以可從後半期起。這種分組的辦法，聽說中央政治學校已經實行，其他高等教育機關不妨各就所見的需要去試行。積若干年的經驗後，也許可以創造出一個高等教育的科系新分法（這在蘇俄已經大膽的實行了）。

高等教育的目標既在養成社會中領袖人才，則一方面必須選擇才能最高的學生予以相當的訓練，一方面必須延長年期優予膏火，務使具才能者有深造之機會。以中國今日各種問題之複雜解決之困難及舊制度已破壞新制度未建立中一切的沒有軌道，領袖人才所受的訓練，必須較之外國的更高更深方可應付。作者嘗以為中國的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生出至社會服務時，不是無事可做，便是所做之事非力所能及。譬如學教育的大學或高師畢業生，一畢業便有人請做縣教育局長，以中國一縣之大往往等於歐洲各國之一省或一國，

而教育上的設施則比之歐美相差萬倍，姑不論今日中國大學或高師中訓練不足，即在歐美大學或高師中受過良好的訓練的畢業生也不足以勝此教育局長之重任。在外國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稱為‘開始’，因為畢業後有軌道可循，可從比較低級的地位做起，有了大學或專門訓練的基礎，逐漸學習逐漸升調。在中國，作者以為大學及專門學校應與服務機關通力合作，對於一個有才能的學生，應予以種種獎勵，務使學的時候有機會去實習服務，而服務的時候有機會再學習，使成爲一個獨立做事的人才爲止，不過不必予以高級的學位，以免將來又變爲舍本求末的勾當。我們在此地所主張的並非重視實用人才而忽略了學術研究者。學術專家爲一國文化之所寄，也應同樣或更甚的去獎勵。不可以今日各大學好教授之少，設備之簡陋與留學之不易，此種學術人才更須精選而限制其數目，務求質不求量，其真正足以深造者則應不惜金錢供給其研究費用，養成爲真正專家，或竟供養其終身。高等教育的目標既在於此，則一個學生的修業成績決不在於學分的多寡與修業年限的長短。記得前年各大學與教育部曾有學分制與學年制的爭議，其實這種爭議實屬可笑之極，修滿若干學分固不足以等於畢業，修畢若干學年亦不足以稱爲畢業，假如採取上面所說的升級與畢業嚴格的辦法，在四年期內可以畢業的最多祇占四分之一，其餘的或須五年六年以至於十年。況且我們的目標既在養成一個真正的實用或學術人才，則一個學生所受的訓練應與所具的才能相當，如此則照現在的標準本可四年畢業的天才生我們更須去繼續訓練他。至於‘中等’的學生，我們不希望他獨當一面去做事或研究的，則雖想達到一個大學教育最低畢業標準恐也不止四年，因爲中國今日中學教育的差，在大學的前半期尙

須費於基本功課的準備，到了後半期雖可從事於專門功課的學習，必須費去大部分時間去實習或做專題研究，而這兩期工作恐都在二年以上。

形式方面的商業化，大概重要的可分下列幾點來看：

一、學校當局以教授出名功課繁多來招徠學生；

二、教授以鐘點拿薪水，祇是打鐘上堂打鐘下堂，不管學生得到學問與否，兼課多的甚至於輪流在各校請假；

三、學生繳費註冊後便算在校修業，修業滿期了便要文憑學位；

四、能代表學校參加各種運動或演說比賽的學生被學校特別優待。

要矯正這些弊病，各高等教育機關應有聯合組織，辨清高等教育的目標與責任，首先糾正大家互爭經費教授與學生的惡風氣，一致認定高等教育既為救國的要圖，必須通力合作而後可。若能如此，作者敢為下列的建議：

一、減少科系與功課數目，集中經費各向所長的科系發展，在同一區域內的學校切避工作上的重複；

二、限制教授學生上課鐘點，注重教授學生以研究與實習工作；

三、體育演說等活動概交學生會自辦；

四、膳宿招商承辦，由學生直接接洽。

以中國今日人財兩窘的局面，要個個高等教育機關科系完備，必至於徒有虛名而無實際。若大家有聯合組織，可先期商定各校發展方針，最好連功課的分配也互相商定。假如各科系及功課數目減

少，有的科系在甲校可以完全取消，在乙校則儘量發展，有的科系在甲校開的功課乙校可無之，乙校雖有同樣的科系而所開功課另有所長，如此若能照上面所述學生可以自由轉學的辦法，則以今日同量的經費，必可收兩倍的效果。

關於教授的聘請，作者以爲最好組織聯合聘任委員會，凡有志任教授者應先向此會註冊，或該會覺某人學有專長請彼註冊，然後就各校發展的方針與需要及徵詢本人的同意後決定服務地點，如服務期間他校有此需要或本人不願意在原校服務，聘任會應儘量設法遷調。如此則毫無學識者不致濫竽致席，行政當局之更換不致影響於學術研究，而一切爭教授的弊病可以免去，教授服務得以保障。至於教授的待遇，雖在今日現狀之下未必能完全劃一，而各地生活程度亦有不同，但最低額及最高額必須聯合規定，且必須有年功加俸及七年進修的辦法。薪額絕不能以鐘點來定。兼課的允許在萬不得已時可兼兩校，惟僅酌加車馬川資，薪水總額可視在兩校所任工作輕重由兩校分任，但不得多於其他不兼課的教授。教授宜分等級，進級標準應聯合規定，而每次進級時應將理由公布並徵聯合聘任委員會之同意，以後轉任他校功課時，資格仍然存在。七年進修的辦法必須強制執行，教授若無進修機會，是高等教育自殺的政策。進修時應予以種種便利，使感到學術工作的滿足。

體育演說等活動在歐洲大學中完全由學生會自己主持，在香港大學亦然（去年南方三大學聯合運動會即由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起且自告奮勇作東道主，一切佈置招待均極周到，主持此會的領袖是香港大學的一個醫科學生，亦即全場冠軍且爲香港大學爭得團體第一者）。高等教育機關既係屬於學術工作性質，體育的提倡本不必管

，況且現在各地業餘體育組織日見發達，學生儘可以個人名義加入。學校中不妨注重普遍的體育，選手式的體育有時未必與青年身體上發展適合，至以得錦標爲榮則更失卻設校原意。至於其他比賽則更可由學生會辦理。

學生的膳宿在歐洲大學中亦多不由學校辦理。就中國今日情形而論，學校當局往往費大部分精神於膳宿方面的經營，未免失當。近來有些學校以建築輝煌的宿舍來招徠學生則更屬下策。膳宿既爲一般生活之一部分，學生入學與否均需之，則最好不由學校辦理。若採取上述辦法，中學畢業生可以一律免試升學，則在暑假以前即可開始報名，然後預計志願入學者的名額招商承辦。膳宿兩項均可分定等級，富的學生儘管多出錢喫好的住好的，窮的學生也有省錢的辦法。教育行政及學校當局自應訂定若干簡約如宿舍閉啓時刻及衛生與清靜的公約等等，但一切費用的交涉由學生直接處置。商家對於此種營業雖未必能取利甚厚亦不准其取厚利，但收入卻穩固可靠。近來各地公寓學旅日見增加，惜辦理不善以致弊病甚多，若教育行政及學校當局加以注意，必可不費一錢而收良效。

關於高等教育精神與形式方面的改革，作者的意見大致如右，今請進一步討論今後中國高等教育的使命。

中國今日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民生問題。此問題若不解決，則今後混亂的局面當無已時。近年來經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提倡，各地同時對於此問題注意者漸衆，且多以興辦職業學校爲解決，此問題之重大複雜決非中等程度的職業教育所能解決。在今日中國情形之下不是應準備入某職業界而是無任何職業可做。據前年廣州市的調查，無職業者幾佔人口之半，而有業者之一半中除純粹靠勞力維持生

活者外又大都是分利者，如官吏教員軍警之類。以全國計，經歷年的天災人禍，無業者恐亦有增無已。摧殘事業的日有人在而開闢事業則鮮見其人，且少數新事業經若干人若干年的經營可因‘不測’之風雲毀於一旦。長此以往，不獨職業減少，且全國經濟界的損失不可言喻，況此種情形養成人民的貪污與投機，中國不亡於窮困，則將亡於無道德人格矣。

若要開闢新事業決非一般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所可爲力，作者以爲必須以高等教育機關爲中心，由全國各界通力合作做後盾纔有希望。這個問題的解決，不但可以起中國民生於復蘇，且將拯救中國文化於垂危之際。作者對於此問題不敢言有深刻的研究，但是感到他的重大和解決的不可緩，因此不敢緘默而作野人獻曝的貢獻。

作者以爲中國今日唯一的出路是一方面作大規模的移殖人民計劃，同時一方面作大規模的整理鄉村計劃。這是整個計劃的兩方面，必須同時並進然後可以雙方解決。關於殖邊移民的事情近來也頗有人注意，如前年浙江曾有數萬移民送至關外，去年安徽聽說也有，不久大約還有陸續繼起的。可惜計劃不周，結果幾等於零，而且因此使人民生了反感，以後更阻礙這種事業的進行。以今日中國人愛鄉心之深與各種科學研究之幼稚，若無詳細精密的計劃，殖民必無往而不失敗。作者以爲此種事業必須全國通盤籌算，初步經費應由政府與全國企業家共同擔任，而設計責任則應由高等教育機關負起。

因此作者主張將全國高等教育機關的教授學生分爲三股：一股繼續現有的工作；一股從事於殖民的設計；一股從事於內地鄉村的整理。後二股的工作的大部分須先費於調查，關於調查的費用應由

政府及企業家擔任，調查後決定的計劃，擇定區域先行試辦，試辦有效然後在同一性質的區域中推廣之。在調查計劃及試辦時應由教授及大學專門學校學生分任主持，而輔以若干中等學校畢業生。至推廣時則以大學專門學校及中等學校畢業生主持，而輔以一般民衆。如此，然後殖民可以成功，鄉村可以整理，學生可以有出路，民衆可以有生財之道，而中國方可轉危爲安。

在調查與計劃工作中，所需學術助力的範圍甚廣。如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生物學，語言學，考古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教育學，以及農工商各業及人民生活狀況，無一不需專門學識。如此則偌大之中國變成高等教育的最好教本，所得者必較參考千百種舶來圖書爲多，且亦須此種參考，不過目的不在書本上求結論而在實際問題上求解決。且因此而可真認識中國的天時地理物產人性，找出我們民族的優點從而發揚光大之，看到我們民族的弱點，設法改善消除之。

中國以往的高等教育，在理論上在形式上是想效法西洋，但是實際上因爲經費人才種種的關係，以致成爲這樣一個非驢非馬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東西。但是本身不像個樣子的事還小，其遺害於社會的地方實大。就教育本身來看，他的一切的制度辦法甚至於風氣，影響到整個學校系統使各級教育機關都仰慕他做倣他，間接的影響到後代青年的全體；就社會方面來看，這些機關養成一班所謂高等遊民，高不成低不就，成爲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至於土匪共黨的候補人繼承者。所可痛心的是這班人大都是國內的聰明有才能的人，在未入學的時候及求學時代是極想救國救民爲國服務的，祇可惜入社會後無正當的軌道可以容納，初則僅望得一立身之地糊口之

道，繼則地位愈高慾望愈大，爲自私自利之心所驅使，社會風氣所迷戀，終而至於欲潔身自好而不能，遑論犧牲服務舍己爲人的精神。間有少數有識者感到此中弊害，亦無法與羣衆勢力相抵抗，然據作者所見，長此以往，其弊害恐更將出人意料之外。

此種局勢，作者以爲決不是割肉補瘡所可挽救，必須整個澈底的革命，將救國救民的大計加於全國有智才青年身上，尤須改變其求學態度，從實際服務中感到自身學識的不足去增其求知熱，使明瞭任何事物皆可應用科學方法去創造整理，則不獨可一洗舊弊，使國家與有望之青年兩得出路，且將民心士氣爲之一振，庶可挽狂瀾於既倒。

至於實施的辦法，作者以爲關於鄉村的整理工作，任何高等教育機關若得當地官廳政府的助力就不難進行，惟必須任此工作者爲熟悉該地語言風俗人情的教授與學生們，出以和藹謙誠的態度，站在真正公僕的地位，方可收良效而不致受阻礙。殖民事業則以接近邊土的各高等教育機關爲宜，如東北西北一帶可以向滿蒙新疆各地發展，西南各省則宜注意於青海西藏等處的開闢，東南沿海各省仍可繼續海外殖民的推廣，中部各省也可視需要與人才來酌辦移民準備事業。中國在海外的殖民在百數十年前是由人民自動的前進，那時白人及東鄰的殖民競爭還不利害，而華僑靠堅壁清野的奮鬥已有了一頁光明史，且在中國維新局面的創造上有不少的助力，但是到現在因爲白人與東鄰用科學方法來競爭，華僑勢力已到了強弩之末的境地。要保持與推廣這種勢力，非有政府與學術機關做後盾不可。若能通力合作，作者相信會再有一頁光明史，再予新文化創造上更大的助力。向西北東北西南邊地的移民，恐也已到了不能不實現

的時候，然而也非政府與學術機關來做後盾不能收效。願國內高等教育機關在文化上負起這個繼往開來的重大使命！

(東方三十卷十二號)

鄒平鄉村建設的近況及其動向

一 前 言

鄒平與定縣無錫有全國民教事業實驗的三大中心之稱。此三大中心實驗的主持機關是鄒平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定縣的平民教育促進會全國總會與無錫的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後二者的主持人多為作者留學時舊友，無錫固常去，定縣亦曾往參觀，且時在他處與工作人員晤談，故其工作狀況比較清楚。鄒平的主持人梁漱溟先生雖在中學時代與作者一度同學，在廣州時亦曾見面，自往鄒平工作後未嘗晤談，其他重要工作人員亦僅一部分會過面，因此作者屢思前往參觀及領教。本年八月社會教育社舉行第三屆年會於開封，會畢後乃偕崔載陽先生同往。

關於鄒平研究院的成立經過及兩年前情形，已見之於孔雪雄先生編的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中山文化教育館發行）陳禮江先生的鄒平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參觀記，（申報月刊二卷五號）及楊效春先生的從鄉村教育的觀點看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中華教育界二十卷五期）等。本文所述近況以最近兩年的為限。不過數點為上列各文中未注意及的亦略追述。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以二十年春開始籌備，六月中旬開學。內部組織分為：

- 一、 鄉村建設研究部；
- 二、 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
- 三、 實施鄉村建設的試驗縣區。

其所以設立試驗縣區的用意有兩層：

“一、是訓練學生不徒在口耳之間，更有實地練習試做之資”；

“二、是以此爲各縣鄉村建設的示範，以此爲本省鄉村建設的起點”。

鄒平縣卽該院開辦時的試驗縣區。至其所以選擇鄒平的理由是：地點比較適中，縣分不過大，不甚苦而亦非富庶，不太衝繁而交通又非甚不便，大體爲農業社會，受工商業影響較小。該院之所以設於鄒平是先定了這些條件，選上了該縣而設的。不過鄒平在二十二年春改爲縣政建設實驗區以前，縣長雖由該院保薦於省政府委任，但縣政府下之四局仍由省政府四廳直接委任，且各種事業均須請命於上級政府，與一般辦法大不同的便無從設施，而縣地方的各項行政實際上各爲預算，不但在局與局之間不能通融挪用，就是一局之內各款各目的界線亦特別清楚，挹此注彼，也是事實上所不能的。除地方收入一部分用之於各局外，鄒平縣政府的經費，因列入三等縣，月僅一千零數拾元。所以在未改爲縣政建設實驗區以前祇做了些局部的試驗，其中重要的爲農鄉學校和棉業運銷合作社的創設。

二十二年三月山東省政府遵照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的議決案，才劃濰澤鄒平兩縣爲縣政建設實驗區，兼鄉村建設實驗區，同隸於該縣，作大規模整個的實驗。

二 特 點

鄒平所給我們的印象，有幾點可以說是與其他實驗區大不同的第一，到鄒平去，絕對不看見標語與招牌。我還記得前幾年到徐

公橋去，一入境便看見一座大牌坊，說明這是實驗區，面積幾許，四址若干里寬若干里長，入境後更見許多信條。曉莊的信條尤爲人所稱道。至於定縣的招牌如特約農田表證家庭之類可以說是目不暇接。獨到鄒平，不見一條標語，一塊招牌，祇在縣城外某處照壁上有一些說明。鄉村建設研究院的招牌也與其他各學校的一樣。就是內部人員分處分科分股等等也沒有新奇的名稱。我敢說，鄒平的一般老百姓，有許多雖身受實驗之益而未嘗聞實驗之名。

第二，鄒平工作人員的精神很可欽佩。他們的待遇都很菲薄，除了少數月支百元以上的，大都祇支五六十元，雖則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但是他們服務的時間很長，生活很苦，而且甘之若飴。他們吃的東西是和本地人一樣的饑饉，住的房子是把原有的略略修理一下，穿的衣服有長有短，但都是土布，戴的是下田的大草帽，着的是芒屨，走到街上的時候並沒有留學生或準留學生的神氣。他們的工作是異常忙碌，不過他們對於鄉村建設的信仰也很堅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別處多數人知而已矣，勉強行之終覺不慣，少數人好而已矣，也還不自然。在鄒平，我敢說，樂之者占多數，好之者也不少，起碼是知之者，至於靠鄉村建設或民教事業來吃飯的，可以說絕對沒有。鄒平工作雖忙，但他們決不輕易拉人找人。實在講起來，多數都是自己情願去的，而且曾在他處服務過，有過鄉村經驗的。因此個個都是埋頭苦幹，不看見有人得閒，亂發議論或互相辯駁。這種一致向前幹的精神真可佩服。

第三，鄒平的工作有深刻的理論基礎。鄒平幹部人員都是飽嘗憂患的同志，對於鄉村破壞的現狀和原因極認識與了解，所以他們的理論基礎是深刻而不是膚淺的。他們不亂發議論，更不迷信西洋

的學說，雖則他們對於西洋的理論也認識得很清楚。我們知道鄒平研究院的前身是河南村治學院，他們的主持人便是村治月刊的編輯者，籌備該院時還加上創鄉建理論的梁漱溟先生。上面已經講過，該院之所以設於鄒平，是先立了條件去選定的，所以到了鄒平，他們的目標與計劃是先安排好了，雖則後來因了實際狀況而有修正。他們不但是先有理論前去實驗，而且這個理論是經多人多年的探討，這些人又有過對於鄉村深刻的認識與了解，決不像有些地方隨着一時興來所想到的，或看見外國宣傳過的，便一時衝動着去做。他們錯誤未嘗沒有，但嘗試則不輕出。

第四，他們的實驗是有中心的。該院的理論雖是一致，但出發的步驟似有兩種主張：一以自衛為出發點，一以組織為出發點。前者可說是村治學院的舊同人，因為在河南各地飽受土匪兵災之禍，深感欲求建設，必先自衛。後者可說是鄒平研究院成立後加入的一班同志，以為要想建設必先有組織。恰巧山東省政府指定作縣政實驗區是荷澤與鄒平兩縣。荷澤在魯西，素以匪患著名。鄒平則在魯東，偏於中部，向少匪患。因此荷澤即從自衛着手，而鄒平則從組織着手。不過組織與自衛不同，不是一朝一夕所可見效的。因此有人參觀過荷澤的，以為荷澤的成績好；的確荷澤的自衛不但肅清了縣內的匪患，連鄰縣的也幫忙打平了不少。

三 近 況

鄒平研究院於二十年六月招收第一屆訓練部學生三百零一人，其中附學的四十餘人，鄒平本縣的四十餘人，餘為舊濟南道屬二十七縣的。七月入學，二十一年六月結業，各回本縣地方辦理民衆學

校（原稱鄉農學校）或擔任區長等職務。在二十七縣中除鄒平不計外，成立了七十七所民校，內高級部五十六班，普通九十七班，學生五千二百八十人。第二屆學生招收魯西魯南四十一縣學生二百八十餘人，又附學生四十餘人，共計三百二十六人，於二十一年七月入學，二十二年六月分派鄒平荷澤兩縣實習四個月，於十月底結業，除留院及兩縣服務外，餘回本縣地方擔任工作。

為指導第一屆學生服務起見，該院曾設有鄉村服務指導處，但自鄉農學校改稱民衆學校後與教育廳令各縣推廣之民校性質相同，因與教廳相商，移交該廳接管。二十二年十月一日由教廳召集各該縣民教館館長及該院結業同學每縣舉代表一人，舉行會議。會畢後產生山東民衆教育輔導委員會，由院廳及省民教館三方各推二人組織之。該院的指導處也於十月底移濟。

第二屆結業同學為兩縣留用的有一百一十人，餘回本縣在各該縣民教實驗區服務。適該院總務主任及教師二人新任縣長，得省政府許可，任用結業同學數人為區長。

至研究部第一屆學生四十人亦於二十年七月入學，修學二年，至二十二年六月結業的有三十三人，多半留在該院及兩縣服務，其中有任縣政府科長的，有任輔導員的，有任鄉農學校校長的，有任其他事務的。

第三屆訓練部學生及第二屆研究生本應於二十二年秋招收，其時適為兩實驗縣成立之期，而荷澤實驗縣成立不久即遭水災，經濟尤感困難，兩縣人財均感不足。該院乃呈省政府暫停招生，集中人財進行兩縣事業。並將節餘之學生膳費及津貼，補助荷澤辦理鄉農學校及自衛班，凡四個月，每月二千七百六十元。

二十二年秋雖未招新生，但因外間請求，於十一月籌辦短期講習會，以四個月為限。入會的須曾受高等教育，或具同等學力，經審查合格的。此會於二十三年元旦開學，由梁漱溟先生主講。不幸僅一月餘，梁先生病倒，講習會不得不中止。同時該院舉行連莊會訓練班，第一期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第二期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受訓練的為該縣一千二百間，每間一人，須年在十八歲至二十五歲，有身家田產的。（其詳請參看教育與民衆五卷九期鄒平民衆自衛訓練的評價一文）

荷澤實驗縣成立之後，即由該院副院長孫廉泉先生任縣長，而副院長則添聘王紹常先生任之。鄒平實驗縣成立之後，則由前村治學院教務主任王柄程先生任縣長，原任縣長徐樹人先生調充該院秘書長。二十二年十月該院院長梁仲華先生因病辭職，乃與研究部主任梁漱溟先生對調。二十三年七月王先生因事請假，縣長職務暫由梁漱溟先生兼代。同時呈准省政府自二十三年度起鄒平荷澤兩縣變更縣行政組織，將四局改科與原有一科合成五科。預算亦照中央關於縣政實驗區的規定就地方收入保留百分之三十，其百分之七十則撥數報解，因此人員待遇略增，實驗經費有着。

二十二年七月就魯東魯北四十縣招收第三屆訓練部學生二百三十四人又自費生九十五人，第二屆研究生十四人。訓練部學生中魯東二十六縣的一百餘人在該院訓練。設第一分院於荷澤，魯北十四縣學生約一百人歸分院訓練。兩部入學程度均提高。研究生必須曾在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訓練部入學程度至少須初中畢業，實際上有高中及師範畢業生，及大學或專門肄業生。入學後分班即以程度分別訓練。鄒平該院訓練部有五班，最高的一班即為大學或專門肄

業生。訓練部學生待遇照舊，即每人每月發飯費五元及制服，研究生除飯費五元外，津貼由十元增至二十元，而結業年限則由二年縮短為半年至一年提出研究論文經評定合格的。

課程方面第二屆訓練部的前半與第一屆同，後半分五組：即精神陶練教材研究組，自衛訓練組，國學教材研究組，農村問題教材研究組，鑿井訓練組。第三屆分兩期，第一期九個月為普通訓練期，第二期三個月為分組訓練期，計分四組：即合作，醫藥，自衛，農業問題。研究部課程無定。但實際上梁漱溟先生每日兩小時的鄉建理論，不獨研究生去聽，其他教職員也幾乎全體參加。

四 動 向

該院所屬的兩實驗縣，菏澤在魯西，此次未去。鄒平的實驗，以組織為中心，已如上述。實驗縣成立之後，首將下級自治機關改組。取消原有的七區而另按照縣內戶口自然地勢社會習慣等情形，除區域外，劃分為十四鄉。鄉之下有村閭鄰，而以村為鄉之組合單位。鄉設鄉學，村設村學，用教育方法指導人民“從事實上逐漸發展其地方團體生活養成其公民組織能力，而後其自治組織自然形成出現，國家乃繼而正式承認之”（見鄒平縣實驗計劃）。

鄉學村學之組織系統並無法律上的規定，可說尚在試驗中。下列二表係由韓家坊鄉學中抄來，但僅可視為一種該鄉試行的草案，藉作一例。

鄉學組織系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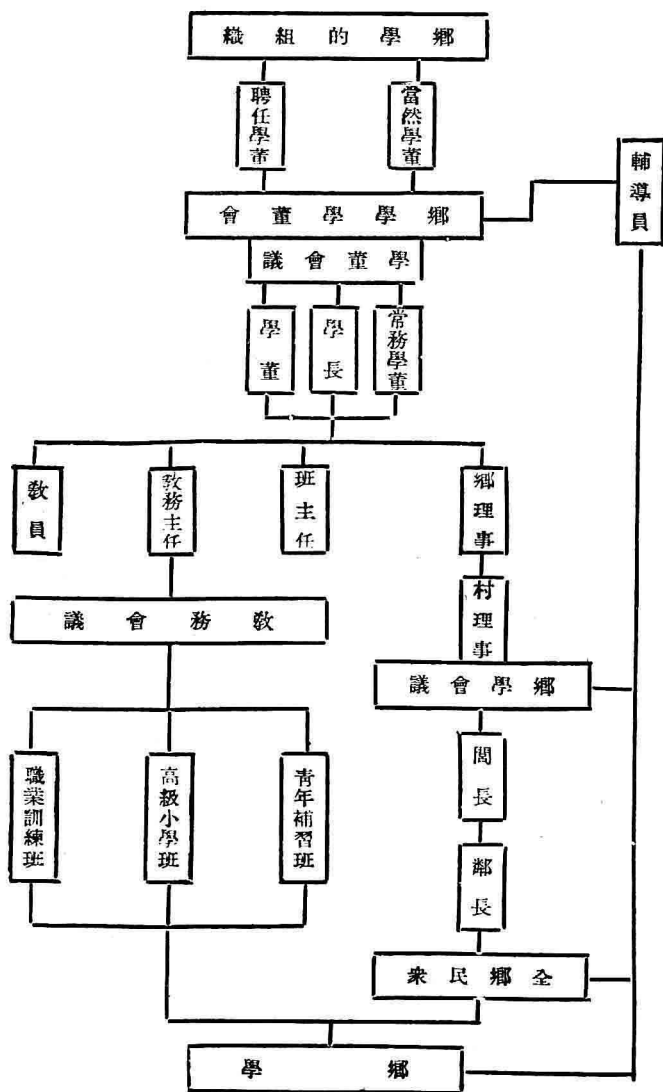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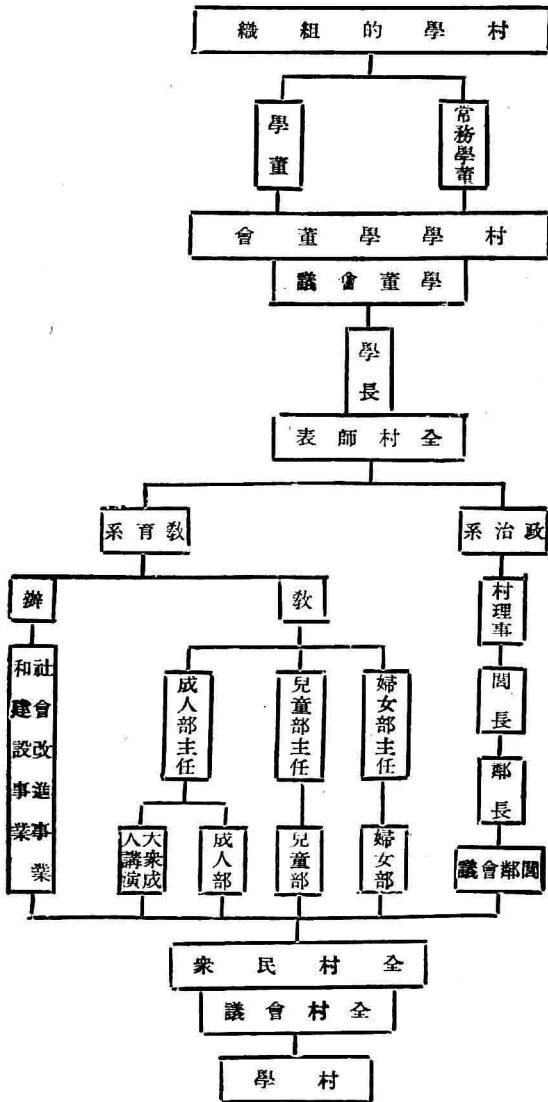


圖 統 系 織 組 學 村



我們看上面的組織系統，便知道鄉學與村學中有學董，學長，理事，教員，四類人。“村學學董由實驗區縣政府，就本村人士中遴得相當人選，經邀集村衆開會諮詢同意後，由縣政府函聘之”。每村學董三人至五人，任期一年，推一人爲常務學董。鄉學學董有兩種：“（一）本鄉各村村理事及未設村學之各村村長，均爲當然學董；（二）本鄉人士，資望素厚，熱心公益者，經縣政府禮聘一人至三人爲聘任學董”。前者以本職任期爲任期，後者任期一年。互推常務學董一人或二人。“鄉學村學由各該學董會依該區民衆羣情所歸，推舉齒德並茂者一人，經縣政府禮聘爲各該學學長。學長主持教育，爲各該區民衆之師長，不負事務責任。”鄉理事村理事之產生未見明文規定，大約也由縣政府聘任，其資格以年富力強有辦事才能的爲合。教員‘以縣政府之介紹而學董會聘任之’。每鄉由縣政府派一輔導員，‘常以縣政府的意思傳達於地方……同時地方上的情形和公共意見亦由他轉達於縣政府’。

‘鄉學村學之設立，以政府辦法，地方樂於接受；地方自動，政府善爲接引爲原則；無取強迫進行。除鄉學因關係地方行政較多，須於本實驗區工作開始後三個月內一律成立，以應行政上之需要外，其村學應逐漸推廣設立，不定期限。’（以上均見村學鄉學須知）所以在我們參觀的時候，二百多村中，成立村學的不過四十餘村。

村學鄉學所以設立的理由，梁漱溟先生接任縣長後曾召輔導員鄉理事講‘村學鄉學之由來’，闡發甚明。茲引數段於下：

“不要說中國多數人對於新政治制度尙不明瞭，就是已經完全明瞭，亦未必就會運用建立，因缺乏在事實上熟練進行的習慣故也。

。譬如一個人對於自行車機件的構造與配合，在道理上可以很明白，可是假使他素無練習，必不會騎。……

“我們所謂新政治習慣無非就是團體生活的習慣，而團體生活習慣的養成天然須從小範圍着手去練習。……所謂新政治習慣可分兩方面去說：一面是對於團體公共事務的注意力，一面是對於團體公共事務的活動力。……

“一、村學鄉學意在培養新政治習慣，啓發大家的注意力與活動力，讓多數人從被動地位轉到主動地位，從散漫消極變為積極團結。……我們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作鄉村建設實驗，什麼時候才算成功呢？捷直了當的說，就是村學鄉學真正發生組織作用，鄉村多數人的注意力與活動力均行啓發，新政治習慣培養成功，而完成縣自治，研究院實驗縣的大功，就算告成。

“二、培養新政治習慣必須合乎舊倫理精神。……西洋自中世紀以來即無時不在競爭抗鬥之中，時時唱武戲，而中國人則從來就只會唱文戲，不會唱武戲。……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是從義務觀念出發，義務觀念就是把人與人連鎖到一塊。在中國如從權利觀念出發，那就是只有更加散漫，紛爭百出而無合到一塊之理。……中國倫理是從情誼出發，故不以自己為中心而以對方為重，……則人與人間的關係可以作到聯鎖密切融合無間的地步。……我們村學鄉學一則不提四權，……固然鄉村不能沒有罷免的事，但不能由村民大會投票去作。那是太硬太辣的辦法，太違反人類溫和禮文深細醇厚的心理，粗野之至——數千年陶育於禮文謙敬的中國人，那裏能走這樣的路，採用這種辦法。——再則我們村學鄉學一切不從法律說話而從倫理情誼出發，所有粗硬的辦法在中國社會皆不能用。

三則我們村學鄉學不唱對台戲，如舊日的鄉鎮公所，一邊有鄉長，一邊有監察委員會，就是唱對台戲。在我們村學鄉學組織中負事務責任的村理事鄉理事，固亦應受人民的監督。但必須避免直接正面的衝突。如何避免呢？我們於此轉了一個灣，增設了一個學長，站在超然地位，不負事務責任，讓他來盡監督教訓的責任——監督作用轉移在學長身上。……學長是一村一鄉之師，超居衆人之上，對於大家的是非曲直，自能主張公道，理事對其監督教訓自亦樂於接受，——鄉村政治的運用，其妙全在此。我們即把中國向來年高碩德表率羣倫理教化思想裝在村學鄉學組織裏，積極發揮去。……

“三、今日鄉村組織必須是一教學組織……內地鄉村必須先開胃口，肯於接受新方法，才好進步。……中國一向就有此長處，很富於向上心，一切尊師重道敬長尚賢都是這種心理的表現，這是中國社會最好的一種風氣。從此可以開出大家求進步的意思。……大家於此應當注意：‘求進步’必須放在‘向上學好’的心理之下去作，如單單說求進步，則打不動鄉下人的心，最根本的是提振鄉下人學好振作向上的志氣，把不好的風氣驅除整頓起來，才好求進步。我們廢掉鄉鎮公所而成立村學鄉學，用意即在此處。如一上來就成立自治組織，偏乎自主自決之意，則擋住了向上學好求進步，他將不能謙虛接受對面的方法與領導。……”（鄉村建設四卷三期）

開胃口必須滋養品，而輔導員教員就是輸送滋養品的，滋養品則來自研究院。所以村學鄉學的設立，實是利用一種廣義的教育力量來振起鄉村向上求進步的心理，從而注意公共事務，養成其對於團體公共事務的活動力，以義務觀念為出發點，合作進行，使散漫消極的鄉村變成積極團結的。這便是鄒平鄉村建設實驗的目標。此

目標既達，則一切新方法新技術自可源源灌輸。

五 困 難

上面這一番說話是梁漱溟先生經過十多年的觀察與研究而發出來的。其理論的基礎是很深刻的，梁先生現在在該院每日上兩小時課，便是發揮他的鄉建理論，此項演講已開始數次均未完畢。我們細讀梁先生過去發表過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時在進步中，聽說他還有一套‘鄉建基本原理’尚未開講。梁先生身兼三要職（院長，研究部主任，縣長——梁仲華先生因病請假未回），而參觀人又絡繹不絕，每次參觀人到院必親自招待，以致此種研究，完成無日。

其次在鄒平做工作的同人，雖有從梁先生多年的，但對於梁先生的理論完全了解的恐還不多。且事忙人少，該院既不輕易拉人找人，大家工作太緊，能專心或部分時間來研究的幾乎沒有，如此則欲將此理論見諸實施，自非易事。況且實施時必須每個鄉村負責人都了解他的意思才不致弄錯。鄉學村學雖已成立了一年，真能照此說法做去的恐怕不多。此次的演講便是對一年後改聘的鄉理事說的，可見前任的必有不同意之處。

至於該院學生前兩屆招生時有‘同等學力’之規定，訓練部第一屆的學歷初中及前期師範畢業的與各種講習會的幾各占六分之一，為學歷中最多者。第二屆的學歷亦以講習會畢業的為最多，計八十五人，次為初中及前期師範畢業或肄業的計四十五人，高中及後師範畢業或肄業的在兩屆中均占第三位。研究生第一屆的學歷中大學畢業或肄業的占三分之一為最多，次則各種養成所畢業的占六分

之一，甚至有高中及舊制師範肄業的。學力雖不能以在任何級學校畢業與否爲衡，但究竟程度較差。出而應付鄉村建設中各種複雜問題已非易易，況依據理論去通力合作求達某一目標乎？因此第三屆訓練部及第三屆研究部招生時已取消‘同等學力’一項，研究生名額減少，重質不重量，今後結業學生或可服務效率較高。

該院師生生活均極簡單。刻苦耐勞本爲服務鄉村，甚至全中國的人們所應當的。不過飯食太差，或有礙於營養。中國一般農家的營養不足似已爲專家所公認，如何用同樣的支出得較富於營養的食物，確爲今日中國食物學者所最宜努力研究的問題，若增高支出則爲在農家經濟狀況改善以前所不可能的事。不過該院師生工作既忙。則食物方面若太菲薄，恐於身心活動上或有妨礙，且易致病。農家的經濟較好者本有初一十五肉食之舉，似亦不妨試行，藉以調濟，而與刻苦的習慣養成亦未必違背。

看看容易而實則是難解決的一個問題便是教材的供給，此處所指教材當然是廣義的。村學鄉學既以推進整個社會，教育全鄉村人衆爲目標，則所用教材決非與一般學校中所用的相同，更無從抄襲外國的一套。該院第二屆訓練部即依教材分組，一方面復設輔導委員會專供給第一屆結業生所辦鄉農學校的教材，但據各鄉農學校報告（發表於該院鄉村建設旬刊中的）似乎還沒有找到頭緒。本來這件事是極不容易的。定縣幾年來集合許多專家最努力的工作是在這方面，而所得的究有幾許，尙屬問題。現在鄒平比較的可供給的教材是農場方面實驗所得，如鑿井配豬植棉之類，該院目標既在提振鄉下人齊心向上學好求進步，要做到這一步固已不易，但做出以後有什麼滋養品可以輸送，使開胃口後源源不絕有東西吃，實不可不

事前準備。大家總以為這些新技術新知識祇須從外國去搬來，就行，恐怕中國人的胃口吃大菜未必消化而且太不經濟。要記得在現在所謂新教育制度未成立以前，似乎中國學校教育假如能同外國一樣的普及，中國便立刻可以一樣富強。現在學校教育雖未普及，已感過度發展，一般兒童與青年，胃口可稱為開了，但是所得的滋養品，全不合式，以致百弊叢生。一般社會的胃口若開而去亂吃，其危險更甚於今日的學校教育。在這方面，我希望該院多加研究，更希望定縣無錫或其他中心機關來共同研究，因為這件事必須集多人多年的力量或則有些少的成功。（參看拙著高等教育革命，東方三十卷十二號）

六 尾 聲

據作者所聞所見，各地鄉村運動如雨後春筍，有理論有步驟有目標有系統而又不擾民不害民的，當以鄒平的實驗為第一。然而鄉村建設不僅是局部的片面的努力所可成功。況且今日建設的力量甚微，破壞的力量甚大。鄒平在全國各縣中因係偏僻小縣，可掙取的地方不多；破壞的程度還低，建設也似乎較易。定縣自清末以來即有模範縣之稱，然而鄉村崩潰的加速未嘗因平教事業而見低。近年以來不能維持生活而流亡於東北的年即在二萬以上。無錫素稱富庶，其境況亦愈趨愈下。雖則鄉建的聲浪日大，究竟能否抵得住破壞的力量實為大問題，不過我們希望此長彼消，總有一天建設的力量大於破壞。

我在中國民族的出路與中國教育的出路一文中曾追說過中國民族的出路在積極方面是整理內地與開發邊疆。（參看我的教育思想

中華)我所謂整理內地即是鄉村建設，不過建設時千頭萬緒，其內涵的複雜，迥非今日努力於此運動的人所能完全看清，有些不能預料的錯誤自難免除，不過有些掛羊頭賣狗肉，甚或以沐猴而冠為能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恐當事者不能不負相當責任。作者手寫此文，一方面在介紹鄒平的工作，一方面更望大家勿求近功貪急效。中國有句俗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而鄉村建設事業的完成雖不需千年，也必需百年以上。因此我們問梁先生今後步驟，他的回答是‘緩’字。Slow but sure，總有成功的一日。

二十三年十月草於西子湖畔

(東方三十二卷一號)

TRENDS OF NEW EDUCATION IN CHINA

(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Sixth World Conference of New Education, Nice, France)

Introduction.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only a generation. It wa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that an educational system similar to that in Western countries was officially promulgated. However, it was modern in form but, old in spirit. A large number of school subject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school curriculum, but all were taught in the same manner as before. The whole system was neither suitable to the child's life nor adapted to the na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or so, Chinese educators began to feel that China needed an educational system of her own, but of course no national system can be created overnight, and it will take quite a long time before it will be formed into something definite, or, perhaps, it will always be in the state of evolu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Furthermore, China is such a vast country that perhaps it is not wise to have one national system for the whole country but several for different parts or provinces. What we are going to consider are only beginnings of such experimentation which may be observed up and down the county.

Two Pioneer Schools.

It was on the eve of the World War that schools in China began to feel the need of experimentation. The first experimental school, an elementary school, was founded in 1917. This school, then attached to the Higher Normal College at Nanking, later to the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is now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t is of interest to note some of the experiments undertaken by this school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its existence. Rigid classification of students had been abolished and the whole student body divided into three large groups according to age and ability: the lower, the intermediate, and the higher groups. The lower and the intermediate groups are again each divided into three or four sections, while the higher group is divided into twelve sections. However, members in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same group may be interchanged at any time of the year. Furthermore, a pupil may join different sections for different activities or subjects. Promotion is based upon mental and educational tests as well as upon chronological age.

In the lower and intermediate groups, teaching is largely conducted on the project basis. The curriculum of the lower group consists of story, study, construction, and play. In the intermediate group, subjects like reading, composition, and arithmetic begin to appear, but they are taught in a correlated way, while social and nature studies, industrial and fine arts are not differentiated. In the higher group, subjects taught in the ordinary elementary schools appear in the time table. However, discussion is the method used and correlation is the principle adopted. Silent reading is encouraged and current events constitute a major part in social studies.

It is in this school that a building named after Dewey has been established. It houses the lower group and in it Dewey's principles are put into practice.

Another school famous for its freedom in study and learning was also founded a decade and a half ago in the former capital of China. This school, named after the great French philosopher, Auguste Comte, was at fir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 and is now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Franco-Chinese University. It has both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grades and the whole school is organized into one community. This community organization has four departments: literature, arts, athletics, and music; and publishes a high grade literary monthly, which contains articles contributed by both teachers and pupils.

Outside reading is very effectively encouraged by this school. Each pupil is required to do a certain number of credits of outside reading, which of course vari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and a book which is considered valuable but rarely read by pupils may be given a larger number of credits, while a book too popular among children may be given less credit, so that they may not read a book simply because others are reading it.

The A.A.E.C.

The above mentioned two schools are pioneers in launching out new practices of education. By the year 1919, many schools were following similar and other experiments and leading educators in the country thought that it was time to publish a paper centralizing the movement. Consequently, a monthly journal called "The New Education" made its appearance under the auspices of five important institutions in Peking, Shanghai, and Nanking. This magazine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Dr. Monlin Chiang was progressive not only in name but also in fact, and it contained articles on educational as well as on social and economic topics. This joint enterprise led to the formation in September 1921 of a new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called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New Education" monthly was transformed into a weekly in 1926 known as "The New Education Review." Until 1928, "The New Education" and "The New Education Review" voiced the general sentiment of the progressive teach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Association also held four annual conferences which were attended by thousands of progressive teachers from far and wide.

The Rural Education Movement.

Towards the end of 1928, the Association felt that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chools should be started from rural ones and found that several rural schools around Nanking were making real efforts to become community schools. One of these, located at Yen Tse Chi had been practicing "learning by doing" for some time. Through the pupils, the influence of the school had spread to the whole community. With the help of the Association, the teachers in this and other schools in the neighborhood organised together and held discussion meetings regularly. From these meetings, the need of a "new" rural normal school was felt and the famous "Dawn Village" Normal School came into existence.

This school had no definite schedule nor regular recitation. Work of the whole school centered around the following four activities: (1) actual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2) rural improvement, (3) field work and nature study, and (4) Normal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clerical work. Teachers are called "Guides," and they work and play together with pupils and observe the same regulat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items in their program is to "Make friends" with farmers. The village people at first were somewhat suspicious about the school, but after getting acquainted with it and with its members they changed their attitude entirely and came to the school frequently. The enrollment of the school increased from a few score to a few hundred and the name of the school went far and wide. Unfortunately, some students misused the freedom and the school has been suspended since 1930.

The Dalton Plan.

In the year 1921, educators in China began to take interest in the Dalton plan. By 1922, one secondary school in Shanghai had made a successful trial of the said plan and a score of other schools followed suit. Dr. Helen Parkhurst was visiting Japan at this opportune time and a lecture tour in China was immediately arranged for her. Discussions on the plan, led by her, were held in different centers an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appeared in the market. A little later, a private school founded entirely on this plan opened her doors. The founder of this school, the Yih Wen Middle School at Peking, was librarian of the AAEC, editor of "The New Education Review," and professor at the 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 This school, beginning her work in the field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as now also an elementary school and a kindergarten. Self-activity and cooperation are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observed, and some of the teachers are making great self-sacrifice, as the pay is low and equipment is scarce. However, for the past six or seven years, the school has been flourishing and gradually attracting attention from the country at large.

Teachers as parents.

A school the origin of which is almost directly opposite to that of the one just mentioned is the school for orphans of the revolutionary soldiers. This school, located on the ground next to Dr. Sun Yatsen's tomb at Nanking, was established by General Chiang Kai Shek's headquarters in 1929. A special advantage of the school is that it has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pupils' life. The pupils not only all board in the school but few of them go away during vacations. Consequently, teachers are parents at the same, and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ng their life as a whole, including feeding, clothing, and housing.

The dormitories are divided into "families" and in each family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study and live together. Since the school has extensive grounds and many students come from farms, a practical agricultural course is conducted for older boys, and a rural service center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the neighboring village people.

Liang Shu Ming and His Schools.

The leader in rural betterment movement of China is Mr. Liang Shu Ming, philosopher and educator. When he was professor at the 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 over fifteen years ago, he made a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our civilization by publishing a thesi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Occidental and Oriental civilizations, which was later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languages. After he had made this study, he began to turn his eyes on the rural problems of China. He was invited to become the principal of a rural secondary school and there he started several innovatio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e was, however, not satisfied with his work and he went back to university teaching. Before long, he took his residence in different rural districts and made several field studies. He was again invited to be the principal of another secondary school, this time in the South, and his system of "life training" was made known.

This school is a government boarding school and is located at the outskirts of Canton City.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the pupils intend to go up to the university, every student is required to do manual and farm work.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school is that everybody has to keep a diary, not only as a record of what has been done but as a record of what is thought of and what has been plan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pupils is very much emphasized and

contact of personality is considered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mere imparting of knowledge.

Mr. Liang Shu Ming is now head of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Institute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vince of Shantung where Confucius was born and is continuing his study and teaching of rural reform in China.

The Child Study Movemen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fond of children and have seldom treated them harshly. However, no scientific study was made of them until recently. When the system of modern education was officially promulgated, the kindergarten was incorporated as a part of it, and several training schools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were opened. But the training was done in a hurried way and the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s was not vitalized and there were no specialists on child stud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a new emphasis has been laid upon the kindergarten and several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egan to take interest in child study. Among them we may mention Mr. H. C. Chen, who returned to China in 1920 and became professor of child psychology at the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A group of students followed him and they soon organized an experimental kindergarten at Nanking. This kindergarten has offered opportunity not only for observation of children's own ways of doing things but also for the invention of equipment and toys suitable to Chinese children. Based upon these experiences, Professor Chen wrote two books of importance, one is called "Child Study" which consists of two thick volumes and the other, "Home Education," a scientific manual for parents.

Thousands of visitors have been received by this kindergarten and inquiries about its methods and equipment come in

everyday, with the result that Professor Chen and his colleagues thought that it was time for them to publish a magazine called "Kindergarten Education." One year later, this magazine had gained the support of such a large number of institutions that it became a joint enterprise under the title of "Child Education."

This joint enterprise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ld Education Society,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three years ago. When Mr. Carleton Washburne visited China, he was officially entertained by the Society and a special number on the Winnetka plan was put out. Two annual conferences have been held and the central theme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was "child-centered education." Activ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re also editing a series of children's readers on science and other books for children.

The Adult Education Movement.

The adult education movement in China is also a part of the new education because it embodies the same spirit. It had its origin in the days of the World War, when China joined the Allies and s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laborers to this dear old country. A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then studying in America came over to help in the social work for those masses of laborers, and I am sure some of you present have heard from Mr. James Yen's own words how the idea of the adult education movement was gradually formed into a definite shape. Those laborers were mostly illiterates and were often miserable because they could not get in touch with their homes and had no knowledge of current events, so Mr. Yen and his co-workers tried to select a working vocabulary and conducted classes in their spare time. Very soon, many of the illiterates could write to their own homes and a simple newspaper was edited, giving Chinese news and war news. The results were astonishing, and

Mr. Yen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so delighted that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continue this good work on their return to China to help her illiterate millions. Thus began the "Thousand Character Readers," the sale of which has gone up to three millions. In 1922, a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Education was formed and several centers were chosen for experimentation.

For the past four or five years, this Association has concentrated its work at Tingsien, a rural district in North China, where an effort to raise the general educational level in its widest sense is being made. Meanwhile, two training colleges for leaders in adult education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of Kiangsu and Chekiang and about one thousand mass education centers have been organized in China by government as well as by private efforts.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Five years ago, whe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at Canton, named after the founder of the Republic, Dr. Sun Yat-sen, opened 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t was thought that time was ripe to establish an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institute became a reality in the spring of 1928 and during the past four years has devoted its energy mainly on the problem of how to create a system of education fitted for China.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may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groups.

The first group of work is concerned with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difficult to teach, especially because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s had never undergone scientific study. The institute has started to cultivate this virgin land by compiling a basic vocabulary of words and a graded list of these used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by analyzing errors in dict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school children, by studying composition themes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composition in secondary and elementary schools, by investigating the reading interests and perception spans of children, and so forth.

The second group of work is concerned with adult education. We have mentioned the adult education movement. While it has gone far and wide, it needs scientific study all the more. The institute opened an experimental school for adult illiterates and is editing a series of readers on principle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Thousand Character Readers." These readers consist mainly of famous stories of romance, invention,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s but are written with the simple and most frequently used words. The sentence method is embodi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interest in reading is emphasized. Similarly, lessons in arithmetic and nature and social studies are organized after the search of what the students need most in their daily life.

The third group of work is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rural districts of China and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have been surveyed in detail, with the hope that these materials may be of use for the future reform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An elementary school attached to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nstitute. In this school, we have been experimenting on a few schemes. One of them is free expression of children in composition, manual work, and drawing. Children are encouraged to write, construct, and draw whatever they like; and teachers come in to help only when technique is needed for them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result is that what they considered dry and tedious work before they now enjoy immensely, and technique, incidently, is greatly

improved. Secondly, excursions are made a regular part of their program. Short ones are conducted every other week, while longer ones, half a dozen times a year. These excursions are for the purpose of discovering something intimately related to what they are studying in the school. The children bring along note-books, sketch books, and implements for collecting specimens, thus furnishing a large amount of materials for study and discussions. Thirdly, group meetings are also a part of the regular program, so that they may get social experience and learn how to conduct meetings and to exchange ideas. Fourthly, once in a while, the regular time table is abandoned, and teacher and pupils may agree to study some problem or to carry out some project intensively for a certain length of time.

Concluding Remarks.

China is a vast country. Although I have visited many parts of it for a number of times and have participated in nearly all of the activities mentioned, I do not claim that what I have spoken about cover all that has been done along the line of new education in China. Perhaps, there are some other institutions which should be included,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se are sufficient to show the general trends and to give the audience some idea of what is being done in China.

In room 308 of the Lycee in the Parc Imperial, some pictures of excursions conducted by our elementary school as well as free drawings done by our children in different grades are being shown. Your professional criticism will be heartily welcome. A film illustrating our school life will now be shown.

In conclusion, I wish to remark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unlike some of our neighbors, are never imitative. The Chinese culture is now undergoing a period of renaissance. Give her time, and she will create a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which will, I am sure, not only rejuvenate herself but make distinct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new world culture, for which all of you are striving and the need of which is specially felt at this time of world crisis. Let us not forget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of new education and join hand in hand to do something constructive and to fight against anything destructive, so that the world may be made a better and happier place to live in and a new culture may be created through the effort of new education. I hope I have not bored you with my poor English and I thank you all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Jahrgang 1932/1933 Viertes Heft)*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in the sense of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ies in education in any or all of its departments and in the sense of trying out new methods and ideas through objective or controlled methods of procedure, are new in China. This is not difficult to explain. In the first place, education was not conceived of, until recently, as a separate branch of learning where department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specialization of learning have reached their zenit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enerally accepted principle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like the old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its corollaries, the objectives,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instruction, called for no innovations and imposed no new demands. In fact, the success of the educative process was often measur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to which it conformed to the standards set up in the past.

But this situation was disturbed since China's early contacts with the Western world. Challenged by the vitality of the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every phase of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had to undergo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that of education. Since the institu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s early as 1862, or, especially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modern school system in 1903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1905, educ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looked upon as a separate branch of learning. New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practices, embracing educational systems, techniques, methods, contents, etc., are now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 loose

sense, the last thirty years of China's educational history may be said to have been a period — a short one, indeed — when we compare it with the uninterrupted educational system of over a thousand years standing which preceded it. In this period in China practically all forms of Western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practices have been under careful study and the Western educational system itself has been under experimentation.

We are to discuss here, howeve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experimentation of a more restricted character. These we cannot well date back to over fifteen years ag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ew Education Magazine* in 1919, the launching of the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campaign under the directorship of Dr. William A. McCall in 1922,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in 192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wey School by the Higher Normal School of Nanking in 1920,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Education in 1923, and the undertaking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Peking Higher Normal School and the Nanking Higher Normal School since 1920, etc., represent respectively the initial efforts in the 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 the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movement, the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al societies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the experimental school movement, the social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with educational emphasis, and the undertaking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

The foregoing dates carry on back to the post-war perio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and the lecture tour of Professor John Dewey in China. Indeed, they are the factors that account for the birth of those developments, though, of course, the return of many trained students of edu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t that time such as Meng Hsien Chen, Liao Shih Chen, W. T. Tao,

Chiang Mon-lin, Luk Chi-wei, Chang Peng-chun, Y. C. James Yen, and others, also account for their rapid growth. We shall analyze a little more fully how the World War, the Renaissance, and Prof. Dewey's tour influenced their development.

The World War gave rise to the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movement and also arous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illiteracy. As a result of the army test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estings in schools became very popular. At the time of national conscription, the situation of illiteracy in the belligerent nations of Europe and America became so grave that educators as well as leaders of public interest looked at the problem of literacy with great concern. It w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see, therefor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World War and the movements for testing and the liquidation of illiteracy in China. The latter movement, especially, had its origin in the Y.M.C.A. camps for the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which at once shows its connections with the World War. Again, the post-war sentiment for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gave rise to the desire on the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leaders to direct 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along progressive lines.

The Renaissance, led by Hu Shih, Chen Tu-hsiu, and others, created the urge for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of inquiry. Thus, all existing institutions, whether they are methods and contents in education, or whether they are values long established, were being questioned. Experimental schools and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became popular. It was the proper thing for educationalists and for those who desired to elevate the prestige of the educational profession and of the study of education to style education as a science. It would have pleased the educationalists most to classify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 with the sciences of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chemistry. Its advocates had no

hesitation in employing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 used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Thus, in the name of science, many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bearing a resemblance to science, popped up with little resistance.

Professor Dewey's lecture tour brought about a stronger conviction of the need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 for education through real life situations, and for new schools, experimental at first, to dep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hard and fast subject teaching. Such progressive tendencies in education, as encouraged through the efforts of his tour, have direct bearing upon the post-war sentiment for democracy and the spirit of science of the Renaissance. But such tendencies are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e naturation of educational thinking by educational testing and measurements and to the undue claims of the function of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 though they have much in common with their origin. While we may discuss them together in our present article, we do not want it to be assumed that we cherish an identical philosophy or the same aspirations.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he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movement may be said to have been inaugurated in 1922 when Professor William A. McCall of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came to China to be director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Prior to that time, as early as 1913, and especially in the year 1921, there were discussions on testing by such educational specialists as Liao Shih Chen, Chen Ho Ching, and Chang Yao Hsian, and in the Higher Normal Schools of Peking and Nanking. But the movement in its comprehensive nature and national scale must be accredited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and to Professor McCall and his able colleagues composing nothing short of the best trained minds of the educational corps of that time.

During the years 1922 and 1923, many mental and educational tests were devised, attested, and standardized. They include verbal and non-verbal intelligence tests, achievement tests for silent reading, auditory comprehension, mixed Wenli and National language, composition, formal handwriting, running handwriting, fundamentals of arithmetic, arithmetical problems, fundamentals of algebra, algebraic equations, algebraic problems, integers and decimals, Chinese geography, Chinese history, household arts, citizenship, health, etc. There were also tests for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Chinese schools such as English silent reading, vocabulary-reading, vocabulary synonyms, grammar-idioms, composition, spelling tests, etc. Many of these tests were modelled after the American equivalents. But their standard is of a very high quality. To quote the words of Dr. McCall: "The tests . . . merit, I believe, the conclusion that in every case they are equal to, and in most cases they are superior to the like tests in America."

In the lapse of two years, educational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became a fad in education and the participants of education were test-and-measurement-conscious. Such consciousness carried them to every phase of school education — the effort to discove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ages of children, to find out better methods of teaching by testing the results, to devise objective tests in place of essay-form examinations on school subjects. There was much interest revealing the correlation of achievement i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o apply tests to find out how one individual compares with another, one group with another, one sex with another, one class with another, one school with another. Mathematics, inasmuch as it is fundamental in

tests and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was no longer monopolized by the students of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It became the favored subject for students of education. 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r a student there would feel its or his status elevated if subjects which showed a scientific bias in educat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course of study.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considered non-progressive in education when they failed to produce a close contact with the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movement.

Of the many types of tests that were made, the intelligence, language, and arithmetic tests were more numerous. In the educational discussions as presented in the educational periodicals, those three subjects were the most frequent, although general discussions on the value,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 of tests and measurement register even a greater number.

The movement has left behind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But the degree of its activity has never been equal to that of the first two years of its history. In the educational periodicals from 1925 to 1927, we notice a radical decrease of interest in that subject. In the years 1928—1930, however, there was a revival of the movement, but its activity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1922—1924.

It should be noted here that in 1928, there was a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project of provincial scale started in Kiangsi. In February of that year,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that province established a Bureau for the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of Children's Intelligence to undertake the work. For two years the Bureau carried on the program an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in various districts took the tests. Reports of their findings have been published from time to time. As a result of the work, teachers began to be aware of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hich they had overlooked and prevail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subjective judg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individual

children and what the objective tests seem to show. Special classes were proposed in the larger centers for the benefit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Indirectly, the program stimulated the participants of education new interest in their profession.

In many progressive centers, particularly in the municipalities of Nanking and Shanghai,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or of achievements of school-children have been quite popular in the last few years. Experimental schools established by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of cities or districts or affiliated to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are almost always subject to constant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To some educationalists, the solution of many educational problems depend upon the employment of tests. Some even look upon it as indispens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centered" education.

Experimental School and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common for bureaus of education with progressive tendencies and for universities or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with affiliated sub-collegiate schools to designate one or more of their school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lower levels, for experimental purposes. These experimental schools often conduct experiments to discover the relative merits of rivaled or contrasting methods of teaching. Experiments on the Dalton Plan, socialized curriculum, project method, socially-useful labor plan, labor-activity curriculum, classification of students according to intelligence groupings, etc., have been tried out and copied in various places.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experiments reveals the fact, however, that most of them deal with the details of method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such a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writing Chinese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between practice in silent reading and supervised reading, between free-hand drawing and copying of drawings,

between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methods in the teaching of arithmetic, etc. It should be further noted that most of these experiments center around the improvements of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reading, composition and handwriting. Arithmetic also is a favored subject of these experiments. For example, of the 44 more significant experiments reported by a writer on the subject, 34 were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6 on arithmetic, and 4 on other miscellaneous topics.

But far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se classroom experiments are the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with a strong social purpose. These we may call social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or educational social experiments, dependent on whether one looks at them from the social or from the educational standpoint. We refer particularly to the Mass Educational Movement, its campaign for the liquidation of illiteracy and its experiments at Ting-Hsien, to the Hsiao Chuang (Dawning Village) Normal School experiment, to the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stitute at Show-Ping, Shangtung, to the rural educational program of the Wu-Sih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to the very recent attempt for Hsien (district or country) governmental reconstruction at Pin-Yang, Kwangsi. The socialization and vit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to the actual tackling of the problems of life and of society as characterized by these experiments in China in the name of education is perhaps truly significant and thus worthy of careful attention in the present day world.

The first to be named is the movement for literac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James Y. C. Yen. The origin of the movement dates back to the days of the World War when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laborers were sent to France. Realizing the misery of these illiterate laborers who could neither read the news of the surrounding world nor communicate with their homes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Mr. Yen and his associates, who worked among them as Y. M. C. A. secretaries, selected a working vocabulary and conducted classes to teach them to read and write. Readers were appointed and newspapers were edited, using these thousand selected words. Many who were formerly illiterate learned to read and write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strangely enough, in a foreign land.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 and upon the return of Mr. Yen to China, he led the movement which was at first known as the Movement for Literacy among the Masses. In 1923,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Education was organized. Such a movement belongs primarily to a discussion on adult education or mass education. It interests us in our present discussion on educational experimentation, however, because it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means of experimentation, and, furthermore, because it is mother of the great experiment at Ting Hsien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by means of education. In selecting the one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 most frequently used, which were slightly increased later,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employed through a careful analysis of popular literature, including newspapers, story books-letters, bills, etc. While the movement for literary was in progress, the leaders of the movement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merely tackling the problem of literacy, although, of 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much useful knowledge of civics, history, geography, personal and public hygien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s well as much concomitant learning of great educational value were acquired. Out of this dissatisfaction, the Association directed its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hole life and concentrated its efforts to the problems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1930, Ting Hsien, a rural district with an area of 480 square miles and a population of 297, 000 in the Province of Hopei, was selected to carry on an experiment on a large scale.

The experiment is now employing some two hundred persons, many of whom have had university training. It has been largely subsidized by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an organization in charg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turned por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ts annual budget for the past year 1931—1932 was Mex. \$ 360,000, some 60% of which was appropriated by the China Foundation. Its program includes the liquidation of illiteracy,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e, the training to citizenship, the improvement of health conditions,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ervice, the cultivation of art education, and the promulgation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The work has now gone on for seven years with considerable success both in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n the general enlightenment of the people. The work is still in its experimental stage, as it cannot yet be operated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either from the financial standpoint or otherwise. The experiment has not only arous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among those who are anxious for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but has also attained some valuable findings which are suggestive to other undertakings of similar nature.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Province of Shangtung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Liang Shu Ming is worth our attention. The Institute was established in 1931. It selects graduates from secondary and technical schools to be trained first in the Institute and later to be sent to various districts to conduct the rural schools, training classes for rural school teachers, to carry on th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al station work, to take the census, to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 of co-operatives, etc. It aims at conserving and furthering the ideals of the rur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as a check on the possible incoming evils of over-industrialization and over-urbanization.

An other important experiment was the Hsiao Chuang (Dawning Village) Normal School in the Province of Kiangsu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in 1928, under the enthusiastic leadership of W. T. Tao. The school had no definite schedule nor regular recitation. The work of the whole school centered around the following four activities: (1) actual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2) rural improvement, (3) field work and nature study, and (4) normal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clerical work. Teachers are called 'guides' and they work and play together with pupils and observe the same regulat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items in their program is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farmers. The village people were at first somewhat suspicious of the school, but after getting acquainted with it and with its members they changed their attitude entirely and came to the school frequently. The enrolment of the school increased from a few scores to a hundred and the fame of the school went far and wide. Unfortunately, some students abused their freedom and the school has been suspended since 1930. Its existence has left deep impressions on the mind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public which remains worthy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 for later experiments.

In February of this year, an experiment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combining the merits of the social reconstructional program of Ting Hsien and the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Shangtung experiment was inaugurated in Pin Yang Hsien, an interior district of the Kwangsi Province. This experiment is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 dec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t Nanking, to establish one or more political experimental districts in each province for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Pin-Yang, the experiment was entrusted to Mr. Tang Mou-Ru, a graduate of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who for a

number of years had been very active in the Ting Hsien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It is planned to recruit experts and specialists of the various fields and to resort to all educational measures and other means, to improve the life of the people in all its aspects, which includ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Hsien Government, farm relief work at this time of rural bankruptcy through the prevention of animal diseases,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 supply and agricultural implements, the encouragement of forestry,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of farm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farm manufacturing and light industr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armers' loans, etc. It includes also the progra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ability for self-government and for cooperation in road building and in other forms of public works. Parallel with this program of reconstruction which already involves a highly educative process, is the program to train leaders and workers for the actual 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movement from that experimental district to the whole of the province. It is unfortunate that reports of late seem to indicate that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may have to be temporarily suspended. But such a courageous and comprehensive attempt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o find a solution for tackling China's rural problem is bound to bear fruit in this district or elsewhere.

One might continue to describe the work of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the Wu-Sih Provincial Teachers College of Kiangsu, of the experimental district at Hsu Kung Chao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r of the Tsing Ho Experimental District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Yen Ching University, etc. But the above illustrations will suffice to show the nature and object of the large scale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experiments that are going on in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these experiments

will show that they have these points in common: firstly, they are, in object and in approach, educational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word; secondly, they are experimental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in the process of search for techniques and principl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rather than to impose a preconceived program, or to carry out the details of a social plan; and thirdly, happily and significantly enough, they all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rural people which constitutes at least 80% of China's population.

A discussion on educational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presenting also the Government's attempt to experiment on the University Region Plan as a possible unit for a proposed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is University Region Plan was part of the schem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Plan, both of which, however, were only short-lived. The object of the plan was to pu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hand of professional educators, in order to give educational work a distinct scholastic accent, both by drawing it away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and by incorporating in with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 October 1927, a University Council (Ta Hsieh Yuan) was created in place of the usu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ake charge of all educational affairs relating to education, science, and art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Under the University Council, the University Regions were to take place of the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 of the respective provinces. As a new proposal, it was decided to put them on an experimental basis. Thus they were introduced first into the provinces of Kiangsu and Chekiang, and later also into the Province of Hopei, for purposes of experimentation. (These provinces include an area of about 140, 031 square miles and a population of about 83, 172, 188.) In each of these provinces, the provincial educational departments were abolished

and with their former duties transferred to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was not only the head of the local University, but also the chief executor of all educational affairs within the region, including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all other educational functions previously performed by the Provincial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included: a legislative committee, a research institute, a department on higher education controlling the various colleg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al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he province, a department on general education controlling the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province, a department of extension in education controlling social education; and a secretariat assist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The plan was that, as a professional educat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was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administrate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the province, more liable to appoint men with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assume educational posts, more inclined to associate educational work with scholarship and learning, and more likely to correlate education with research. But this University Council Plan was soon changed back to the form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cause of various oppositions. A few months later, the University Region Plan in those three provinces which experimented with it was also abandoned. Although this experiment has become an historical event, it, nevertheless, has left the landmarks of a great experiment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which attempted to dissociate education with political changes and to associate it more closely with learning and research.

Educ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

We have heretofore presented from time to time in connection with educational testings and experimentation, some phase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n. We shall discuss now more in detail the major phase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China, in order to have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field under consideration. It would be quite difficult to exclude that phase of work which one may call educational studies. We shall discuss them together.

There are m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some kind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uch as the schools of higher learning, the educational societies, the governmental educational organs, the organizations conducting educational social experiments, and an institute with the sole func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normal schools, colleges of education, or educational departments of the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research is often conduc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eaching of education by the professors of education themselves, and frequentl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ir advanced students. In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the Central National University at Nanking, the chair endowed by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now occupied by Prof. Ai Wei, who has published a series of reports 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is type of educational work which is going on in various institutions of the profession. It is required of the college graduates in many universities to present for graduation a thesis producing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s in China, the more noted are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Education,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was founded in 1921. Although it has ceased to function recently, it has mad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China. Besides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testing movement which we have related, they published a series of bulletins on various phases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conducted a careful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ituation which still remains to be a very useful and reliable documen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Education has conducted many items of research 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literacy movement and for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reconstructional program as being tried out at Ting Hsien. Inasmuch as they have a very large annual budget to do the work, they are able to assemble many specialists to study and to try out the best methods and the most effective forms of organization for adult education. At Ting Hsien, they have a special research department to look after this aspect of their work. As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 research divis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ever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917. From its research work, we may mention the following: more than fifty kinds of vocations have been surveyed, vocational tests for clerical service have been constructed and a test for aptitudes and interests is being under construction. And very recently, in January of this year, the Chines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was organized for the promotion and study of education. It has branch association in the large centers in China and recruits the educational scholars of the whole country. It aims at investigating educational problems, collecting educational data to survey educational conditions, promoting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offering educational policies, quickening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al literature. There is much hope for the future of the Association,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ause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est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will be greatly advanced.

In recent years, some provincial educational departments and municipal educational bureaus of progressive tendencies undertake research work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ve process in the area of their jurisdiction. The more noted ones are the provincial educational departments of Kiangsi and Shangtung and the Educational Bureaus of the Municipalities of Nanking and Shanghai. As to the research work carried 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ducational social experiments at Pin-Yang and at Chow Ping, which we have already presented in a previous section, we shall refrain from repeating.

A humble beginning of organizing an institut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has been attempted by one of the writers since 1928.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Nation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at Canton, has been trying to conduct researches in education of a scientific character and to assemble a collection of educational literature which is the pre-requisite of all educational research. Of the research work which the Institute has conducted, the most noted are the studi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the studies for the discovery of better methods and contents for adult education, and studies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and other studies, it publish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 monthly journal now issuing its 44th number, and the series of research monographs now being issued in its 20th volume. As to the educational data assembled, two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made, namely, the edi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Index to Chinese Educational Periodicals" in eight volumes and the building of a librar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with about 34,000 volumes in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containing important educational books, magazines, reference books, documents, research bulletins, school

textbooks, etc. It may be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Institute has already attracted student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who come to do research work on Chinese education.

The good beginnings of several other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by various individuals and educational corps should be mentioned her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blications and facilitie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Educational Review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Chung Hua Educational Review of the Chung Hua Book Company publish from time to time reports and discussion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field of knowledge in education. The Reference Book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by Shu Hsin Cheng and the Cyclopaedias of Education both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Chung Hua Book Company have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cilities for research. The educational librar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also making efforts to build up a good collection there.

An Appraisal.

We have presented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where the old system of education is inadequate and where the new system of education is in the making, there seems to be hardly any phase of education more important than experimentation and research. Such a need is, fortunately enough, accompanied by the new spirit of science and of inquiry for better ways and means of work and for greater certainties. Out of this need and this spirit welled the movement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It is only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at one may properly appraise the work which has been going on. To look at it as simply a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imitation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fash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this age is to mis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problem.

There are, no doubt,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work of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in the movement for experimental schools and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and in the kind of educational work, that have been going on in China. Many of them may fall far below the rigid standar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and of sound scholarship. Not infrequently, they are crude, meager, and superficial. But on the whole, the entire movement is very favorable to China'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looking over the work as presented, one may be quite satisfied with its past and hopeful of its future. In closing this discussion we shall notice a few high points which seem to stand out in the course of our presentation and which seem well worth of our special attention.

Ad 1: it may be properly said that for the work of testing, measurement, experimentation, and research, good foundations have been laid for their development.

Ad 2: inasmuch as educational testing has once deeply impressed the educational public and that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have been mastered by them, there is a great asset, which, in time, will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s it is now reinstated for the selection of candidates to hold public offices.

Ad 3: the measurement movement, as a means of discovering the norms and setting national standards has not been a success. But it will probably be useful as a means for comparing achievements of various localities for the stimulation of work in retarded areas.

Ad 4: the existing school system in China, including its social theory and system of values as derived from the Western pattern, does not seem to fit in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China. It is, therefore, increasingly a center of complaint. The experimental schools of various kinds, if properly encouraged and directed, will probably develop proper types which will answer China's problems and needs.

Ad 5: it gives special pleasure to note that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of a scope larger than the school have been attempted in many quarters of the country to tackl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life as a whole. Such experiments, though derived in their philosophy from the Western capitalistic world, are socialistic versus individualistic inclined, and are more daring, more vital, and more direct than their Western precedents. Their rural emphasis is another good sign.

Ad 6: education, through the efforts of its devotees in educ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 has become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branch of learning, and probably will, in time, be elevated to a place of increasing dignity in the academic world equal to the social challenge to teachers and educators and to the dignity of the cause of the profession.

LA RÉFORME D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EN CHINE

(Manuel Général D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Dans ces derniers trente ans, la Chine a renouvelé son instruction publique. Adoptant la forme occidentale d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elle l'a adaptée au caractère propre du peuple et à la vie nationale. Guidée par l'expérience, elle a, plusieurs fois, modifié les méthodes et les matières de l'enseignement, comme l'organisation scolaire. Les réformes sont continuelles, mais elles s'effectuent toujours dans un sens plus national et plus moderne.

La Chine a adopté le système de l' *Ecole unique*. Tous les enfants doivent fréquenter l'école primaire qui est la base réelle de tout l'édifice.

La forme et la durée des études ont été déjà changées plusieurs fois:

Au début de 1903, l'école primaire est divisée en deux sections: école primaire élémentaire (5 ans); école primaire supérieure (4 ans). La durée totale des études est de 9 ans.

En 1907, la durée des études est réduite d'un an: école primaire élémentaire (4 ans); école primaire supérieure (4 ans).

En 1912, nouvelle réduction d'un an: école primaire élémentaire (4 ans); supérieure (3 ans).

Enfin, depuis 1923, l'école primaire se divise en école primaire inférieure (4 ans) et école primaire supérieure (2 ans). Les enfants fréquentent la première de 6 à 9 ans; la seconde de 9 à 11 ans.

De plus, en 1932, le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a prescrit à toutes les provinces d'établir une "Ecole obligatoire de deux ans" pour les enfants au-dessus de 11 ans, non instruits antérieurement.

Pourquoi ces réductions successives? Elles sont dues à des motifs d'ord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et aussi à la conviction, partagée par tous les éducateurs chinois, que vulgariser et nationaliser l'enseignement sont la tâche la plus urgente et qu'il vaut mieux fréquenter l'école pendant une courte durée que de n'y pas venir du tout.

Les progrès de la fréquentation ont été rapides:

Années.	Elèves.	Années.	Elèves.
1902-1903	6.000	1915-1916	4.122.878
1907-1908	895.471	1922-1923	6.601.802
1909-1910	1.481.389	1929-1930	8.839.434

Ainsi, de 1915-1916 à 1929-1930, c'est-à-dire en 14 ans, la population scolaire a plus que doublé. Aussi envisage-t-on la possibilité d'établir, dans une dizaine d'années, un programme de fréquentation scolaire obligatoire de 4 années.

Les programmes et les méthodes ont, eux aussi, été l'objet de plusieurs réformes. Avant ce siècle, toutes les écoles primaires étaient des écoles privées. L'organisation en était mauvaise et les études limitées aux livres classiques anciens et à l'écriture chinoise.

En 1903, les programmes comportent en outre: l'histoire, la géographie et l'histoire naturelle; le travail manuel et le dessin y figurent, mais comme matières facultatives. En 1907, nouvelle réforme: la musique est introduite comme cours libre; mais l'histoire, la géographie et l'histoire naturelle sont supprimées à l'école primaire élémentaire.

Lorsque la République Chinoise est constituée en 1912, le nouveau 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substitu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ux anciens classiques et range parmi les matières obligatoires le travail manuel, le dessin et la musique.

En 1923, un nouveau programme substitue: 1° la langue chinoise vivante à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ncienne; 2° l'instruction

civique et l'hygiène à la morale individuelle; 3° l'art au travail manuel; 4° l'histoire naturelle et la science sociale figurent à l'école primaire inférieure.

En 1929, le gouvernement national établit sa capitale à Nanking. Le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fait paraître un *programme d'Ecole primaire National* qui, en 1932, est officiellement promulgué.

Matières.	Classes		
	I et II	III et IV	V et VI
Instruction civique.....	1 h.	1 h.	1 h.
Hygiène.....	1 h.	1 h.	1 h.
Education physique.....	2 h. 30	2 h. 30	3 h.
Langue chinoise.....	6 h. 30	6 h. 30	6 h. 30
Science sociale.....	1 h. 30	2 h.	3 h.
Histoire naturelle.....	1 h. 30	2 h.	2 h. 30
Arithmétique.....	1 h.-2 h. 30	3 h.-4 h.	2 h. 30
Travail manuel.....	1 h. 30	2 h.	2 h. 30
Beaux-Arts.....	1 h. 30	1 h. 30	1 h. 30
Musique.....	1 h. 30	1 h. 30	1 h. 30
Nombre d'heures par semaine	19 h.30-21 h.	23 h.-24 h.	25 h.

Les horaires sont appliqués avec une très grande souplesse. Ils sont simplifiés suivant les nécessités financières et la capacité des instituteurs. Ainsi, dans les écoles primaires inférieures, on réunit en un seul cours, dit *Connaissances communes*, la science sociale, l'histoire naturelle et l'hygiène. De même, l'art et le travail manuel peuvent être réunis en un cours de *Travail*. De plus, il est permis aux instituteurs d'adapter les horaires aux besoins propres de leurs élèves. Cette souplesse est nécessaire dans un pays immense, où les aspects de la culture et les conditions économiques sont très différents d'une province à l'autre.

Les méthodes ont varié profondément. D'abord, le plus souvent, l'instituteur se contentait de parler sans interroger; les élèves n'avaient qu'à recueillir son enseignement.

En 1912, Herbart fut le grand éducateur de la Chine, comme il l'était du Japon. Puis, les méthodes actives se développèrent. L'enfant étudiait par lui-même, l'instituteur n'intervenant qu'en cas de difficultés. Mais on reconnut que cette méthode laissait des lacunes dans les matières étudiées. Autour de *centres d'intérêt*, par exemple la langue chinoise, on groupe toutes les autres matières, de façon à mettre entre elles l'unité et la vie.

En 1920, le professeur américain Dewey vint en Chine. On se passionna pour ses idées comme pour les méthodes actives qui en sont issues: le *Plan Dalton*, le système de *Winnelka*, le *Project Method*. On expérimenta aussi la méthode Decroly.

La méthode d'éducation morale fut également modifiée. Au lieu de laisser les instituteurs diriger leurs élèves comme ils l'entendaient, on leur prescrivit de développer chez eux le sentiment de la nécessité d'une action morale, le sens de leur responsabilité, du *self government*. C'est pourquoi on a supprimé, non seulement les punitions corporelles, mais toutes les punitions et toutes les récompenses, condamnées comme étant des stimulants artificiels.

Si bref qu'il soit, cet exposé suffit à montrer dans quel sens se développe, en Chin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La Chine s'efforce constamment d'établir un système d'éducation nationale, qui réponde aux nécessités actuelles.

RECENT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12th Educational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1936. T. C. Columbia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A dozen of eventful years have rolled by since the article on China appeared in the Educational Yearbook of 1924. Within this period, divided China, after hard struggles, has become united.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period was in a most chaotic condition, when the Peking government failed to command even the respect of northern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and the Canto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by Dr. Sun Yatsen in 1923 was not powerful enough to control all of the southern provinces. The year 1927 saw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tide, when the Nanking government became a reality, though not without stubborn oppositions.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or the Nationalist Party, which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nking government, took place in 1923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Soviet organization, though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lectured by Dr. Sun¹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ommunists. However, the friendship of the Soviet Republic was sought, since she denounced imperialistic aggression, and Russian advisers were employed i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But they were expelled as soon a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y were missioned by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to spread communism. Some of their ardent followers with handful soldiers left the party and began to attack the government forces. At first, the Nanking government was too

¹ Cf. Sun Yatse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ranslated by F. W. Price,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busy in their work of unification of China to take them serious enough. Unfortunately, they grew in strength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ir influence spread in many parts of central China. The government forces were then directed by General Chiang Kai-shek to fight them from all sides. After four years of hard fighting their sphere of influence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Suddenly in September 1931 fresh trouble broke out in the northea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followed by the formation of a puppet empire took China and the whole world by surprise. In spite of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ention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strong protests from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Japan not only refused to retrace steps, but threatened to attack Nanking directly. An undeclared war took place in Shanghai and its vicinity before the very eyes of many foreign nationals in the Settlements early in 1932. It is needless to repeat what great damage the Japanese invasion did to China.

Such has bee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faced by the present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behind it, yet China is determined to make progress in the midst of troubles and handicaps. Ever si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gan to function at Nanking, constructive work has been under way. Along with hi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Dr. Sun laid out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A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mmission was established as a par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now called the Academia Sinica, was also founded, and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came into existence in 1931, not mentioning the Ministry of Health, which began to render nation-wide service in 1929 and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ince 1931. Some of the important constructive works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n 1923, China had less than 7,000 km. of railways, but by 1934 the total length was over 18,000 km. Important

lines recently constructed are: (1) the Lunghai Railway, the longest west-east line north of Yangtze commencing from the coast, where a new Chinese port situated between Shanghai and Tsingtao has been opened to traffic, and ending now at Shensi not far from the borderline of Mongolia and the Eastern Turkestan; (2) the Canton-Hankow Railway connecting the Hankow-Peiping (Peking) Railway, the longest north-south line, to be completed in 1936; and (3) the Hangchow-Nanchang Railway, the longest west-east line south of Yangtze. The opening of highways is being busily undertaken by the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latest statistics (end of 1934) shew that 92,555 km. are completed with 50,023 motor vehicles in service, while 13,819 km. are under construction and 44,291 km. mapped out. The wireless telegraph stations under Chinese management has grown from one to eighty-five. Two powerful stations near Shanghai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San Francisco, London, Berlin, Paris, Geneva, Moscow, and other places. Radiophone service is being tested out between Shanghai and European capitals. Economic, geological,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surveys are being made in many of the provinces. Some of them have been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mmission, the Ministry of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and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Geological Survey Offices. As China is a vast country, almost a continent by herself, progress is necessarily slow. But since the country is united, the road to progress is opened and the foundation for reconstruction is laid. If there is no outside aggression and interruption, we believe, a new China, strong and modern, will be born in due time.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

National authority—Wh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Nanking in 1927,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was, after the French fashion over a century ago, called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Republic, which was no ordinary seat of learning but purely an administrative body. The only difference from the Ministry before and after was that a Department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was added. At the same time, three university districts, similar to French Academie, the heads of which were at the same time presidents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commissioners of education, were installed for experimentation. However, the central authority was changed back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fter one year, although the university district system was continued for one more year. The pres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ten ministries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t has a minister, two vice-ministers, four councilors, five directors, six secretaries, six national inspectors, etc. The five directors are in charge of the following divisions: General Affairs, Higher Educatio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and Mogolian and Tibetan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there are committees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education of oversea Chinese, curricula, mass education, compulsory education, health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medic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etc. Important offices attached to the Ministry ar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National Service Bureau for Intellectual and Technical Employment, and the Office for Assistance of Students of the Lost Provinces.

National Educational Finance—The funds spent by the Ministry and schools under its auspices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ere around seven million Chinese dollars per year. Since 1928, such funds have been doubled. Budgets from 1929 to 1935 are as follows:—

1929-30	\$ 14,449,985
1930-31	\$ 14,721,800
1931-32	\$ 16,704,279
1932-33	\$ 19,036,470
1933-34	\$ 16,549,464
1934-35	\$ 17,658,233

Among these seventeen millions, a major portion i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university level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During the current year grants-in-aid to provinces and special municipalities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amount to an additional fund of three million dollars,¹ while those to private higher institutions, not quite another million. Authoritie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ther tha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pend also large amounts of funds for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purposes, being \$22,737,588 in the year 1931-32.

Other organizations financing schools on a nation-wide basis are different foundations managing the returned indemnity funds.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was organized in 1924 to receive, deposit, invest, and apply a portion of the funds retur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² At its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in June 1925, a resolution was passed to the effect that the funds "should be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o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knowledge to conditions in China,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technical train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rimen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and training in science teaching, and to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of a permanent character, such as libraries and the like." The accounts of the Foundation in 1933 show that over a million Chinese dollars were spent, among which

¹ See section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² See Educational Yearbook, 1924 p.96 and annual reports of the Foundation.

about one-fourth was defrayed for the Peiping National Library, another fourth for scien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fessorships, fellowships and scholarships, a third fourth for subsidies to different institu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balance for miscellaneous purpose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December 1922, notified China that it had decided, in principle, to devote its remaining share of the Boxer Indemnity to purposes mutually beneficial to both countries, but no action was taken until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in 1930 and a board of trustees of ten Chinese and five British members was duly constituted in 1931. The whole of the accumulated funds on deposit together with half of all future instalments shall be regarded as loans bearing interest and eventual amortization from the Boar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purchase of materials required for railways or other productive enterprises, while the other half of all future instalments shall be paid direct to the Board for investments in China. The interests thus derived are to be applied to educational purposes. Beginning from 1933, about one million dollars a year are spent for (1)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Museum and that of the Central Library at Nanking, (2) sending of Chinese students abroad and subsidies to British students coming to China, (3) subsidies to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4) rewards to best textbooks and scholarly writings of special value, and (5) subsidies to vocational and rural schools. One of the first students from England was Miss Eleanor Darroch, who did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teacher-train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writer.

An agreement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Belgian share of the Boxer Indemnity was signed in 1925, and among the unpaid fund three-fourths are to be devoted for railway construction, while the balance for cultural and philanthropic purposes.

The French Indemnity agreement, after long dispute, was settled in 1925, and the fund is used largely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 while the rest is devoted for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urposes, namely, subsidies to universities and auxiliary schools in China and the Sino-French University Quarters in Lyon, subsidies to researches and professorships in Chinese institutions, sending of students to France, and miscellaneous expenses.

Provinci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re twenty-eight provinces, two territories and five special municipalities (Shanghai, Nanking, Peiping, Teintsin, and Tsingta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two territories is looked after by the Division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Education of the Ministry. In each province and special municipality, there is 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 commissioner or director, assisted by three or four division heads and four to six inspectors, has the general charge of educational affairs of a province or special municipality. Under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re counties and ordinary municipalities. In each of the 1940 counties and eleven municipalities, there is a bureau of education with a director, who is appointed by the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ccording to a questionnaire survey¹ made by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of th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1932-33, county population in 230 counties of five provinces varies from 10,000 to 1,300,000. If population is taken as a basis, we may call those counties with more than 1,000,000 people "large" counties, those with from 100,000 to 1,000,000, "middle-sized," while those with less than 100,000, "small". Naturally, we find the bureaus of education in

¹ A Study of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District Bureaux of Education, Monograph No. 25,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Canton, 1934.

“large” counties comprehensive organizations with three division heads, two or three inspectors and supervisors; those in the “middle-sized ones have simpler organizations with two, or sometimes one, division heads and one inspector; while those in “small” counties, the director is assisted by one or two assistants only.

Each county is subdivided into several school districts, each of which has an educational officer, sometimes with an assistant.

In two or three provinces, a system of supervision is put into practice. For instance, in the province of Chekiang, supervis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is in the hands of specially appointed supervisors in central and special primary schools. The whole province is divided into six supervision areas, in each of which a provincial normal school is located and one of the teachers in the primary school conducted by it is allowed very little teaching load and appointed by the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s supervisor of all central primary schools in the area. These central schools are ordinary primary schools, but centrally located and best managed, and one teacher in each of them is similarly appointed as supervisor of all other primary schools within certain distances.

Provincial and local finance—The expenditures for education in provinces and special municipalities vary from around 14,000,000 to 43,000 Chinese dollars per year, totalling around \$147,000,000.¹ Most of them spend from one to five million dollars per year. A few provinces have educational fiscal independence, while others are striving for such arrangement. The independent income is usually the salt sur-tax; some have

¹ R. Y. S. Cheng, *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ducation in China*, pp58 ff.,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1935.

rice tax, others have tobacco tax, while still others have butchery taxes. The main item of expenditure for education in provinces and special municipalities is that for schools of secondary level, including normal and vocational schools.

Local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in counties and ordinary municipalities also vary greatly.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ntioned above, over half of the 230 counties spend from \$10,000 to \$50,000 a year each, with \$20,000 as the median, while maximum reaches \$800,000. The chief source of income is from local rates, and the main item of expenditure is for maintenance of primary schools.

Total cost of education in China—The total cost of education in China is very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following table is taken from Dr. R. Y. S. Cheng's new book, "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ducation in China," but it does not include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of Ministries other tha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local school districts, and of old-style tutor schools to be noted later.¹

Current cost of education in Chinese dollars according to school organizations, 1930-1931

Type of Education	Cost of Public Schools	Per Cent	Cost of Private Schools	Per Cent	Total Cost: 100%	Per Cent for each Type of Ed.
Kindergarten					468,329	
Lower primary					57,580,494	
Higher primary					28,331,750	
Others					447,812	
Total, elementary	70,639,412	79.0	18,777,565	21.0	89,416,977	48.1
Middle schoi					20,540,210	
Junior middle					14,791,711	
Normal school					8,419,140	
Vocational school					4,961,996	

¹ See Section on elementary school statistics.

Total, secondary	31,251,653	64.2	17,461,404	35.8	48,713,057	26.2
University					31,582,507	
Prof. school					1,936,730	
Total, higher	19,528,576	58.1	14,090,661	41.9	33,619,237	18.1
Students abroad	2,600,000	6.0	7,328,000	74.0	9,928,000	
Total, including students abroad	22,128,576		21,418,661		43,547,237	
Social education	6,653,674	47.4	7,374,817	52.6	14,028,491	
Grand Total	130,673,315	66.9	64,932,447	33.1	195,705,762	100
Grand Total, excluding students abroad	128,073,315	69.0	57,604,447	31.0	185,777,762	100
Grand Total,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101,891,065	64.5	36,238,969	35.5	138,130,034	7.6

If administrative and other expenses of public education were included, the total cost of the entire public school system for 1930-31 would amount to \$155,042,788, while if the grants-in-aid by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private schools of \$2,097,624 were subtracted, the total cost of private schools would be \$62,834,823. Thus, the total amount spent for education in China for 1930-31 corrected was \$217,877,611, among which 28.84% came from private sources and 71.16% from public sources. The latter was shared by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county authorities as 10.4% 26.96% and 62.63% respectively.¹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s—Two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s have been call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e in 1928 and another in 1930. In the First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many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education were threshed out, including educational aims, educational finance,

¹ R. Y. S. Cheng, *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ducation in China*, pp 46 ff.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guidance of the students' movement, training of teachers, adult edu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Second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comprehensive plans for universal primary and adult education, with schemes for training of additional teachers, improvement of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raising of educational funds were mapped out. Both were attended by about one hundred delegate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special municipalities and experts invited by the Ministry. Exchange of views helpe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ed mutual bond. Such informal results are probably more far reaching than resolutions formally passed.

The school 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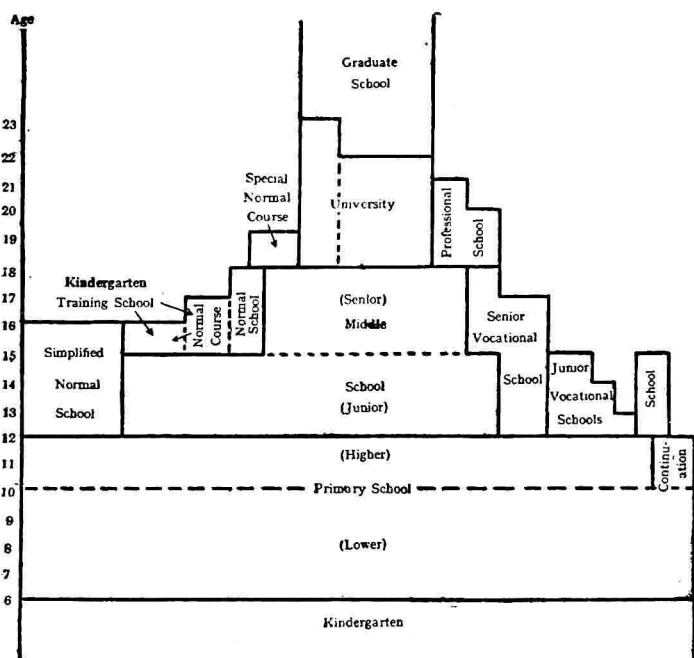
Educational aims—After the First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which formulated that the aims of education should be in accord with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promulgated in April 1929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Base upo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ll aim to enrich the life of the people, to foster the existence of society, to extend the means of livelihood, and to maintain the continuity of the race, to the end that national independence may be attained, exercise of political rights may be made, universal conditions of livelihood may be developed, and, in so doing, the cause of world peace and brotherhood may be advanced.”

The present system diagramed—The school system first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similar to that adopted in 1922.¹ But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chool Laws by

¹ Educational Yearbook, 1924, p. 111.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he several school regulations by the Ministry in 1932 and after, there have been considerable changes not only in details but also in its general outline. The system at work may be graphically represented as follows:



Preschool Education

Kindergarten—Kindergartens admit children under six years of age and most of them are under county management, while experiemental schools as well as primary schools conducted by provincial normal schools and national universities usually have kindergartens attached to them. There are also kindergartens run by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foreign missions. But the total number of kindergartens in the country as a whole is small.

The latest statistics of 1932-33 show that there were 936 kindergartens, taking 43,072 children and employing 2,056 teachers. The curriculum of the kindergarten promulgated by the Ministry in October 1932 consists of (1) music, (2) stories and songs, (3) games, (4) social and nature studies, (5) manual work, (6) rest, and (7) feeding. Children are to spend three to six hours daily in the kindergarten.

Nursery school—The nursery school idea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only recently. There are a few such schools in big cities.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at Hangchow has perhaps one of the best nursery schools in the country. It is used as an observation school for the university courses in child guidance and child psychology, though during its two years of life, enrollment has grown steadily. Another well-known nursery school is run by a foreign mission in Huchow, Chekiang, where a school for mothercraft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a long time. No nationwide statistics are available for this type of schools.

Elementary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The elementary school is divided into the lower and higher primary divisions. The former consists of four years and the latter of two years. They may be established separately. The standard curriculum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as promulgated on October 20, 1932, is as follows:

Subjects	Lower grades		Intermediate grades		Higher grades	
	1st year	2nd year	3rd year	4th year	5th year	6th year
	<i>(minutes per week)</i>					
Civic training	60		60		60	
Hygiene	60		60		60	
Physical education	150		150		180	
National language	390		390		390	
Social study	90		120		180	

Nature study	90			120		150
Arithmetic	60	150	180		240	210
Manual work	90			120		150
Art	90			90		90
Music	90			90		90
Total	1170	1260	1380		1440	1560

In order to adjust to local needs, social and nature studies and hygiene may be combined in first four years, and manual work and art may be combined in the lower grades. The nature of manual work may b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or related to home economics. The total time per week may be increased or reduced ninety minutes. Each period is normally thirty minutes but may be prolonged to forty-five or sixty minutes in certain courses. In addition to the total time spent for class-work, the following numbers of minutes may be spent for Monday memorial service,¹ weekly meeting, games and oth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ower grades, 180; intermediate grades, 270; and higher grades, 360.

Compulsory education—In 1930, before the Second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convened, a special commission drafted a national educational schem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ference, which included 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enforce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is plan, as revised by the Conference, education for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elementary grades would be made universal in twenty years' period. But it would cost several billion dollars. To bring the problem within some degree of feasibility, something less ambitious and more practical was needed. It was with this end in view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in 1932 a new scheme, in which the length of compulsory elementary education was

¹ In every institution in China now, there is a memorial service to Dr. Sun Yatsen held each Monday Morning, when his will is read and the party song is sung, in addition to announcements and speeches.

reduced to one year but the age of admission was raised to ten. The scheme was to be tried in at least one town or village in each county from 1932 to 1935. It was approved by the Kuomintang Party in the spring of 1935, and since August 1935 it has been definitely enforced as a mean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One year education will be universal from 1935 to 1940, then the length will be increased to two, and, eventually four years. The curriculum for the one year course is as follows:

<i>Subjects</i>	<i>Periods per week</i>	<i>Minutes per period</i>	<i>Minutes per week</i>
Reading	12	45	540
Composition	2	30	60
Handwriting	4	30	120
Arithmetic	6	30	180
Civic training	6	15	90
Physical exercises	6	15	90
Total	36		1080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scheme effective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set aside a fund of three million dollars for the current year to subsidize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special municipal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vincial and special municipal governments are urged to provide special funds for the same purpose.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returns, a total amount of over ten million dollars is to be spent by them this year.

Elementary school statistics—The last statistics take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revealed that 6,601,802 children were enrolled in elementary schools. Statistics for the years from 1929 to 1933 are tabulated as follows:

<i>Years</i>	<i>No. of schools</i>	<i>Enrollment of children</i>
1929-30	212,607	8,882,077
1930-31	250,840	10,948,979
1931-32	259,863	11,720,596
1932-33	263,432	12,223,066

The above statistics include primary elementary schools of modern type but not the old-style tutor school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made by former Minister of Education, Dr. Monlin Chiang,¹ their number and attendance are still too numerous to mention. In the city of Nanking, over five hundred of these traditional schools are located inside the city wall. "The total attendance of about 12,000 pupils is as great in number as all the enrollment in modern public schools put together. As we go further into the inland cities and towns, we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modern schools become less and less, while these traditional schools exercise an increasing influence in the education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Even in the absence of statistics regarding their enrollment of pupils,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number would at least equal to those of modern schools." This fact was testified by the writer's survey of traditional schools in Canton² and his observation in other places in China. In many villages, where no modern school can be found, there are such schools in existence.

Continuation and Vocational Schools

The continuation school—Continuation schools have sprung up in different places in response to local needs. There were such schools eve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In 1913,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public,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running of such schools were first formulated. But up to 1926, the number of them did not exceed one hundred in whole China. The best ones were those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mands have increased

¹ 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 fact-finders' reports, Vol. V, Supplementary series Part 2, pp 359 ff.

² The Chines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No. 7, pp 231 ff.

greatly during recent years and the following are statistics for 1931-32:—

	<i>For farmers</i>	<i>For workers</i>	<i>For merchants</i>	<i>For women</i>	<i>Others</i>	<i>Total</i>
Schools	1,973	175	135	359	467	3,109
Students	46,359	13,544	5,444	11,193	20,380	96,920

There are no fixed curricula for these schools, nor there is age limit, except students should be above twelve years of age and minimum standard for admission is reading knowledge.

The vocational school—There are two kinds of vocational school; the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 junior vocational schools. The former are of three years in length if graduate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s are admitted and of five or six years in length if primary school graduates are admitted. The length of the latter, which takes in primary school graduates only, varies from one to three years, and, in special cases, may be even shorter.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instruction, both may be classified a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ommercial, home economics, and other vocations, but in their curricula,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mmercial schools, half of the students' time must be devoted to practical work, while non-vocational subjects occupy one-fifth of their total time only. On October 11, 1933, thirty five curricula for junio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irty for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s were announced by the Ministry, but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be rigidly followed. The latest statistics of 1932-33 give the following numbers of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ir students:—

<i>Kinds of schools</i>	<i>No. of schools</i>	<i>No. of boys</i>	<i>No. of girls</i>	<i>Total No. of students</i>
Senior agricultural	22/7	1,950/200	238	2,188/200
Senior industrial	24/15	2,994/610	13	3,007/610
Senior commercial	20/50	1,576/2,528	208/352	1,784/2,880
Other senior vocational	5/2	446/41	48	494/41

Total senior vocational	71/74	6,966/3,379	507/352	7,473/3,731
Junior agricultural	58/7	5,474/281	410	5,884/281
Junior industrial	27/2	3,045/74	885/22	3,930/96
Junior commercial	32/6	5,634/209	761/52	6,395/261
Other junior vocational	74/19	2,799/276	5,981/473	8,780/749
Total junior vocational	191/34	16,952/840	8,037/547	24,989/1,387
Grand total	262/216	23,918/4,219	8,544/899	32,424/5,118

Figures after / are vocational classes attached to middle and other schools.

Recent emphasi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recently laid special emphasi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following four events deserve special mention. The first is a ministerial order to provincial and special municipal authorities that they must so apportion their budgets for schools of secondary level so that no less than 35% of the total fund be spent fo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at new private middle schools unless vocational in nature shall not be allowed to open. The second is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and advisory organiza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namely, a Depart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Division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Ministry and a National Commiss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third is an exhibit in December 1934 of products of vocational schools and of manual works of other schools sent by twenty-three provinces and special municipalities. The fourth is a national vocational conference called by the Ministry when the exhibit was held at Nanking, attended by over one hundred expert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special municipalities.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of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made recently, incomplete returns for 1934-35 show that there are over 370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and if schools for midwives and nurses are included, the total number will be well over seven hundred.

Secondary Education

Broadly speaking, all schools of secondary level belong to the field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ncluding vocational and normal schools. But vocational schools have been treat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while normal schools will be dealt with later, so, in this section, only middle schools of general character will be discussed.

Junior middle school curricula—The prevailing courses of study for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s as prescribed by the Ministry in November 1932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s:—

Subjects	1st year		2nd year		3rd year	
	1st term	2nd term	3rd term	4th term	5th term	6th term
Civics	2	2	2	2	1	1
Physical educ.	3	3	3	3	3	3
Hygiene	1	1	1	1	1	1
National lang.	6	6	6	6	6	6
English	5	5	5	5	5	5
Mathematics	4	4	5	5	5	5
Botany	2	2				
Zoology	2	2				
Chemistry			4	3		
Physics					4	3
History	2	2	2	2	2	2
Geography	2	2	2	2	2	2
Manual work	2	2	2	2	4	4
Drawing	2	2	2	2	1	1
Music	2	2	1	1	1	1
Total	35	35	35	34	35	34

For those middle schools where local conditions necessitate the learning of the Mogolian, Tibetan, Turki or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he following special curriculum may be used:—

Subjects	1st year		2nd year		3rd year	
	1st term	2nd term	3rd term	4th term	5th term	6th term
Civics	2	2	2	2	1	1
Physical educ.	3	3	3	3	3	3

Hygiene	1	1	1	1	1	1
National lang.	6	6	6	6	6	6
English	5	5	5	5	5	5
Mongolian, Tibetan, Turki or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3	3	3	3	3	3
Mathematics	4	4	5	5	5	5
Botany	2	2				
Zoology	2	2				
Chemistry			4	3		
Physics					4	3
History	2	2	2	2	2	2
Geography	2	2	2	2	2	2
Manual work	1	1	1	1	2	2
Drawing	1	1	1	1	1	1
Music	1	1	1	2	1	1
Total	35	35	36	35	36	35

Senior middle school curricula—There are also two curricula for the senior middle schools similar to the above:—

Subjects	1st year		2nd year		3rd year	
	1st term	2nd term	3rd term	4th term	5th term	6th term
Civics	2	2	2	2	2	2
Physical educ.	2	2	2	2	2	2
Hygiene	2					
Military tr.	3	3				
Chinese	5	5	6	6	5	5
English	5	5	6	6	5	5
Mathematics	4	4	4	4	4	2
Biology	6	6				
Chemistry			6	7		
Physics					6	6
Chinese history	4	3	3			
Foreign history				2	2	2
Chinese geography	2	2	3			
Foreign geography				2	2	2
Logic						2
Drawing	1	1	2	2	2	2
Music	1	1	1	1	1	1
Total	36	34	35	34	31	31

The special curriculum for those schools, where local conditions necessitate the learning of the Mongolian, Tibetan, Turki, or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allows five hours per week for such purpose, but drops the last three subjects and hygiene and reduces military training to two hours per week.

For girls, a special nursing course takes place of military training.

The third year mathematics go up as high as analytic geometry. Physics and chemistry are also quite advanced in nature.

Recent revision of middle school curricula—Sinc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bove curricula, complaints have come from all parts of China. Among the important ones are that the total load is too heavy and that mathematics and sciences are too advanced for those who do not prepare to enter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faculties in the university. After having collected opinion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special municipalities, the Ministry called a conference of experts in November 1935, which gave these curricula thorough revisions. The result has not been officially announced but some of the subjects in the senior middle school will be differentiated into arts and sciences groups and the total numbers of hours of instruction will be around thirty per week for both junior and senior middle schools.

External examination—In order to ensure quality of the school work while quantity is increasing, a system of external examination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was first announced in May 1932, and rigidly put into practice in June 1933. Primary school graduates were examined by commissions organized by county authorities, and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by provincial authorities. The former examination was carried out with many difficulties, especially because counties vary greatly in area and communication is not easy. Transport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not only costs money, time, and energy, but also involves grave responsibility, so it was abandoned after one year's trial. The external examination of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has been held since 1933, but only seven or eight important subjects are examined and usually examination takes place simultaneously in two or more centers in each province with same sets of questions judged by same groups of persons.

Statistics—The growth of middle schools from 1930 to 1933 may be shown by the following table:—

		<i>No. of schools</i>	<i>No. of boys</i>	<i>No. of girls</i>	<i>Total no. of students</i>
1930-31	Senior	554	37,891	6,680	45,571
	Junior	1320/84	286,689	50,171	336,851
	Total	1874/84	324,571	56,851	381,422
1931-32	Senior	494/2	47,067	9,071	56,138
	Junior	1399/108	289,055	56,571	345,634
	Total	1803/110	336,122	65,650	401,772
1932-33	Senior	520/9	51,134	10,157	61,291
	Junior	1391/126	287,291	60,753	348,044
	Total	1911/135	338,425	70,910	409,335

Figures after / are middle school classes attached to normal and other schools.

Preparation of Teachers

In the school system adopted in 1922, there was no place for independent normal schools, with the result that many normal schools were amalgamated with middle schools and preparation of teachers received no special attention. In the First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of 1928, strong protest was registered against such amalgamation. Since then, a number of provinces began to open again independent normal schools. When the Second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of 1930 considered the plan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t normal school became imperative. The law governing normal schools was formally promulgated by the Ministry in November 1932, in which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were embodied: normal schools should be independent and professional in nature; they should be public, no private normal school could be establish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Ministry; and in addition to normal schools of senior middle level, simplified normal schools of junior middle level and other normal courses should be opened. (See the diagram of the school system.)

The normal school curriculum—The curriculum, as revised and announced in September 1934, is as follows:—

Subjects	1st year		2nd year		3rd year	
	1st term	2nd term	3rd term	4th term	5th term	6th term
Civics	2	2	2	2		
Physical educ.	2	2	2	2	2	2
Military tr.	3	3				
Hygiene		2				
Chinese	4	4	5	5	3	3
Mathematics	3	3	4	4	2	
Geography	3	3				
History			4	4		
Biology	5	4				
Chemistry			4	4		
Physics					4	4
Logic					2	
Manual work	3	3	2	2	2	
Art	2	2	2	2		
Music	2	2	2	2	1	1
Intro. to educ.	4	3				
Educ. Psy.			3	3		
Subject matter and teaching method in elementary sch.			3	3	3	3
Elementary sch. adm.					4	

Statistics and Measurement						
Electives	3	3	3	3	3	4
Practice teaching					9	12
Total	36	36	36	36	35	35

Among electives are English, ad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of educatio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mass education, rural education, rural economics and co-operative, local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al supervision.

In rural normal schools, hours for mathematics, biology, chemistry and physics may be reduced to make room for agriculture and farm work. Rural education and rural economics and co-operative become required courses.

Curriculum for simplified normal schools—These schools are really longer in length of years, but take in primary school graduates, and consequently are lower in standard. The curriculum is as follows:—

Subjects	1st year		2nd year		3rd year		4th year	
	1st term	2nd term	3rd term	4th term	5th term	6th term	7th term	8th term
Civics	2	2	2	2	2	2	2	2
Physical educ.	2	2	2	2	2	2	2	2
Hygiene	2	2	1	1	1	1		
Chinese	6	6	6	6	5	5	5	3
Mathematics	4	4	4	4	3	3		
Geography	3	3	3	3				
History			3	3	3	3		
Botany	4	4						
Zoology	4	4						
Chemistry			4	4				
Physics					4	4		
Manual work	2	2	2	2	5	5	5	5
Art	2	2	2	2	2	2		
Music	2	2	2	2	2	2	2	2
Intro. to edu.		3	3					
Educ. Psy.				3	3			

Rural and mass ed.								
Statistics and measurement								3
Subject matter and teaching method in elementary school							6	6
Elementary sch. adm.							3	
Practice teaching						3	9	12
Total	33	33	34	34	35	35	34	35

Normal courses—There is a one year special normal course admitting senior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ing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Besides general course preparing home room teachers, courses on physical education, art, and manual training are also provided, since teachers for these special subjects are greatly in need. Another kind of one year special normal course admitting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graduates is designed for the preparation of manual and vocational subjects in junior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The one year course admitting junior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is opened only to meet the present emergency of shortage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Statistics—Normal school statistics for 1930-33 are as follows:—

		<i>No. of schools</i>	<i>No. of boys</i>	<i>No. of girls</i>	<i>Total no. of students</i>
1930-31	Normal schools	439/162	50,674	17,316	67,990
	Normal courses	407/ 75	20,254	5,296	25,550
	Total	846/237	70,928	22,612	93,540
1931-32	Normal schools	584/146	55,351	18,457	73,808
	Normal courses	283/ 82	16,314	4,561	20,875
	Total	867/268	71,665	23,018	94,683
1932-33	Normal schools	621/282	61,249	19,336	80,585
	Normal courses	253/ 60	14,498	4,214	18,712
	Total	874/342	75,747	23,550	99,297

Figures after / are normal classes attached to general middle and other schools.

Prepar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In most of the universities, a faculty 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s maintained 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ing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order to train those university graduates of other sciences and arts departments to teach in secondary schools, a special one year post-graduate normal course was proposed by the Ministry and tried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Unfortunately, there were few applicants and the scheme has not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A survey made by Professor T. H. Chen shows that majority of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ave not ha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eaching. To remedy the situation, the Ministry has ordered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to open summer institutes and teachers in service are to be trained subject by subject. The summer institutes in 1934 emphasized o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ubjects, while those in 1935, on English and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Higher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system of university district, important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are registration and strict enforcement of regulations governing private institutions,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aw gover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Universities, restriction of number of students in arts and law faculties, and 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s. We shall discuss these reforms one by one, except the first one, which had been dealt with in the 1932 Educational Year-book.

The Organization Law—The Law gover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Universities announced in 1929 provides that a university, properly so called, must contain no less than three faculties, with at least one faculty of science, pure or applied. Those institutions with less than three faculties should be called colleges only. The university faculties are: arts, sciences,

educatio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commerce and medicine. The length of the course is four years, except that of medicine being five years with an additional intern year. In 1932, regulations were further proclaim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points taken by any student in the university, except in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should be at least 132, and the legal length of four years must not be shortened even if the point requirement is fulfilled before time.

Restriction of arts and law students—According to statistics of 1931-32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arts and law faculties is about three times as many as those in pure and applied sciences. Man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fering courses in arts and law courses low in standard were ordered to be closed, amalgamated, or not to admit new students for one or two years. No more such faculties can be established without permission of the Ministry. In 1934, a ministerial decree further ordered that the average number of students admitted to arts and law departments must not exceed that to sciences departments, and for those colleges having arts or law course onl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o be admitted each year must not exceed fifty. The result is that from 1932 on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in arts and law courses has been reduced about three per cent every year, while that in science courses has thus been raised.

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s—When the nam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was changed back to that of Ministry in 1928, a national academy of research was established, which has been called “Academia Sinica”. The academy has now nine institutes for researches in the following branches of science: astronomy, meteorology, geology, physics, chemistry, engineering, psychology,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in addition it has 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Each institute maintains a number of research fellows,

associates and assistants to carry on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director. Over three hundred specialists are on the payroll and the annual appropriation is one million and two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The National Peiping Academy ranks next in importance. It was also founded in 1928 with two research institutes: one for physic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and another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Among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established within the universities, two of the earliest are the Institute of Sinology of the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of th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t Canton. The latter founded by the writer in 1928, consists of two divisions: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About thirty research monographs and sixty numbers of research journals have been published, embodying reports of research and other articles. During recent years,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as also devoted much fund in developing research institutes; while the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have done research work in education; the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on social sciences; the National Peiyang College and th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engineering; and the Nankai University, in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tatistics—Statistic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from 1928 to 1934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i>No. of institutions</i>	<i>No. of students</i>
1928-29	74	25,198
1929-30	76	29,123
1930-31	86	37,566
1931-32	103	44,167
1932-33	104	42,710
1933-34	111	46,758

An analysis of 1933-34 statistics reveal the following facts:

A. According to faculties

	<i>Sciences</i>	<i>Agr.</i>	<i>Eng.</i>	<i>Med.</i>	<i>Total</i>	<i>Arts</i>	<i>Law</i>	<i>Educ.</i>	<i>Com.</i>	<i>Total</i>
No. of students	5,121	1,683	4,670	2,182	13,656	9,799	13,807	3,547	2,765	29,918
Percentage	11.7	3.9	10.7	5.0	31.3	22.4	31.7	8.2	6.4	68.7

B.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of establishment

	<i>National</i>	<i>Provincial</i>	<i>Private</i>	<i>Total</i>
Universities	13	8	20	41
Colleges	5	12	22	39
Professional Schools	10	12	9	31
Total	28	32	51	111

C. According to sex of students (1932—33)

	<i>Men</i>	<i>Women</i>	<i>Total</i>
	37,549	5,161	42,710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Every year there are hundreds of students going abroad in pursuit of higher studies. Between 1929 and 1932 3,713 students went abroad; among whom 319 studying sciences; 167, agriculture; 569, engineering; 326, medicine; 587, arts; 1,162, law; 216, education; 141, commerce; and 226 unknown. A recent report shows sex of such students going abroad between 1929 and 1934 as follows: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i>Men</i>	1545	931	391	471	544	769
<i>Women</i>	112	98	59	105	77	90
<i>Total</i>	1657	1029	450	576	621	859

Social Education

A Division of Social Education was formed in the Ministry as soon as the Republic was established in 1912, to take charge of adult and civic education, including supervision of libraries,

museums, and public playground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t Nanking, new impetus has been given to the movement, and som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aken are: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schools for illiterates by naming them people's schools and establishment of higher people's schools, opening of people's educational center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establishment of divisions and committees of social education in provincial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 and setting aside a definite portion of provincial fu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education.

The people's school—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eople's schools were first promulgated in 1929 and revised in 1932 and 1934. Illiterates or semi-illiterates from sixteen years of age up are admitted to these schools for at least 200 hours' i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including civics and common knowledge), arithmetic, singing, and physical exercises. Graduates of people's schools are admitted to higher people's schools, in which vocational subjects may be added.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interest of people to enter such schools, movements for liquidation of illiteracy have been organized in a number of provinces, by assigning a week's period for propaganda works in different public or populous places.

Other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Among other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for adult education,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the people's educational center. It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can study and read, attend lectures and other demonstrations or amusements, play mental and physical games, and get simple medical service with little or no charge. Besides these centers, there are consultation bureaux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folk reading centers, halls for popular lectures, popular newspaper centers, folk tea houses, public playgrounds, libraries, museums, art galleries, cinema houses, theaters, etc.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education—All of the above institutions a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Division of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Provincial or Municip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Many county bureaux of education have also such divis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social education, the Ministry in 1933 ordered that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authorities should call the help of party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educational experts by organizing committees of social education. Culminating such work in the country as a whole, a Central Commission was created by the Ministry in 1933 also.

Allotment of funds for social education and statistic—Early in 1928, the Ministry basing upon resolutions passed by the First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ordered that funds for social education should be from 10 to 20% of total funds devoted to education by national,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ince then, funds for social education have steadily increased with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1918-29	1929-30	1930-31	1931-32	1932-33
<i>Funds in dollars</i>	3,632,466	13,030,337	14,028,461	13,440,634	20,979,026
<i>No. of institutions</i>	10,773	64,232	70,166	78,278	84,212
<i>Students or attendants</i>	219,828	1,036,160	1,104,187	1,252,475	1,298,467

Concluding remarks—The above brief account of recen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in China shows that consider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The latest statistics reveal that there are over one hundred higher institutions, about two thousand middle schools, one thousand normal schools, three thousand continuation and vocational schools, two hundred fifty thousand primary schools, and eighty thousand institutions of adult and popular education; enrolling forty-six thousand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four hundred thous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ne hundred thousand normal school

students, one hundred forty thousand continuation and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welve millio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over one million students and attendants in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f China were a smaller country, or not so densely populated, this record would not have made a poor showing, and, we must remember, this has all been accomplish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hirty years, within which half were years when the country was in chaotic condition, while half of the figures were increased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28 and 1933. Yet the task before the Chinese educators is still huge and the difficulty of performing it is almost insurmountable!

In the above sketch, only those developments nation-wide in nature were included. Had space permitted, mention should have been made of the following items: the visi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and its report; the part played by private, including mission, schools, and the Laymen's Inquiry from America and England on the latter; the movement of workers' education; special education for people of ex-red districts; the two National Athletic Meets attended by representatives as far as from Mongolia, Eastern Turkistan, and South-sea Islands; and the movement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means of education.

Bibliography of Books in English

Becker, Falski, Langevin and Tawney,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Paris, 1932.

Chen R. Y. S., *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1935

China: 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 fact-finders' reports, Vol. V, Supplementary series Part 2, New York, 1933

China: 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 regional reports, Vol. II, Supplementary series Part 1, New York, 1933

Chu Y. K., *Some Problems of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1933

Chung L. T., *A History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Shanghai, 1932

Duggan S., *A Critique of the Repor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rts to China*, New York, 1933

Galt H. 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al Theory*, Shanghai, 1929

Hsiao E. T., *A History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1932

Monroe Paul, *China: A Nation in Evolution*, New York, 1928

Peake C. H.,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1932

Re-thinking Missions, A Laymen's Inquiry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New York, 1932

Tsang Chiu-sam, *Nationalism in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Canton, 1933

Wang Tsi C., *The Youth Movement in China*, New York, 1928